

不被理解的毛泽东

卷五

作者：虚声

校对：**Kunter**

本文来自网络，涉及版权请联系作者虚声

全书序言（修改版）

补充一下修改版的序言。

文章描述了中国近代史。

近代史的特点：多、繁、杂。人物众多、事件繁琐、观点杂乱。按照平常的叙述方式，要梳理清楚极为困难，容易变成生活流水账，形散神也散。因此本文采取了纵向剖析，即以主要人物为主线，一个个讲述，所有故事最终升华汇聚到毛泽东身上。

本文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传记，而是由一群人的简传汇集而成。

本文写了一群人，写了伟大的将军和政治家，写了将军的经典战例和战术风格，写了政治家的治国策略和治国理想，同时清理了一些所谓的个人恩怨。他们都是杰出人物，有杰出人物固有的杰出素质，同时兼具杰出人物挥之不去的缺憾。因为杰出的人物首先是普通人，所以本文写他们固有的优点的同时，也写了他们的缺点。他们的优点，后人可以学习，学习如何发扬光大；他们的缺点，后人也可以学习，学习如何避免之。

文章一共分为十个篇章。但根据人物的重要性，篇幅的长短不同。比方说高岗这一篇，只有两万多字，刘少奇的篇章有二十多万字。

第一篇，写高岗事件，是整个文章的切入点，讲高岗事件的前前后后。高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建国之后各种复杂关系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高岗事件。高岗是个实干型人才，打仗、搞经济都是好手。在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中，干了很多大事，却又迅速坠落。之所以如此，不是高岗无能，而是长期以来他的思维中固有的缺陷导致了他的衰亡。毛泽东本打算重用他，而他错误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所以留下巨大的遗憾。

用一个字评价高岗，那就是，诨。

建国之后，高岗事件之后，经历了反冒进、反反冒进和反右派，这些都是相对轻微的运动。第二个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是发生在五八年的反教条运动。高岗事件和反教条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篇，反教条。此篇章的主角是刘伯承元帅和粟裕大将，他们都被误会了。

两人都是军事天才。这两个人好像是镜子两半，军事理论方面，刘伯承得天独厚；军事实践，

粟裕罕有匹敌。建国之后，两人命运惊人地相似，早早挨批，早早靠边站，却又批而不倒，安然度过文革，却又生前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写刘伯承，写了刘伯承的战术思想和建军思路。写粟裕，写了他的赫赫战功，以及被批的原因。

刘伯承被批，主要是建军路线上和彭德怀以及毛泽东有分歧。粟裕被批，相当有趣。

评价：刘伯承，痛；粟裕，奇。

反教条之后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彭德怀元帅遭受千古奇冤。

第三篇，彭德怀。

彭德怀的人相对简单，戎马一生遇到过各种对手，最后均能战而胜之，不论遇到多大困难，始终是威武不屈。但他的故事相当复杂，从创建红三军团到百团大战、到解放西北、到抗美援朝、到庐山风云，彭大将军身上有太多的故事。

评价彭德怀：实。

实实在在地做人，实实在在地打仗，实实在在地面对困境。正因如此，庐山之上，只有彭德怀敢写那封信。写彭德怀，写了抗美援朝、写了庐山事件。

庐山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三年，也就是五九（下半年）、六零、六一（包括六二年年年初）那三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三年。那三年里，国家建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第四个篇章，就写那三年的前前后后。

第四篇，大饥荒。

或许叫三年困难时期更好听一点，事实上那三年就是大饥荒。没有吃的嘛，土地减产嘛，人口减员嘛，就是饥荒，而且是大饥荒。

大饥荒对新中国的历史影响是决定性的，可以说是后来所有政治运动的根源。

大饥荒之前，也有政治事件，但出发点是为了建设，而且规模并不大。比方说高岗事件，本是为了搞建设的。比方说周恩来反冒进，为了建设。毛泽东反反冒进，还是为了建设。甚至大跃进，目的也是为了加快建设。即使是庐山事件，还是为了继续大跃进，说到底还是为了建设。正是因为建设过于激烈，违背了自然规律，所以导致了大饥荒。

大饥荒之后也建设，但政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从小四清到大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莫不如此，某些阶段，甚至是为了运动而运动。

大饥荒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调整经济政策。

第五篇，刘少奇。

刘少奇在大跃进中走向前台，按照既定的经济模式走了一段时间，没有结果，终于决定调整经济。之后大饥荒渐渐消退。大饥荒消退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却显现了。这两个合作了数十年的老人在治国理念上出现了差异，终于走向对立。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小四清），刘少奇把社教升级（大四清）。结果导致矛盾的最终爆发，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伤。刘少奇遭遇到的挫折，不仅是他个人和他的家庭的伤痛，也是一个时代的伤痛，也是一个国家的伤痛。

第六篇，文革。

文革是一幕大戏，是世界史上最为独特的戏剧。这种戏剧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属于有且仅有的戏种。遗憾的是，身兼编辑、策划、导演的毛泽东把剧本写成了悲剧。身边的那几个助手更是煽风点火，严重地扩大了悲剧的成分。

文革中，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有三个，林彪就是其中之一。然而林彪的出走意味着文革的破产：演不下去了。

第七篇，林彪。

林彪是个怪人，从生活习惯到行为举止，乃至用兵方式均与众不同。军事上的林彪让人钦佩，钦佩他沉稳而不失灵巧的风格，钦佩他冷静，钦佩他算无遗策。政治上的林彪让人遗憾。遗憾他的立场，遗憾他的选择。写林彪，主要两个部分：搞定东北和文革冒险。

林彪，怪。

一文一武，刘少奇和林彪，皆为奇才，身居文革首尾两端。文革起于刘少奇而终于林彪。刘少奇被批倒，意味着文革不可避免。林彪葬身大漠，标志着文革这幕大戏已经唱不下去了，剩下的便是收尾工作。只是收尾工作不是由毛泽东来干，而是由毛泽东的继任者来干。

第八篇，周恩来。

周恩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不仅因为他在第一代领导人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放在整个历史上，他代表了一种精神传递。周恩来是一个典型，一个把美德和谋略完美融合的典型。他如同一个天然的磁石，能够团结吸引各种人。只要他出马，政策总能得到最大限度的执行。一个政策出台，如果连周恩来都执行不了，那只有一种解释：政策是不可行的。比方说大跃进，比方说文化大革命。

对于周恩来这样的人，必须把前面那些条条块块说完之后，才能明白他的价值。

如果用一个字评价周恩来，估计没有比——和——更合适的字眼了。

周恩来之后应该是毛泽东了，然而说现代史还有一个人必须仔细说——他就是蒋介石。

第九篇，蒋介石。

蒋介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早期一无所有，到形式上统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又以中国战区最高领袖身份赢得胜利，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手腕极高的谋略家。纵观蒋介石的一生会发现：他出入过各种场合，接触过各种人，拉拢过各方面的力量，和所有实力的军事政治集团打过也和过，但从来没有真正摆平各方面的力量。他一生都在拉拢各方面力量，拉拉扯扯，却无法融合，最后还是一个烂摊子。

如果用一个字评价蒋介石，那就是，乱。

蒋介石，生于乱世，乱中求胜，最终头焦额烂，了却混乱的一生。

所有这一切结束之后，就是主角了。如果把近代史比喻成一幢房子，有人是砖瓦、有人是门窗，梁柱只能是毛泽东。

第十篇，毛泽东。

毛泽东是一个历史巨人，古今稀有。

现实中的毛泽东有双重性格：政治家和诗人。某些时候政治家主导诗人；另一些时候则反过来，诗人主导政治家。按照这个标准，毛泽东的人生阶段有两个，以五四年为界点。

五四年之前的毛泽东大体上是政治家主导诗人的阶段，一手抓军事，一手抓政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很硬。成绩也是明显的，主导所向无敌的战场，从红军创业阶段，到抗日阶段的潜伏，到赢

得国共争霸的建国之战，再到赢得抗美援朝的立国之战。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伟大而辉煌的胜利。这一时段的毛泽东，用政治家的手腕把诗人的想象融合到实战中。

五四年之后的毛泽东迈入了另一个层次，他开始搞建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很硬。缺点也是明显的，从大跃进到文革，缺点足够多。这个阶段的毛泽东，已经被诗人占据了，用诗人的想象去搞政治运动。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呢？一个字，难。这个难，并非指毛泽东的一生困难，而是毛泽东的一辈子太难。也许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没有人比毛泽东面对更多的难题。他的难题有很多，比方说如何去赢得国家自立？这个答案是二十八年的斗争，文斗和武斗。比方说如何建设国家。很遗憾，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岔子。

大致框架就是这样子。

第六篇 文革（上）

一、序

一直想找一个词能贴切描述那个时期，素我无能，一直找不到。许许多多的材料堆积在我的眼前，依然觉得如雾里看花。那朵花犹如传说中的尸香魔芋，那迷雾如同来自遥远的远古时代。然而实际情况是，它仅过去数十年而已，我们身边有成千上万的人刚从那迷雾中走出来。

它更像是一段传奇，奇人奇事层出不穷，那种无节制的狂欢，那种硕大的伤口，都是那么的奇特而诡异、矛盾而绚丽。

说它是传说或传奇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它真实存在过。很多人的身上还保留着那个时代的伤痕，那个时代也将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写入历史。也许因为它过于真实了，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不对劲。

之所以如此，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文革过于不寻常。

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事件都能在历史中找到模板。就算是一件新兴起的历史事件，随后就会有类似的事件诞生。帝国啊、王朝啊就不提了，遍地都是，一大堆。比如资产阶级在英国开辟暴力革命的先河之后，法国立马跟上。比如当年的巴黎公社使用暴力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俄国很快跟上。而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仿佛是一个孤立事件，如同一个孤独者矗立在人群之中，存在感是真实的，而真实的存在感之中散发着虚无。

纵观整个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大体上就两个字——乱和治——交替出现，往复循环。乱和治交替循环的过程大概是这样的：整体大治，然后演变为治中有乱，再演变为乱中有治，最后演变为天下大乱。在中国历史上，有时候乱和治的转变快了一点，比方说安禄山的叛乱，就直接把盛唐推向了低谷，王朝更替基本上就是这样。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坚韧有力的中华文明尚且如此，世界其他许多民族动乱一下子就没有了。比方说古代中西亚那些帝国文明，比方说古希腊以及晚一点的古罗马，比方说活跃在北方的草原文明，比方说早一点的亚特兰蒂斯文明，比方说远一点的玛雅文明，常常莫名其妙地就中断了。翻开历史书本，会发现一个个消失的文明就如感染瘟疫而死亡的牲口一般躺在历史的长河里静默无声。我们对它们的了解不多，但是我知道它们没能经受起乱和治的循环，因为它们都死去了。这一切总有一个基调，乱或者治，生或者死。

文革过于不同寻常，乱和治并行，生与死共存。

比混乱程度，去史书里去扒，很少能扒到像文革那样达到全民骚乱的混乱程度的。伟大的汉帝国，被一场动乱和一次政变给折腾没了。唐帝国被安禄山和史思明折腾得没了脾气。李自成起义以及太平天国运动，都是帝国衰亡的导火索。尽管如此，这些例子也没有达到全民动乱的程度。而文革不同，整个国家、民族都在骚动。诡异的是，发生这么大的骚动的同时，国家的主题活动却是安稳如山、铁板一块。苏联在北方陈兵百万，终究没有向前跨出一步；美国在越南打得火热，终究不能无视中国的警告而没有越过十七度警戒线。更为诡异的是，还成功爆炸了核弹，把卫星送上了天等等。

那年月，几乎所有人都在遭殃，昔日的封疆大吏，过一天就被迫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开喷气式飞机”。对年轻人而言，去斗一斗市长啊什么的，显然比在教室里念书有趣。

从内部细节上看混乱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将要崩溃。

从外在整体上看整齐程度，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国家前途无量。

事实上，这个国家既没有崩溃，也不能算前途无量。混乱之后很快转向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又出现一大堆问题。

要解释这一切非常吸引人，也非常困难。如此巨大的课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答案。即使同一个人以不同的切入点也能得到不同的答案，甚至同一个人以同一个切入点在不同时候也能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

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去解释文革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归结为权谋斗争，对这个，咱们最为在行。从历史上那无休止的王朝更迭，到日常你我身边的办公室政治，甚至连谈个对象都要先观察、推测、估算、权衡一番，权谋无处不在啊！按照权谋斗争的观点，是刘少奇的翅膀硬了，遮挡了毛泽东的光辉，于是毛泽东就把刘少奇干掉，拿回自己的权力；或者是：刘少奇想把毛泽东架空，自己去当老大，于是两人火拼，其他人站队，最后是姜是老的辣，毛泽东棋高一着，干掉刘少奇。这么解释最为省事，也可以博得很多叫好声。因为这种事确实存在，确实是毛泽东拿下了刘少奇。然而这种解释有很多漏洞，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刘少奇去世之后文革为什么没有停止？权谋是有的，但并不是全部。如果仅仅是权谋，还有更好的办法：文革之初答应刘少奇告老还乡，另推一个人上去不就完事了吗？甚至毛泽东重新出任国家主席也可以，不会有人反对。

也可以归结为一出闹剧，说毛泽东晚年糊涂了，头脑不清晰，听信江青和林彪的一面之词，让很多老同志受苦受难了，有人付出了生命代价，比如刘少奇和贺龙都是冤枉的，被陷害的。而其他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着大无畏的革命情怀，牺牲小我，维持党和国家的统一，最后终于在

邓小平、叶剑英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拨乱反正。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毛泽东虽然老，并不糊涂。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清醒着呢！特别是文革期间，更是前所未有的清醒。

或者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探索实践。这么说也能讲得通，因为面对大饥荒之后形成的巨大漏洞，好像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查下去，所有人都有责任，从最上层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最下层的大队干部，都有责任嘛。如果把那一页翻过去，对历史没有交代。然而生活还要继续，国家还要建设。建设国家还要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之前能弄出那么大的漏洞，如何能保证他们之后不会再捅篓子？如果是一个人犯了错，换一个就行了；如果整个集团犯了错，那只能是法不责众。虽然法不责众，但是有必要教育一番。通过啥办法来教育干部呢？本来是想通过社教的，也就是所谓的“小四清”。结果小四清没搞成，就被刘少奇的大四清给搅合了。毛泽东干脆来个一次性解决问题，一个比大四清还大的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去杀，不是去罚，也不是去放过，去教育。谁来教育呢？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教育，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农民、学生等等。

这就是文革善意的出发点，也是许多老干部支持文革的原因。因为在老干部看来，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已经官僚腐化，脱离了人民群众。在今天看来，脱离人民群众也没啥大不了嘛，把该干的事该了就行。当时可不一样，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人民群众中走出来的，都认为自己是人民大众的代表。

问题是，千百年以来，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干部管群众。即使现在，仍然是干部管群众，只是人民群众在理论上多了一些所谓的监督权而已。即使欧美那一套，本质上还是干部管群众。理论上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公务员，实质上还是公务员出演管理者的角色，要不然监督他们干吗？还不是担心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

反过来会怎么样？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知道，因为在他们那里，这种事没发生过。在中国，就是文革的样子。人无完人嘛！从最底层的集体单位——家庭这个层次来讲，丈夫（或妻子）都不可能百分百满足妻子（或丈夫）的要求，干部就能百分百满足群众的要求？笑话！市长能让全市人民都满意？连满足一个办公室都困难吧？干部只是干部而已，不是耶稣。即使在美国，把州长的职位丢给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那些人，看看会有啥结果？还不是照样鸡蛋、臭袜子满天飞！某个刚刚失去工作的妇女过来扇一巴掌，某个刚刚失恋的小伙子过来踹一脚也不是没可能的。

这就是所谓实践带来的问题，也是一大批老干部从支持转为反对文革的原因。

还有其他一系列的解释，什么人性啊、心理啊等等，可以分析一大堆“成果”出来。

想来想去，还是用那个比较通俗的词来评价文革吧——“悲剧”。文革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

也有多层含义：一部分人认为文革根本不应该发生，发生之后造成很大困难，耽误了很多人的大好前程和国家的发展机遇，所以是悲剧；另一部分人认为，文化革命是应该的，但方式不对，所以是悲剧；还有人认为，应该发生，方式对头，但没有进行彻底，所以是悲剧。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是先描述一下事实吧。然而事实又太多，只能简单描述一下。在描述简化的事实之前，先看看几个实例，大致看一看文革的明流和暗流，就当管中窥豹吧。

二、案例之一：林彪开的处女证明

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那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五一六通知》。那个通知是文革的标志性文件之一。

在同一个政治局会议上，每个参会人员都收到这样一个复印件，内容是由林彪亲手写的，大致内容如下：（一）叶群和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与王实味等人根本没有恋爱过。（三）老虎、豆豆（指林立果、林立衡）是我与叶群亲生的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

林彪这是干嘛？他要政治局通过决议，说明叶群在同林彪结婚前是处女？！

那可是政治局会议，而且是扩大会议，不是谈论风月的地方！很多老干部都感到不舒服，聂荣臻元帅当时就气愤地说：“发这个做啥？收回！”

啥事嘛？叶群是不是处女，貌似是林彪的家事，跟别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林彪脑袋短路了？把“家丑外扬”？！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林彪性格非常谨慎，平时作风也很低调，而且自尊心极强，一句话能说完的事绝不说两句，能不说的事绝对不说，极少透漏个人感情。亲手抖出来这事，一定是气急了、被逼急了。然而一九六六年林彪的地位正在直线上升。在军内，是军委第一副主席。朱德淡去，彭德怀被批，林彪成了整个军方的形象代言人；在党内，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三个月之后上升为第二位；在政府内部，职位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而且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有谁能逼迫林彪这么做？没有人。是什么逼迫林彪？局势。

局势何为呢？局势就是局势，什么都不是，看不见，摸不着，但确实存在。为了说明这个局势，还是从头说说这事吧。

从五十年代末起，大概是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一家经常收到一系列的匿名信。信的内容大概就是林彪的证明信中要否定的那些，说叶群和林彪结婚之前和很多人搞对象、生活作风有问题、孩子不是林彪亲生的等等一系列侮辱性的言辞。接到这些信之后，叶群自然鼻子都气歪了，而林彪虽然喜怒不形于色，肯定也是憋着一肚子气。

匿名信事件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六六年才算告破，结果令人大跌眼镜：竟然是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写的。

严慰冰，江苏无锡人，地主家庭出身，研究生毕业，但依然去延安参加革命，成为陆的妻子。

陆定一和严慰冰的关系，和许多老一代革命家一样，属于组织内部安排的。据说严慰冰之所以写这些匿名信，是因为看叶群不爽。具体来说也就是一点陈芝麻、烂西瓜的事：例如当年延安整风运动，在清查历史档案时，发现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了解到这些情况，曾向叶群所在单位马列学院党组织反映。这些情况“很严重”，但没有追究，因为叶群成了林彪的老婆；又例如，叶群在军队里时不时发点脾气，像个女霸，严慰冰看着就不爽。据说直接引发严慰冰写匿名信的原因是，林彪和前妻张梅生有一个女儿，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念书，受到叶群的歧视和虐待，放假也不让她回北京。这些原因加在一起让严慰冰决定写匿名信骂叶群一家子。当然还可能有其它原因，鉴于其中的牵涉比较私人，不便猜测。

由于严慰冰是陆部长的夫人，而且和林彪一家没啥瓜葛，所以公安机关无论如何也怀疑不到她身上，案子的告破很有戏剧性。

某日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钱包被扒了。她找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部长夫人，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去，进门时和一个女人撞上了。能在内部购物的都不是一般人，那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

“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一看竟然是老冤家叶群，正好，憋着火呢。双方如同武林世仇，你来我往，见招拆招。吵到最后，估计是叶群太过仗势欺人，严慰冰怨气难消，就去找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

这时候问题来了，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那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不太听懂对方的话，只好借助文字，严慰冰写下了争吵的经过。那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联想到那些匿名信，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

但这个过程有很多漏洞。首先，就算叶群气焰嚣张，欺负了严慰冰，最多是个人恩怨，严慰冰找领导反映已经有点过了，那领导还去惊动林彪？林彪可是国家前几号的人物，而且身体极为不好，连报告都懒得看，会管这些琐事么？不论如何，案子总算破了，是严慰冰写的无疑。客观说严慰冰挺有娱乐精神的，讽刺挖苦叶群有模有样，试举一例如下：

搂了一个骚婆子，

生了两个兔崽子。

封官进爵升三级，

终年四季怕光照。

五官不正双眉倒，

六神无主乱当朝。

七孔生烟抽鸦片，

拔(八)光了头上毛。

机关算尽九头鸟，

十殿阎罗把魂招。

——讽刺林彪的。不愧才女呵，写匿名信都是诗歌体的。然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当英雄都要付出代价的，哪怕是当个“背后的英雄”，一旦暴露不会有好日子过。按现在的观点看，查出来又怎么样？无非是个人诽谤呗！赔礼道歉、批评教育一番也就差不多了，那么严慰冰受到怎样的待遇呢？

严慰冰家住中南海增福堂，环境很好。她在文化部上班，闲来无事写点诗歌啥的，生活还算清闲。很快这种清闲的生活没有了，据说和叶群冲突之后预感到不妙，不妙的预感中迎来一位文化部副部长——严慰冰的领导。一般情况下，文化部副部长到中宣部部长家，都会唠嗑唠嗑。那次有点例外，领导直接告诉严慰冰，中央组织部要找她谈话。严慰冰也想借此机会谈谈叶群的事，就去找自行车（那年代生活节俭啊）去组织部。然而领导却慌忙说：“外面有车子，就是来接你去。”不仅不让骑自行车，连换衣服的时间都不给严慰冰留下。严慰冰很纳闷，也没有多想，直接拿件外套就跟领导出门了。严慰冰刚出院门看见一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接着迎来两位彪形大汉。两位大汉也不说话，一左一右直接把严慰冰架上那辆小轿车，然后小车直接驶进了监狱大门。直到十三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七九年严慰冰才恢复自由。

整个过程没经任何法律程序，完全是诱捕，甚至可以说是绑架，战争年代诱捕特务也不过如此。要知道严慰冰不是特务，她是中央宣传部长的夫人，她本人也是国家公务员，没有涉及到任何国家机密。更为恶劣的是，严慰冰的领导——文化部副部长亲自出马下套，还有一点规则可言么？没有！不仅是严慰冰，严慰冰的母亲——在抗战初期带着三个女儿，历尽艰难，行程万里，来到延安——这位对共产党作过贡献的革命老人，此时已经七十高龄，也被抓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于六八年冬天

死于狱中；严慰冰的三个妹妹也无一例外地被抓进秦城监狱；陆定一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关了六年，被打断两根肋骨。

这事还没完，仅仅是一个严慰冰似乎还不足以如此大动手脚，还有严慰冰的丈夫——陆定一。

陆定一，无锡人，一九零六年生，二五年入党，一九九六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陆定一的工作就像中国共产党的喉舌。

陆定一的家庭条件也不错，二十岁便从交通大学毕业，让现在拥挤在高考独木桥上的学子们汗颜呐！正准备大展宏图之际，陆定一同志面临人生最为重大的一次选择，毕业一年之后，也就是二七年，国民党清党。如果此时的年轻才俊陆定一和大多数共产党人那样脱党，前途也是一片光明，然而陆定一选择了共产党。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二十二岁的陆定一成为中共青年团的中央宣传部长。从此以后，陆定一同志就一路连任宣传部长：被拿下，复起，又是宣传部长；直到建国之后，成为中央宣传部长。

除了五二年到五四年那两年之外，陆定一一直干宣传工作。可以说陆定一把自己的一生都压在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上，从始至终，无怨无悔。陆定一的第一任妻子叫唐义贞，比陆定一小三岁，是一个奇女子，两人二九年结婚。顾顺章叛变之后，唐义贞和陆定一分开，独自去苏区工作。之后陆定一在宣传部几经起落，两人又几经离合，生一男孩，叫陆小定。

长征之前，唐义贞再次怀孕，被迫留下。唐义贞不但被留下，还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党籍。三个月之后，唐义贞所在部队处境困难，决定往江西转移，去寻找陈毅的部队。队伍通过两山夹峙的一座独木桥时，有人为切断追兵，拆毁了这座桥，哪知反而暴露了去向。敌人迅速包抄过来，唐义贞预感形势危急，向身边的宣传干事陈六嬷托付自己的身后事，说：“你是本地人，可能突围出去。我送你一对银镯留作纪念。我若牺牲了，日后有人问起，就告诉他，我丈夫叫陆定一。前不久，我在圭田生下一个男孩，名叫小定，送给圭田乡的范其标、聪秀妹夫妇抚养。”一场殊死战斗之后，唐义贞等二十余人，因寡不敌众被俘，随后被枪毙，时年二十六岁。大概半个世纪之后，晚年的陆定一愈加思念失散的儿女，才托人寻找，终于遂愿。建国之后那会，干吗不找呢？理由很高尚：忙建设，没空。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老一代人就是那样，很多事都是不可思议的。

一九八七年，八十岁高龄的陆定一见到外孙女一幕非常感人：按陆定一的要求，年轻的外孙女穿着红丝绒旗袍出现时，陆定一的眼睛定住了，随即老泪纵横，不能自持。女孩子的容貌、神气，太像她的外婆唐义贞了！相见的那一刹那，仿佛消失半个世纪的唐义贞再次来到八十岁的陆定一面前，时空折叠，人是人非，如何能分清呵？陆定一拥着年轻半个世纪的外孙女失声痛哭，其中的感

情，局外人已经难以理解，亦非笔墨能形容。在唐义贞墓前的石碑上，陆定一留下亲笔题辞：“义贞知己，我的夫人。”短短八个字，生动朴实，足以天荒地老。

陆定一，至情至性之人也。

严慰冰是陆定一的第二任妻子。

一九六五年，当严慰冰被诱捕时，陆定一在合肥调查，并不知情。陆定一虽然不知道严慰冰被捕，但是对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是知道的，所以当汪东兴打电话通知他回去开会时，他已经预感到会出事，但没想到出了那么大的事。

大事当然不是林彪要开的“处女证明”，而是他陆定一将享受到的待遇。在这次会议之前，陆定一就感觉到气氛不对。向来宣传工作干得不错的陆部长人缘也不错，所到之处都是说说笑笑，这一次不同，从下飞机就感受到了。没有人跟他说话，开会时更是没人理他，这是什么情况？——批斗会的前兆！

陆定一刚刚坐下就要面对强有力的挑战，挑战者是林彪。

“陆定一！你——”

“我，我怎么了！？”陆定一抬头就看见林彪那张气得变形的脸。

林彪隔了好一会才缓过一口气，咬牙说：“你天天在想变天，天天在想变天！”

陆定一莫名其妙地反问：“变天，变什么天？”

林彪怒气冲冲地说：“你讲，你跟你老婆严慰冰，勾结在一起，长期地用写匿名信等办法，恶毒地攻击和诬陷叶群同志和我，还有我的全家！你讲，你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搞这个阴谋？你立刻向党讲清楚！”现在大家终于明白，林彪写那个证明实际上是批判陆定一的依据。

“这个问题，我可以讲一讲。”他抬头望了林彪一眼，继续说：“因为事情的真实情况不是刚才说的这样。严慰冰写什么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过，谈不上什么‘勾结’嘛！我本人也从来没有发现她写了什么信，这个事情，组织上可以调查，完全可以查清楚。”

林彪猛然打断陆定一的话：“你狡辩！你自己老婆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

“那不一定。”陆定一颇有讽刺意味地说：“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不是很多吗？”这句话一

语双关又很富幽默感。严慰冰的匿名信加上每个人座位上放的“处女证明”，对林彪实在是一种讽刺，让有些人暗自发笑。

纵横天下的林帅何时受过这等奚落，因为极度愤怒而满头大汗，嘴巴却使不上劲。几分钟后，林彪才猛跺双脚，抬起右手，直指向陆定一说：“我，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

那架势，仿佛手中真有一手枪，就会亲手开枪打死陆定一。

比口才，林大元帅跟陆部长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林元帅说话看起来很吃力，而陆部长则轻描淡写、游刃有余。没办法，专业不同啊！要比辩论，陆定一是大师级的水平，而林彪只是一个小学生；正如战场上的林彪是大师级水平，而陆定一只是小学生一样。开会斗嘴，还是理论家比较管用，偏偏是当时林彪的身边还没有理论家（陈伯达还没有投靠）。不过不要紧，比理论家更为管用的是康生同志。

林彪因为气愤过度而瘫在椅子上十分无助时，康生出马了，一声大吼：“陆定一，你是个特务！”简单明了直接，且杀伤力十足，比林彪那费力啰嗦给力多了。

陆定一冷冷地说：“康生同志——”

康生立马打断，说：“谁是你同志？”反击相当犀利。

陆定一回敬：“好吧，就算不是。不过，我想提醒一下，现在不是一九四二年整风的时候了，你还想搞延安‘抢救运动’的那一套吗？”大家都知道康生在延安整风中的表现，康生几乎把人全部都得罪了。陆定一把大家的思维引导到那个时候，无疑是一招妙棋。

然而康生也有妙招：“好！你敢反对延安整风，整风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反对整风就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果然又是那一套，结果会场出现“嗡嗡”声，毕竟大家对延安整风记忆犹新呐！这批斗会是开不下去了，康生同志只好拿出杀手锏，当场宣布：“陆定一，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从今天起，对你实行隔离审查，老老实实交代你的罪行去！”搞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遇到流氓，更说不清了。能说会道的陆定一遇到政治老流氓康生还能干嘛？倒霉呗！从此之后，陆定一失去自由，十三年之后再度出山已是风烛残年。

事到如此，不禁又问一句：为什么？林彪为什么开那张“处女证明”？从整个事件来看，那张证明似乎就为了成为批判陆定一的依据。然而没有用，留下了一个笑料，看起来非常幼稚。然而林彪是幼稚的人么？一个幼稚的人不会二十多岁就当军团长，不会长时期掌控中共最精锐的军队，不

会看着数十万对手在自己的陷阱中挣扎哀嚎而无动于衷。政治上的林彪，在某些方面表现幼稚，但林彪的谋略远胜那些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们。这张处女证明可不可以理解为政治幼稚的一种表现呢？如果非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事实上林彪这个举动并非因为幼稚而家丑外扬，而是一个杀招。

这个杀招并非完全冲陆定一去，正如会议过程中表现的那样，这一招对精于辩论的陆定一没有用，从道理上也不具备打倒陆定一的依据。陆定一固然老资格，固然地位高，固然人缘不错，但是放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层次下，还是微不足道的。不少比陆定一资格更老、地位更高、功劳更大的人都被打翻在地，要拿下陆定一，甚至不需要理由，利用政治流氓康生，直接宣布陆定一隔离审查就完了。

再回顾一下事件的整个过程，从严慰冰被捕到严家之人连坐入狱，基本没有任何程序可言，没有公安局，没有检察院，没有法院，只有监狱，只有审查。像陆定一这种高干，也只是宣布隔离审查，仍然没有任何程序可言。

整个逻辑是这样的：严慰冰骂了林彪一家，仿佛闯了弥天大祸，而非依法裁决，说白了就是林彪的实力更强而已。对陆定一的处理也是一样，实力更强的林彪摆平了实力差一点的罗定一。但是宣传上不能说林彪恃强凌弱，只能说陆定一夫妇是恶人，而林彪夫妇是好人。严慰冰老婆攻击林彪一家，是恶人攻击好人。严慰冰遭受处罚，那是恶有恶报，正义得到伸张。陆定一因为是恶人的丈夫，也是恶人，所以也倒霉了。一句话说完：裁决这事的依据不是法律是非，而是道德上的善和恶。如果用法律来裁决，尽管严慰冰不对，但有个轻重的程度，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有依据的。用道德来裁决，只有善和恶，可以轻也可以重，尺度完全掌握在胜利者的一方，也就是有实力的一方。

纵观整个文革，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就是那些法律规则已经没有用了，用道德标准来衡量。只要把你推入道德天平上弱势的一端，例如叛徒、内奸、里通外国，那你就只能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林彪开这个证明，看起来固然可笑，实际上是想从道德上洗白自己，也就是占领道德上的制高点。有了道德制高点，加上绝对实力，在那个用善恶观念代替法理尺度的时代，可以无往而不利。了解了这一点，还会认为那个举动很可笑么？

正是占领了道德高点，当陆定一老家被抄之后，叶群才能让红卫兵把所得之物全部给拉进京：陆家长辈曾挂过的几幅画轴，其中一幅上竟画了个顶戴花翎，身穿朝服的清代官员——毒草，四旧；还有一部残缺不全的家谱，算是搞封建迷信；抄出一顶破陋不堪的青布小轿，说明陆定一曾是一个“反动官僚兼恶霸地主”。为了收集更多的证据，又从县政府所存的旧档案中，找到几份陆家过去的地契——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铁证。最后，就连陆严两家好一点的锅碗瓢盆也认定是“剥削”来

的实物。

经过一番策划之后，这些“罪证”被拿出去展览。证据不够充实，叶群大显神通，从国库里面拿出来几十捆大面额人民币，外加十几个纯金元宝，配上一些来路不明的绫罗绸缎之后，就足够充分了。那个年代简朴的人们看到陆定一同志如此奢侈糜烂，简直罪恶滔天，对骄奢淫逸、穷凶极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和仇恨。

代表正义一方的叶群女士，除了消灭了陆定一和严慰冰，还把展览中的战利品瓜分一空。抄家得来的有用物品被象征性拍卖，一件皮大衣卖十元钱，一个清代出品的陶瓷花瓶标价五角。九一三之后，叶群的那些宝贝，大多通过这种方式“卖出去”的。此后这种展览会很快被推广到全国，一批人因此发财。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革定律之一，就是道德判定一切，道德高低取决于实力强弱。林彪写那张证明，只为还原自身道德上的清白。

既然说到陆定一，不妨多说一点。一九七九年，陆定一走出监狱。出狱之后的陆定一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还抱着外孙女失声痛哭，似乎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老人。陆定一的失声痛哭并非多愁善感，而是富有人情味的体现。因为多愁善感的老人不会干接下来的事。一辈子大风大浪都经历了，辉煌和磨难都有了，人也到了风烛残年，此时的陆定一还能干点啥？当官，退休，之后呢，还有反思，用心和灵魂在反思。陆定一的反思相当广泛，而且实用，比方说关于历史和腐败问题。

关于对待历史问题：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宜粗不宜细——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宜细不宜粗——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光有党内“自律”不成，还要加上外力作用，即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要加强纪律性，促使党员自律，自觉克服贪污腐败，同时借助人民监督和舆论监督。在自律的基础上，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凑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的建设。

还有其他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看看。这是一个老革命风风雨雨数十年之后反思出来的金玉良言，并不高深，但和广大老百姓的想法一致，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如果党员都有这样的觉悟，如果党能使每一个党员都有这种觉悟，如果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促使党，使它的党员达到这种觉悟，国家何愁不能强大？！民族何愁不能复兴？！

陆定一的最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还是老百姓的心声。

三、案例之二：孙维世之死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号，北京五角楼牢房里，一个女人死了。十月十四号的北京城，已经是秋天，清早或夜晚需要穿外套，六八年北京的气候要比往年寒冷。那个女人死的时候穿的衣服很少，手上还带着冰冷的手铐。除了手上的手铐，据说她的脑袋里还有钉子（只有东林党硬汉杨涟也才能享受如此的待遇）。

——她是被折磨死的。

即使是在六八年那种疯狂的岁月，如此蹂躏一个女人也是一种罪过。这个女人是谁呢？她就是孙维世，一代才女，号称红色公主。如果这一切还不够说明她的身份如何显赫，那就先介绍一下她身边的人。

她的父亲是朱德和周恩来的挚友。

她的养父叫周恩来。

林彪曾经热烈追求过她。

她可以随意出入中南海，并且深受毛泽东的喜爱。

看看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彪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人物，这几个人曾经干过那么多惊天动地的事业。他们通力合作促成新中国的诞生，让中华民族再一次重生，用自己强有力的手臂把各自的丰功伟绩刻在了史书上。

一九六八年，朱德依然德高望重；周恩来位居国务院总理，第三号人物；林彪，第二号人物；毛泽东已经成为了神。这些关系竟然没能保住孙维世的性命！毫无疑问，这些现在看来能够翻云覆雨的大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掉，但孙维世还是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这就是当年文革的一个侧面：没有谁是安全的。

为了把这个侧面说得清楚一点，多说说孙维世这个人。

孙维世，生于一九二一年，和王光美同龄；性格：倔强，天真，任性。

她的父亲孙炳文是个热心汉子，行径和早年的贺龙类似。年轻时代的孙炳文因为过于热血而被

学校开除，后参加激进组织“铁血团”，参与密谋刺杀清摄政王载沣，试图推翻清政府。清政府灭亡之后，又反对并试图刺杀袁世凯。现在大家津津乐道“朱德寻找党”的传说，孙炳文就是这个传说的主角之一。孙炳文这种血性而倔强的性格都遗传到了他的儿女身上——儿子孙泱为朱德的清白而死，而女儿孙维世宁死不愿意玷污周恩来。

一九一七年，孙炳文认识老乡朱德。两人一见如故，肝胆相照，相见恨晚。孙炳文佩服朱德的大气、朴质，朱德欣赏孙炳文的阅历与豪情。随后两人携手合作，在护法战争中成为莫逆之交，一起在滇军中工作。随后几年，两人都是几经沉浮，脱离滇军而在北京相会。两人一起寻找中国共产党，结果在北京没有找到陈独秀，然后到上海同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起去拜访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被陈炯明搞得很狼狈。孙中山表示先提供十万元作为军饷，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军队。金汉鼎答应了这个要求，之后官至国民党陆军上将，四九年倒向中共。孙炳文和朱德婉言谢绝了孙中山。随后朱德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拒绝了朱德。随后朱、孙两人结伴游历欧洲。后人不知，朱德寻找共产党的一路中均有孙炳文的陪伴相随。

朱德和孙炳文在法国见到年轻十岁的周恩来，方才如愿加入共产党，身份是秘密的，对外的政治身份仍然是国民党员，这么做是为了工作需要。三年之后，两人取道莫斯科回国。孙炳文刚刚回国就被邓演达等人联名电邀去广州，任国民革命军上校秘书兼黄埔军校教官、广东大学教授。孙炳文在黄埔军校干得很不错，和周恩来等人的关系也很铁。此时的孙炳文，比四川老乡聂荣臻的地位还要高。如不死，前途当不可限量。

然而好景不长，两年之后，蒋介石清党，孙炳文在上海被俘，宁死不屈，四天之后被腰斩于龙华，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颇有谭嗣同的气概。听到孙炳文被杀，久经沙场，见惯尸山血海的朱德禁不住失声痛哭。朱德忍着悲痛给任锐写了这样一封信：“鉴闻浚明凶耗传来，（肝）脑皆裂，顿失知觉。死者已矣，我辈责任更加。德本日出发抚州，誓与此贼辈战，取得蒋逆头，以报浚（明）。（抵）上海经过情形如何及前后材料汇集成书，以示同志，而发其未竟之志。近来经济情形，是否可以暂维持，均祈示知。此间工作忙极。此祝努力节哀，留此身体，除此贼辈。”大意就是我很难过，我要继承他的事业，为他报仇。此后朱老总南征北战，总是把孙炳文的儿子孙泱带在身边当秘书。然而朱老总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这段经历，导致了孙泱在文革中丧命。

孙炳文死时，孙维世年仅六岁，尚不知愁为何物。

少年时代的孙维世活泼好动，喜欢和大她一岁的六姨任均一起玩耍。据任均回忆：“维世从小就喜欢学艺术明星的动作，一高兴，就叫我说：‘六姨，你看。’然后对着镜子摆姿势，比划来比划去的，学得可好了。我们俩学人家明星，把围巾围在肩上，在床上又唱又跳，蹦来蹦去地玩儿。每

天晚上都特别开心地蹦半天才睡。”

初中时代，孙维世由三姨夫冯友兰资助去北京念书。一九三五年，十四岁的孙维世和十五岁的六姨跟参加地下党的妈妈任锐去上海。由于小时候对明星模仿多了，孙维世和任锐要去学表演，任锐就请地下党的同志帮忙，把两人弄到天一影片公司东方话剧社去学习。此后两人假装姐妹俩，隐姓埋名，做了“海漂”一族，偶尔在剧场客串一些小角色。天一公司地处徐家汇，常常能见到一些明星，拿到明星签名啥的。某日，一个叫蓝萍的女人拿着自己的签名照到处派发，蓝萍就是江青。当时的江青并不出名，在公司发自己的签名照，算是一种公关吧。若干年之后，凡是拿过那张照片的人都要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这是孙维世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命中克星——江青。在和江青的交往中，孙维世尽显天真的一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六岁的孙维世辗转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但没人认识她，只好一个人站在门口伤心痛哭。哭着哭着，来了一个人——周恩来。一番沟通交谈之后，周恩来很讲情义，没有嫌弃这个失去父亲的孩子，还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一直带在身边，从武汉带到延安，从延安带到苏联。从那时起，孤儿孙维世来了一个华丽大转身，变成天之骄女。孙维世喊周恩来为周爸爸，喊邓颖超为小超妈妈。文革中，孙维世宁死不愿意说周恩来的坏话，也是和这段缘分有关吧。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也说，种下善根，方有善果。

周恩来夫妇没有孩子，视孙维世为掌上明珠。孙维世念书，疑难之处就由邓颖超借油灯之光亲自讲解，有时候周恩来也指点一下。延安的孙维世再次和江青结下不解之缘。由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孙维世也经常到毛泽东的家里去。毛泽东和江青当时也很喜欢她，两人曾经同时登台，在同一出话剧里演出角色，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喊孙维世为“大小姐”。此时的江青还是和颜悦色的，仅仅因为她还是延安窑洞里的一个家庭主妇，还没有呼风唤雨的能量。

三九年，周恩来去苏联治病，孙维世也想跟着过去，但需要毛泽东的批准。孙维世立刻飞身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大笔一挥，准。当时的莫斯科有很多烈士后代，在学校学习不同的专业。孙维世按照自己的爱好选择了表演和导演。在那里，孙维世遇到她生命中另外一个男人——林彪。

俗话说，女大当嫁。周恩来的掌上明珠从来不缺乏追求者。延安时代的孙维世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就有人来提亲，被周恩来夫妇挡了。加上孙维世从小外向，受前卫思想的熏陶，整天在大人物中间玩耍，对对象的要求自然不一般。在那个爱情还没有流行的年代，孙维世表现得过于超前。婚恋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也注定是悲剧的。

在红军时代，林彪已经战功赫赫。平型关大捷之后，林彪更是声名鹊起，头顶“抗日名将”的光环。悲剧的是，名将林彪竟然被友军误伤，很严重，只好离开战场到苏联养病。在苏联，林彪遇见孙维世，他那颗铁血的心跳出了一生中最欢快的节奏。

早在延安，林彪还是抗大校长的时候就见过孙维世，只不过那时候林彪和美女张梅刚刚结婚，生活比较美满，加上林彪的性格和工作的关系，谨慎沉默，很少在意生活的事，也就没怎么留意孙维世；就算留意了，也不会说的。至于是否留意，已经没人知晓了；唯一知晓的是，在苏联，林彪和张梅的感情出现问题，据说是因为性格不和。

林彪沉默寡言，喜静不喜动；而张梅活泼外向，喜动不喜静。当时林彪有伤在身，行动也不是很方便。对于一个真正的将军而言，战争年代远离战场是一种怎样的折磨，常人是难以想象的。对普通人而言，油价上涨都难受不行。林彪是真的爱打仗这一行。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对蒋介石大不敬，蒋介石给张学良的惩罚也就是养起来，不让上战场，张学良为此郁闷不行。张学良对战场的渴望远不及林彪，因为林彪是一个为打仗而生的人，所以林彪心中很受伤，很需要人来安慰。张梅偏偏不理解林彪，时不时出去参加个聚会啥的。

其实孙维世的性格也不适合林彪，但林彪因为张梅的大大咧咧而心灰意冷时，却又爱上了同样性格外向的孙维世，只能说爱情是个不可捉摸的东西。当然，比起在陕北土生土长的张梅，孙维世更漂亮、更有气质、修养更好，而且幽默；或许还有一个不便说出来的理由——背景更好。周恩来的干女儿嘛，相当于最高层那几个窑洞里的小公主。

林彪追求孙维世的手段很简单，就是闲了没事就去孙维世住的红色大楼，和一帮留苏年轻人瞎唠嗑，讲讲战争史、散散步啥的。林彪的相貌并不出众，估计说故事的水平也一般，幽默细胞都被战略、战术、战争、战场给消耗了。但是林彪也有优势——是名将，是英雄。对很多女孩子而言，这都是致命的诱惑。然而孙维世是个例外：当时的孙维世却是豆蔻年华，正在做白马王子的梦，身边不缺追求者，据说刘亚楼就是其中一位，还很勇猛，是公开追求的。林彪虽然扬名在外，但也有致命弱点，就是老婆还在身边，而且怀孕了。对一个还处在幻想年龄阶段的少女来说，这是不可忍受的。

我们都知道林彪的战术风格是沉稳机变，总是牵着对手的鼻子走，静候对方落败。按照战场上的水平，林大元帅应该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男性魅力，静候孙维世芳心暗许。可惜这一套在情场上不怎么受用。林彪自己首先忍不住了，向孙维世敞开心扉，遭拒。

林彪回国时要求孙维世一起回国，遭拒。

林彪回国，和叶群结婚。后来孙维世回国途径东北，林彪还激动不已，惹得叶群闷头吃醋好几碗。笔者忍不住又要提出假设，假设林彪和孙维世结婚会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以孙维世的人品，绝不会做后来叶群做的那些事，也许林彪就不至于葬身异国。然而这样就会惹出另外一层关系。假如林彪和孙维世结婚，那么就会拉近林彪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的政坛格局就会发生改变。如果林彪和周恩来联合起来，毛泽东绝不会视而不见。也许林、周两人都要在文革中被打倒。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文革，因为文革没有林彪和周恩来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高层将帅之中，林彪已经是最年轻的了，如果连林彪都看不上，孙维世还能看上谁呢？没有了。当孙维世拒绝林彪之后，也就意味着不会找一个将军当老公了。战争年代，要从共军中找一个高大威猛、温文尔雅，且战绩彪悍的将军非常不容易，林彪是一个标尺。不嫁给林彪不要紧，林彪还是要找老婆的。林彪要找老婆很容易，要忘掉孙维世却很难。林彪忘不了孙维世，林彪的老婆是要吃醋的。林彪的老婆吃醋，后果很严重。因为林彪，孙维世遇到了生命中另外一个克星——叶群。可以说正是江青和叶群克死了孙维世。孙维世从苏联回国，取道东北，林彪既激动又兴奋，叶群则暗淡无光。晚饭桌上，孙维世流光溢彩，而叶群像黄脸婆，林彪则闷不做声。如果孙维世同意，她还是可以嫁给林彪的。

正当孙维世准备去东北工作的时候，叶群用李立三的名义给周恩来发电报，让孙维世不要来东北了。如果孙维世真的去了东北，结局还真不好说。婚姻不是问题，孙维世和金山恋爱，金山也有老婆。据说，林彪从此对李立三恨之入骨。

当然孙维世也不是那种非要从某个行业内找丈夫的那种女人，她看重的是爱情。但爱情往往不遂人愿，你看重它，它未必看重你。为了爱情，他非常任性地拒绝了刘亚楼，拒绝了林彪，拒绝了其他人。为了爱情，她又非常任性地嫁给另外一个别人看来不该爱的人，那便是后来的丈夫金山。

金山是孙维世一生的最爱，也是一生的最痛。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金山和林彪没有可比性，俗话讲就是，金山给林彪提鞋都不配。如果不是孙维世，没有人把金山和林彪联系在一起。然而站在一个任性、爱幻想的女人角度上看又是另外一回事。金山，苏州人，原名赵默，生于一九一一年，比林彪年轻四岁。金山原本生于富商之家，可惜父亲早死，家里的大管家成了家庭的新主人。金山十几岁便出门闯荡。

金山是那种放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生存下来的人，因为他很能混。早年闯荡上海滩期间，竟然同时混入杜月笙的门下和共产党内部。当年有这两层关系，相当于有了免死金牌。要知道，蒋介石对杜月笙都很客气。同时给共产党当特务，那是没人敢惹啊！无间道的剧本里也没有这般牛人。

而且凭借堂堂仪表和伶俐的口才混入话剧界，成为著名演员，放在现在就是一部励志剧，和刘德华的励志故事有一拼呵。

金山同志不仅懂得生存，更懂得获取女人的欢心。据现在能考证到的资料，金山同志利用自己的混功，常常和剧中的女主角擦出爱情的火花，火花又常常很快熄灭。最牛叉的时候，据说同时追求话剧界的“四大名旦”，最后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结婚。

一九四九年，二十八岁的孙维世遇见三十八岁的金山时，金山的老婆就是张瑞芳。当时孙维世的绰号是“红色公主”——新中国第一号待嫁女。孙维世是导演兼演员，金山是主演。金山再一次发挥自身优势，故伎重演，利用演戏的机会赢得孙维世的芳心。说真的，孙维世虽然有种种优点，有时任性骄傲，眼高于顶，但女人终究要嫁人的，挑来挑去等到二十八岁，放在今天都是剩女了。这样一个老姑娘，遇到金山这种风流老戏骨，能顶住才是怪事。

下面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金山和孙维世相爱，然后结婚，张瑞芳黯然离婚。演艺圈内永远就是那些事，从来不新鲜。对于这段婚姻，周恩来肯定是不赞同的。周恩来是什么人啊，一生守在邓颖超的身边，不离不弃。而且周恩来目光如炬，一眼就看透了金山：能演戏，终究是花花公子一个。这种人如果能托付，母猪都能上树。想和这种人结婚，就等老了，没风流劲时再嫁给他，年轻时还是玩玩就算了。孙维世虽然很能玩，却继承了周恩来的品格和婚姻观念。

两人结婚那天，周恩来没有出面，只送了一件礼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然而这件礼物没管用。第二年，金山同志去朝鲜慰劳志愿军，本性复发，和金日成一个女秘书搞上了。这事放现在没啥，但是在战争年代就不一样了。朝不保夕的情况下，间谍横行，女秘书可以私下里搞关系的话，也可以私下里泄密，所以金日成直接把女秘书给毙了，虽然残忍了点，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金山同志因为是中国人的缘故，直接押解回国。如果是平常，回国后的金山不死也得掉几层皮。然而金山毫发无损，仅仅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确切地说，不是因为他是孙维世的丈夫，而是因为孙维世没有离开她。

当时开批斗会，大家让孙维世表态。孙维世如果划清界限，金山必死无疑。然而孙维世却说：“金山犯了不可原谅的罪行，我相信，这是他最后一次了！”此后金山下放去劳改，孙维世如影相随。这样就出现了有趣的情形：孙维世一方面是自由出入中南海的“红都公主”，另一方面又是劳改犯的老婆。

据孙维世的六姨任均回忆：“维世那次来，只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

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患难之中不相弃，孙维世非常了不起。这个举动很难说完全出于爱情，如果仅仅是爱情，以孙维世刚烈的性格应该离婚了，哪怕还有残存的爱；应该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吧。毕竟一个大活人，毕竟一夜夫妻百年恩。就这事上，不能不佩服林彪的眼光，孙维世的确是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如果她是林夫人，呵呵，且按住不说。

如果说爱情中的孙维世是任性的，那么待人处事中的孙维世则是天真的。孙维世虽然早年丧父，生活漂泊，但基本上没有接触过复杂的人际关系。碰见周恩来之前，她一直在念书。碰见周恩来之后，就成了中共高层的宝贝。大家都宠着她、溺爱着她。出现在她眼中的生活，大概就是革命的神圣，而没有革命背后的种种谋略和暗算，因为周恩来已经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把一切困难艰辛都自己一人扛下。孙维世的天真在她与江青的交往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江青和孙维世相反，可以说历尽波折，啥事都经历过。去延安之后，江青虽然贵为一把手夫人，仍然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才咸鱼翻身。在江青翻身的过程中，需要更大的政治能量。江青的背后虽然是毛泽东，但身为领袖，帽子不可能直接拿出来给江青摇旗。江青的身份是毛泽东的代理人。要增加自身威望，必须借助其他人，谁呢，就是毛泽东的铁杆战友。当时的中央大人物之中，无条件支持毛泽东的，只有林彪一人。所以林彪的夫人叶群和江青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林彪自称毛泽东的学生，叶群则跟着江青混。

除林彪外，另一个无条件支持（至少表面上）毛泽东，且能量巨大的就是周恩来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女士是个老革命，资格很老，威望很高，而且和江青没啥往来，断然不会像叶群那样自称为江青的“学生”。江青要和周恩来扯上关系，孙维世成了一个绝佳的拉拢目标，理由很多：孙维世是小字辈，跟在江青后面合情合理；孙维世和江青早就认识，两人曾经在延安同台演出过；孙维世可以自由出入中南海，能够轻而易举地见到各个大人物，容易探听到各种情报等等。有了这些便利条件，想不被江青盯上都难。

建国之后，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翻译小组组长就是孙维世，其中和毛泽东有过不少合影，收集到不少毛泽东的亲笔字等等，回国之后江青一再追问毛泽东在苏联的活动。在孙维世结婚那天，江青还在追问，孙维世则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江青此举的动机，存在很多猜测，我认为很简单：跟孙维世套近乎，找共同话题嘛。周恩来是第三号人物，江青去套近乎可以理解。因为江青除了跟

孙维世套近乎，还跟二号人物的夫人王光美套近乎，也就是聊一聊衣服怎么穿、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行踪啥的。江青那个人很能折腾，总是表现得非常骄傲，有时候歇斯底里，处理人际关系不在行，即使拉关系也表现得很怪。没办法，江青那个人行为举止一贯乖张，“亲切交谈”之类的技术根本就没有掌握过；而且眼高于顶，能进入她法眼的也就最高层那几个人，一开始是周恩来和刘少奇，后来是林彪。

那么毛泽东为何如此“厚爱”孙维世呢？把这些问题扯到男女关系上、爱恨情仇上，无疑更煽情。然而我相信，在血与火的时代，爱恨情仇从来都不能主导时代的大幕。原因很简单，毛泽东不仅“厚爱”孙维世，同样也“厚爱”林彪的一对儿女，同样也“厚爱”过刘少奇的儿女，这些在回忆录中都很清楚。因为毛泽东和这些孩子的父亲是“战友”，所以把孙维世的事往男女关系上扯，只因为孙维世是个漂亮、有才且有故事的女人而已。如果毛泽东要爱，没人挡得住；毛泽东要恨，也没人挡得住。只有在政治上，毛泽东才会表现得如此曲折迂回。

当毛泽东要整顿文化界，当江青上蹿下跳表演时，孙维世就成了一个天然的拉拢对象。叶群固然好，然而只能当一个敲边鼓的，毕竟专业不对口。孙维世就不同了，本身就是戏剧界的明星嘛，专业就是搞戏剧的，加上她巨大的活动能力，有了她的加入，江青将如虎添翼。所以才会出现这般情况：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找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改编成样板戏。孙维世听后，天真地睁着大眼睛看着江，天真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

此时的孙维世是大明星，可能觉得和江阿姨这种三十年前的上海小明星没啥共同语言。江很生气，但后果不严重，因为那时是六三年，江青还没有杀人的能力。所以说孙维世很天真。年过半百的江阿姨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并非本人的戏剧才华如何了得，而是背后那个人。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落实。周恩来亲自指导了大型歌舞剧《东方红》。江青笑了，好你个小样孙维世，看你这次如何拒绝江阿姨，还是逃不出江阿姨的手心。在周恩来的座谈会上，江青跑过来坐在孙维世旁边，说了一大堆话，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弦外音：还是乖乖地跟着江阿姨混吧，有前途的。

没想到天真的孙维世同志依然不买账，天真地以为江阿姨不会有大作为，天真地跑到大庆油田演戏去了。在大庆油田，孙维世再次火了一把。通过自身的努力，六六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看后给予很高的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演了一遍又一遍，风头尽出。此时以文艺界领袖自居的江青同志自然不能坐视。虽然此时的江青已经羽翼渐丰，但是孙维世如同一块肥肉，有背景、有关系、有才华，网罗过来百利无一害啊。

于是江青决定再给孙维世一次机会，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的工作与她商量。天真的孙维世没怎么在意。之后江青亲自登门拜访，满面笑容地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我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好好合作。”面对亲自登门的江阿姨，孙维世依然天真卖萌，没有立刻答应。江阿姨也没有苦苦相逼，让孙维世再考虑考虑，过几天再来找她。此时孙维世再次天真地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等等。其他人也有拒绝江青的，好歹说得委婉一点。可以想象江青当时的愤恨，她像一只骄傲的孔雀一样摇摆着，没想到孙维世视而不见。好你个孙维世，竟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你等着。

江青曾对孙维世说：“我是主席夫人，你是总理女儿，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大，可以对付那些想对付我们的人。”江青说的是实话，也是心里话。天真的孙维世却不明白政治上的阴险，也不想去明白，她只是凭着自身的好恶去处世。她不喜欢江阿姨，就是不喜欢江阿姨，所以三番五次拒绝不合作，也不懂得虚与委蛇。江青不是一个喜欢掏心窝子的人，她既然这样和孙维世掏心窝子，其实是给孙维世划线，要么朋友要么敌人。玩政治的就是这样，掏了心窝，非友即敌。要怪也只能怪江青不够老练，在把握不足的情况下掏心窝子，把双方的路全给封死了；要怪也只能怪孙维世过于天真，把世事想得过于简单。

孙维世天真地以为只要走自己的路，就身正不怕影儿斜。孙维世本人是很正，根正苗红，可惜她的影子并不正。她的影子就是金山。要揭金山的老底太容易了，好比用道德的戒尺去衡量娱乐圈，生活腐化、道德堕落、勾搭妇女、引诱儿童，那是要啥有啥。为啥要修理金山，除了他是孙维世的丈夫外，还因为他是上海滩的旧明星。江青也是旧明星，而且是星光暗淡的明星。

通过第一个案例——林彪写处女证明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文革的标准不是法理，而是道德标准。林彪不惜以家丑外扬的方式洗清道德上的痕迹，江青也不例外。

那个时代的影星和现在可不一样，影帝影后啥的都免谈，也就是装饰逗乐的，也就是说“身份不好”，属于旧社会的大毒草。大毒草可以消灭也可以改造。鉴于江青同志也曾位列毒草之中，要洗白自身，就要用强力除草剂除掉别的毒草，这样就没人知道江青也是毒草了。比如说以王莹女士为代表的一帮人，被关，被整，最后疯的疯，死的死。即使金山同志不是孙维世的丈夫，依然在劫难逃。

孙维世最后一次拒绝江青的时候正值文革进入高潮。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七年年底，孙维世在家中听到了敲门声。随后一群“公安人员”冲进来，说有要事找金山商量。金山曾干过特务，没有慌张，临走之前像平时一样对镜子臭美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

下，你在家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这是金山最后一次对孙维世笑，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说实话，之前的金山虽然风流成性，经过劳改之后已经体验到新时代新国家的力量，安分十几年了。但是文革算的是旧账，而金山身上的旧账、烂帐很多。当然不能说抓金山是因为他是明星，得有一个有分量的罪名“特嫌”。有了这个罪名，周围的人就和特务扯上了关系，下一步如何操作就看操作者的心情了。

拒绝江青之后，孙维世的日子可以说举步维艰。之所以能享受如此待遇，无非她有一个养父叫周恩来。文革之初的周恩来处于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刘少奇和邓小平倒下之后，另一个可能倒下的就是周恩来。文革初期，政府陷于瘫痪。但当时大家的热血淹没了脑细胞，处处煽风点火，对副作用还没认识到，所以周恩来“到处灭火”的现实作用还没有展现出来。等文革第一波高潮过去之后，周恩来的地位就稳住了，不管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都意识到：革命之外，活还是要周恩来干。

有人贴周恩来的大字报，有人以极其卑劣肮脏的言词追问孙维世和周恩来的关系。然而人际关系中的孙维世固然天真，爱情中的孙维世固然任性，但是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原则上，孙维世又体现出刚强和倔强。不论如何询问，终究一无所获。因为她是特务的家属身份，享受如下待遇：剃光头。对于一个爱美的女人，对于一个骄傲任性的女人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羞辱啊！

据孙维世的六姨任均回忆：“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维世敲开了我的家门。她带着帽子，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在脖子上围得很高。我的孩子们平时都叫她兰姐，这次，她只是对问候她的表弟妹点头笑笑而已，就进到我屋里。掩上门，她把帽子掀开一点儿让我看。我大吃一惊：她的头发已经被剃光了。给女人剃光头，是文革初期的一种革命暴力方式。看到她的样子，我心疼极了。维世是个多漂亮的人呀！怎么会被弄成这个样子？维世告诉我：‘六姨，金山已经被抓起来了。’我说：‘啊？那你可千万当心。你就一个人怎么办呀？他们会不会抓你？’她说：‘六姨放心，我没事儿！’我说：‘江青可别不放过你。还有那个叶群。’她说：‘她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她江青能抓我什么呀？我没有任何把柄让她抓！’维世愤愤地说：‘他们让我说总理的情况，想从我这儿搞总理。总理（的事儿）我有什么可说的？我能说什么？我又不会胡编乱咬！我看不出总理有问题！’她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能被人整的问题。维世说：‘搞总理，就是想把主席身边的人都打倒，她们好为所欲为！’那时候，我们都以为是‘清君侧’。”

——天真，任性，倔强，都包含在中间了。

然而天真的孙维世还是太托大了，江阿姨要抓人总是有办法的，何况她还有战略盟友叶群同志。江青虽然上串下跳叫嚣得厉害，但实际杀伤力不如叶群大。江青背后的大腿虽然更粗壮，对江青却有所限制，该让江青知道的让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让知道。林彪长期泡病号，叶群是林彪的对外

代理人，四大金刚啥的都要听叶群的话。当江青对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抓。”孙维世的结局就能预测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孙维世再次听到敲门声，一群人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孙维世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这个监狱连周恩来都找不到。在中共高层中，周恩来的党政军特中都有很深的根系，硬是找不到孙维世关在哪，直到她被折磨至死，被火化方才知晓。抓捕孙维世的是一批现役空军，指使者叶群，叶群的背后是江青。

常言道，自古红颜多薄命。在那个搏命时代的红颜更加薄命。狱中的孙维世惨遭折磨，但是她完全承受了下来，维护了最终的尊严和骨气。她可以屈服，但是没有。她可以懦弱，也没有。如果她屈服或者懦弱，也没有人怪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生命。即使她屈服、懦弱，写点黑材料，周恩来也不见得会怎么样，也不会怪罪她，因为他知道她是被迫的。她选择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凌然不可欺。那些折磨过她的卑微的生灵，以卑微的方式被遗忘在卑微的时光之河，而孙维世依然耀眼。当她用娇弱的身躯面对那些残酷、没人性的折磨时，她的天真，她的任性都已不再重要，世界将记得：她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不愧是孙炳文的女儿，不愧于周恩来的栽培，不愧于红都公主的称号，不愧于华夏女儿的英灵。

评：孙维世是一株生错地方的玫瑰。

同情孙维世之余，再来看看她周围错综复杂的关系。孙维世的逮捕令是周恩来签发的，同时签发的逮捕名单上还有周恩来的弟弟和王光美的哥哥。周恩来为啥要这么做呢？局势逼的，正如林彪写处女证明一样，都是为局势所迫。

江青找到啥证据呢？也没啥证据，就是请李立三的老婆看过戏。在那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苏联特务”这顶帽子非常流行，凡是跟苏联有关系的都能和特务扯上。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是苏联人，就成了苏修特务。李立三已经完蛋了，李莎还在。恰好孙维世也在苏联呆过，并且给李莎赠送过戏票。根据莫须有的逻辑：和特务有关系的人也可能是特务，孙维世和李莎有关系，所以也可能是特务，就算还没能证明孙维世是特务，可以先假设为特务，然后再慢慢证明，一直证明到最后。江青同志就根据这点弄出材料证明：孙维世是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江青把资料放在周恩来面前，还美其名曰为总理着想，免得被狼咬了。

现代人可能觉得周恩来批准逮捕令太残酷了，是为了自我保护。这也太小看周恩来了！周恩来那种人，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孙维世而生存或灭亡。要整周恩来，借口比刘少奇还多。周恩来本人亲自跟蒋介石、跟苏联打交道多了去了，还多次反对过毛泽东，甚至逼过毛泽东下岗。那年代，特

务遍地都是，家家都有，比方说罗荣桓的妻弟就是特务。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程度绝不低于林彪。就算孙维世真是特务，也不能马上就能扳倒周恩来。尽管如此，孙维世的事依然足够让周恩来闹心的。敲打敲打周恩来而已，周恩来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签发了逮捕令。根据周恩来的策略，是想把几个人放在监狱里保护起来，免得被抓走批斗，正如他保护其他人一样。后来邓颖超曾跟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谈过这事：“当时想，放在里面也许比在外面更安全。而且你们(指江青她们)说是特务，抓了起来，你们得给个交待。”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江青和叶群出于另外的原因，把孙维世关到一个连周恩来都找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周恩来失算，他提供的保护伞质量不过关。

不少人很纳闷，以周恩来的英明神武，怎么就弄不过江青、叶群那两个娘们呢？不是周恩来奈何不了江青和叶群两个娘们，而是奈何不了她们背后的男人。

这个局势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没有人可以反抗。江青拉孙维世，实际上是毛泽东拉周恩来，就这么简单。正如江青拉拢叶群，实际上是毛泽东拉拢林彪。孙维世不听话，自然要敲打敲打。但是毛泽东本人只负责大方向，细节问题是不过问的，一贯以来都是这样，这是他的用人策略。战争期间放权给元帅、大将，建国期间放权给刘、邓、周，以及其他封疆大吏，文革还是放权，放权给林彪和江青身边那帮人。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战略问题归毛泽东，细节问题归其他人。某人被打倒了，毛泽东也许会知道。至于入狱以及入狱后的事，那就是细节问题了。他没精力管那么多。就算毛泽东可以给孙维世提供保护伞，中间隔好多道墙呢，够不着。

另外一个可以提供保护伞的人是林彪。林彪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档事。因为六八年的林彪差不多病入膏肓，整天苦思冥想、偶尔划两个火柴玩玩，每天听报告听不了多久，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管那些琐碎了，有点精神头就翻医书给自己开药方去了。而且叶群是林彪的过滤器，不会把孙维世的消息透露给林彪的。可能林彪也知道，但也无能为力，因为他既不能和江青闹翻，也离不开叶群这个能干的“贤内助”。就算某个时刻林彪心动了，转念也可能会想，连她爹周恩来都不管，我干嘛去操这个闲心。

毕竟三十年过去了，林彪已经那个三十岁的将军转变成六十岁的政治家。

当时国家几个最有权势的人物都不想孙维世死的情况下，孙维世惨死了，死在江青和叶群手上。江青为何要让孙维世去死。原因很简单，孙维世的死对江青好处多多：解恨，竟敢长期不买江阿姨的账；立威，从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除去一颗知道自己毒草身份的毒草；给周恩来下一个诅咒，即养了一个以反革命为己任的女儿，为攻击周恩来铺路。

世事就是这么诡异：很多人对权力顶礼膜拜，以为权力可以无所不能，事实却不是这样的。任何人的权力都是有界限的，如果世人能认识到这一点，改革或者改制都会简单很多。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对权力的崇拜，而是首先对权力的认识，然后才是对权力的监督、限制。

结论：孙维世之死，意味着文革期间没有谁是安全的。

四、案例之三，批判朱德

（一）红军之父

孙维世入狱之前，除了有一个特嫌丈夫，还有一个特务哥哥，他叫孙泱。孙泱是孙炳文的长子，曾和孙炳文一起被捕入狱，孙炳文死后，孙泱出狱。战争年代曾在朱德身边当秘书，文革时任人大副校长。据任均回忆，孙泱小时候非常淘气，长大后却是温文尔雅、开朗乐观，很讨女孩子喜欢。由于孙泱在朱德身边的时间较长，对朱德比较了解，就参与编写《朱德传》一书。那本书和现在的《朱德传》差不多，毕竟朱老总的人品事实摆在那里，正常情况下内容大概不差。然而当时的环境却很不正常，不正常的环境里总有很多不正常的人，张春桥同志就是那个不正常群体里的一个光辉代表。张春桥同志在文革中到处淘宝，有一天看到这本《朱德传》，喜出望外：好啊，淘到宝贝了。张春桥想：哪个臭不要脸的把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开国元帅的？嗯？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干就落得这么多好处。当时“朱德的扁担”已经变成“林彪的扁担”。“气愤之极”的张春桥下令追查此事。《朱德传》编写组的几位作者惨了，人家本来就是“臭知识分子”，本想参与编写朱老总的传记捞点政治资本，这下反而捅了马蜂窝，怎么办？算了，知识分子的骨气、脸面先丢一边，检讨吧，说自己不小心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说这本书如何狗屎，借此表示要“重新做人”，那意思就是说，张大老板，给条活路吧，就当俺们这些知识分子是个屁，给放了。张春桥同志笑了，让你们平时嘴上说得天花乱坠，事到临头还不是下跪求饶？不收拾你们这群软骨头，世界就没有宁日。然而软骨头中间也有硬骨头，那硬骨头就是孙泱。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事实。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年轻时代就进过监狱的孙泱和他的父亲孙炳文一样，不肯低头。不肯低头的孙泱还是成了“特务”，并且以特务的身份“畏罪自杀”——实则是他杀。

不少人对孙泱的选择不以为然。孙泱就是傻啊，干吗不装孙子保命呢？孙泱并不是傻瓜，傻瓜不可能在战场上活下来。看看那些装孙子的人，转过头就要攻击自己写下的《朱德传》，就要攻击朱德，就要攻击不肯装孙子的孙泱。不肯装孙子的孙泱要付出代价，装了孙子的那些人也得付出代价。不装孙子的孙泱付出了生命作为代价，装孙子的付出的代价则是人格和尊严。以现在的价值观来判断，很多人认为生命比尊严更重要，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然而还有一点必须澄清，一个只会装孙子的集体会犯软骨病的，软骨头的人汇集在一起去敲硬骨头的，等到全部都变成软骨头之后，生命的意义也就没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生命的动物多了去了，阿猫阿狗都有生命，只有人类才有尊严。不想如阿猫阿狗那般活着，就应该去维护自身的尊严。如此，才能活得像个人。

朱德曾经想托周恩来保护孙泱。朱德一辈子极少托人办事，此次托周恩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不能看着孙泱就这样挂了。四十年之前的朱德还没有啥能量，因此不能保护挚友孙炳文；四十年之后的朱德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国首席元帅，再不保护战友的后代显然说不过去。可惜周恩来也无能为力，于是说出了那句无奈的名言：“有些人，我不保，日子还好过点；我越保，处境越差。”是啊，周恩来不是不想保孙泱，可是他连孙维世都保不住，连周恩寿都保不住啊。

其实查《朱德传》就是冲朱德去的。斗孙泱，也是冲朱德去的。此时的朱德年事已高，正逐渐淡出，可以说是人畜无害，为啥要冲朱德去呢？这也是笔者选择这个案例的原因：批判朱德，实际上是为了展示文革的力度。先让我们来看看伟大的朱老总伟大的一生吧。

一九一七年，二十二岁的孙炳文遇见二十一岁的朱德，给了朱德一个最为精准的评价：“大雅绝俗，无阴粗之难近。”又曰：“非与玉阶习者，而不知其口德之高洁也。”讲的就是朱德的大度和纯朴。后来毛泽东称赞朱德：“度量如海，意志坚如铁。”综合起来，朱德的性格就是这般：大度，纯朴，意志坚强。

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号，朱德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户之家。朱德出生时，朱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等老少十一口。朱德父母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六男二女。朱德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爸爸朱世林，一生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从未出过远门，每天除了干活就是干活。朱德的妈妈身材高大健壮，但性情柔和，生养一大堆孩子，但从不发脾气、不打人、不骂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品质。想一想嘛，那么多孩子，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需求。朱德妈妈相当于幼儿园到中学老师，一肩挑。别的不说，光吃饭问题就烦得不行。在这种情况下，她竟然不烦躁，不发脾气，不骂人，多么难得啊！日后朱德在军内面对各个派系山头嗷嗷叫，能够淡然处之，不能说没有来自他母亲的影响。

一个勤劳宽厚的母亲不仅可以影响孩子的性格，还可以通过自身对家庭的组织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朱德的家庭虽然不怎么样，兄弟姐妹众多，但是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朱德依然受到很好的教育，二十二岁那年，朱德加入云南陆军讲武学堂，成为蔡锷将军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参加云南辛亥起义、反对袁世凯的战争、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一路下来，朱德从一个宽厚朴实的农民兄弟变成滇军军官，并且立下战功，成为成功人士，人生前景相当广阔。如果这么一直过下去，不见得一定会飞黄腾达，至少吃穿不愁，还可以娶几个漂亮老婆。

然而朱德同志想要的，不仅是衣食住行而已，他觉得世界需要改变。如何改变世界呢？他也不知道，但他发现共产主义思想不错。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去寻找刚刚诞生的共产党，从北京到上海，从中国到欧洲，终于如愿以偿。当时国共两党是交叉的，很

多人有双重党员身份，例如陈独秀、毛泽东都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强大，共产党弱小。此时的朱德是国民党，以国民党身份加入共产党，非常稀少。这期间，朱德见过伟大的孙中山。孙中山出钱让朱德回云南搞革命，朱德拒绝了，只为寻找共产党。朱德找到赫赫有名的陈独秀，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看不上旧军阀的朱德，拒绝了。于是朱德去欧洲见了周恩来，方才如愿。

根据公认的观点，共军诞生于南昌起义。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但是南昌起义之中的朱德并不耀眼。他没有叶挺的资格老，没有周恩来的地位高，也没有贺龙的传奇和实力，更没有刘伯承的名将头衔，所以一开始只是第九军副军长，随后才转正的。如果非得说一个特点，那就是年龄大一点吧，一九二七年的朱德已经四十一岁，比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大。古人说，四十不惑。四十一岁的朱德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和人生，并坚定地忠于自己的选择。

然而南昌起义之后，正是这个资格不太老，职位不太高，名声不太响亮的朱德成了红军之父，偶然么？当然不是。

南昌起义失败了，八月三号撤离南昌，南下。八月份的江西酷热难当，没有水和食物，没有合理的休整，又有敌人四面包围，伺机进攻，队伍快速减员。这是一支没有根据地依托，没有后勤补给的孤军，如同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没人疼爱。接下来还是战斗，减员，再战斗，再减员，队伍经过宜黄、广昌、会昌等地之后，减员严重。队伍转移期间，朱德的职务是第九军军长和先遣队司令，一路上负责开路侦察、打先锋，还有搞宣传，筹集粮食等等。

会昌恶战之后，那支衣衫褴褛的队伍继续东进，进入闽北武夷山，此时已经九月份。他们的目标是继续东进，进攻潮汕，在那里可以得到出海口，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质援助。在三河坝那个地方，决定分兵行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的第二十四师，从处在粤闽边境的大埔乘船，经韩江顺流而下，直奔潮汕；朱德率领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约四千人留守三河坝，防敌军从梅县抄袭主力部队进军潮汕的后路。也就是说原本的先遣队变成掩护部队。正是这个转变，造就了朱德一生中最为重大的决定，他的伟大也始于这个决定。

三河坝位于广东大埔县的南端，位于三江口之上。汀江从北面向南飞流，梅江从西南面奔腾而来，两河交会后向南汇入韩江。三河坝对岸有一座八十多米高的山，叫笔枝尾山。它形如鱼尾，山势险要，松林茂密，群峰叠嶂，一山镇三江之势，进可攻，退可守，乃兵家必争之地。朱德把四千人布置在笔枝尾山一带，准备打阻击。

当年参加三河坝战斗的第七十五团团长廖运周如此回忆当年：“第二天午后，朱德在河滩竹林

旁边，召集全师官兵讲话。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朱德同志动员我们：要坚守三河坝，牵制敌人的兵力，为向海陆丰进军的我军创造有利条件。（当时我军已占领了潮汕）同时他指出：我军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革命的军队必须与农民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号召我们要发扬会昌歼敌的精神，保持铁军的荣誉，战胜来犯敌人。”

通过这段回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一个非常简朴的中年人，鼓励一群农民子弟兵，用非常简朴的语气说咱们要加油努力。朱德不仅说非常简朴的言语，还用非常简朴的行动教会大家如何防守阵地，如何打击渡水之敌。在朱德的教导下，这些士兵懂得了一些古老的战争招数，比如说“渡半而击”。战斗从十月十三号拂晓开始，打到下午三点，占优势的敌人已经对朱德进行半包围。此时朱德手下这批人，还是刚从国军中分离出来的，素质远不如后期的中共军队。尽管如此，朱德依然指挥他们顽强狙击敌人三天三夜，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再打下去很可能被包饺子。而此时狙击任务已经完成。朱德和周士第准备带着剩下的两千人去追赶主力部队。就在这时，朱德迎来了一生中最大的考验，而他的勇敢，他的胸怀，他的气质，他的魅力也在此时集中爆发。

当朱德他们在三河坝打狙击时，潮汕的主力部队已经失败了，而他们不知道。

周士第后来回忆：“三河坝战斗进行的时候，我们还不知潮汕已经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我们当时认为守住这个地区对主力作战有利，因此坚持与兵力超过我们许多倍的敌人作战。激战三天三夜后，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已处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就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圩、饶平到潮汕与主力军会合。”当晚，他们抵达饶平以北的茂芝。第二天清晨，见到第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着二百多人（栗裕就在这支队伍中）从潮汕败退下来，他告诉他们不要去潮汕了，主力队伍失败了。这个消息如同一盆天大的冷水，浇到大伙的头上。

前有敌人，后有追兵，孤军残兵，缺乏粮食和弹药，形势极为凶险。更要命的是官兵的思想不稳定，既然主力部队都没了，咱们还能怎么办？队伍解散？隐姓埋名回家种田或者到工厂当工人去？或者干脆学蔡廷锴同志加入国军算了？从南下开始，许多人逃走了。个别逃走没出路又回到队伍中（如林彪同志），大家把目光转向了年龄最大，级别最高，宽厚和蔼的朱德。怎么办，老大，你拿个意见吧。如果此时朱德大手一挥说散了，队伍中的林彪、栗裕等人大概就从此流浪去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刻由朱德说了算。

这一刻虽然足够光荣，但是要服众是不容易的。因为南昌起义时，朱德的职位不高，也没带几个人加入队伍。现在身边这一两千人，都是别人的兵。比方说二十五师，是原来叶挺独立团扩编的。中间不少兵油子。怎么办呢？朱德拿出她母亲勤俭持家的本事，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个会。朱德在会上介绍了一下情况：大意是主力部队没指望了，现在咱们要靠自己。然后朱德亮出自己的态度：我

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革命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干到底！从此之后，朱德成为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经过一系列摆事实、讲道理、抱怨、甚至绝望之后，朱德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四条：第一，我们和上级的联系已中断，要尽快找到上级组织并取得联系，以便取得指示；第二，我们要保存这支军队，作为革命的种子，要找到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湘粤赣边界地区，是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是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一带的农民运动搞得早，支援北伐最给力，我们应当以此为立足点；第三，据最新情报看，敌人已从南、西、北方面向我靠拢，我们要从东北方向穿插出去。现在敌强我弱，我军又孤立无援，所存弹药不多。行动上要隐蔽，沿边界避敌穿插行进；第四，要继续对全军做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发挥党团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坚决扭转对革命失却信心的混乱思想，安定军心，更要防止一些失败主义者自由离队，拖枪逃跑，甚至叛变投敌的严重事故发生。会议否决了少数同志关于解散队伍的提议，然后形成一个决议：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好了，就这么办吧，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决议形成之后，只是在上层军官达成一致。朱德和陈毅前后对部队进行三次整顿，然而队伍本来就是疲惫的残兵，再加上敌人一路上骚扰、堵截，队伍继续减员。官兵们不堪重负，相继逃跑。不仅是大兵离队开小差；团长、营长也离队，开大差，眼看队伍解体就在顷刻之间。

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刻，朱德做了一个最大胆、最危险、最实际的办法：开大会和大兵们交心。要知道在战场上，在危险的关头，老大总是能躲则躲，因为这个时候不但敌人可能穿出来，身边的大兵也可能对你打黑枪，没有谁能保证一支濒临溃散的队伍不出叛徒，项英同志就是死在叛徒之手。

大兵们的思维很简单：咱跟你打仗，就是拿命换点馒头、米饭，你倒好，带着我们打仗，打了那么久，人死了那么多，连饭都没得吃，怎么也说不过去嘛！不少人的兄弟都挂了，肚子又饿，心中来火，往朱德身上开枪也不是没可能，所以说朱德此举相当危险。但除此之外，除非放弃队伍逃跑，已经别无选择。

“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朱德用他那朴实的言语对朴实的大兵们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零五年的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

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这大概是朱德一生中说的最精彩，分量最重的一段话。

粟裕回忆：“朱德同志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展示了革命必然要继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令人信服，感人至深。”

陈毅把朱德的讲话总结为两条纲领：坚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在朱德决定在最危急的关头和大兵交心的那一刻起，红军之父诞生了。

这番话，让大兵们摇摇欲坠的心神重新归位。个别走了，大多数留了下来，留下来的都是真心干的。不论环境多艰苦，有了信念和信心，才有机会战而胜之。灰心和绝望，除了加速灭亡之外，没有其他作用。但是面对艰难时期，个人能保持信心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还能鼓舞别人的信心，这是领袖人物才能达到的境界。

朱德不只是说，还身体力行。不论行军还是打仗，朱德一直和士兵们一起，穿着一样的灰色土布军装，吃着一样的大锅饭。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伤员、病号。见人就谈革命、谈革命的前途；碰到困难，总是挺身而出。比如说在石经岭隘口，朱德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的侧后发起进攻，抢占了反动民团据守的隘口，带领部队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回忆：“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还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勇将。”

——领袖，不仅要讲，还要做，还要谋划。

队伍整编之后，遇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就是吃喝拉撒的问题。都年底了，大兵身上穿的还是南昌起义时的单衣，粮食不够吃，钱不够用，部队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此时朱德在报纸上看到了国军十六军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的消息。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学堂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有八拜之交。后来两人共同加入了同盟会，又一起在滇军中讨生活。此时朱德和陈毅商量，决定和范石生联系。经过一番沟通之后，朱德取得这样待遇：朱德可以来去自由，想走就走，不想走，就把自己的队伍以国军十六军一零四团为番号隐蔽在国军中好吃好睡。看来人缘好就是好哇，联想他们在南昌南下时，同窗好友杨如轩给朱德让道，不禁让人感叹：好人好报这事在残酷的战争也适用啊。

同时也能看得出：精于政治谋略的蒋介石先生，他的军事能力和政治能力完全不匹配。如果在和平年代，蒋介石凭他的政治能力也可以干出一番事业。

可惜啊，蒋介石生不逢时，注定成为历史的过客。

为啥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只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同志在做着更为重要的事情：和汪精卫争夺国民党的统治权。最终，纸包不住火，蒋介石忙完宁汉战争之后，很快就知晓南昌起义的残部隐蔽在国军当中，他很生气，但也没辙，因为石焕生并不受蒋介石的控制。蒋介石给石焕生密电，让石焕生解决了朱德。石焕生则非常讲义气，让朱德走了。朱德也没有闲着，一方面派毛泽覃去井冈山联系毛泽东，另一方面去湘南搞斗争。然而朱德在湘南并不成功，因为在湘南暴动的一些行为过于极端，把招牌给弄坏了，最后带队去井冈山，见到了一生的战友——毛泽东，从此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另一幕。

（二）握手

在毛泽东的合作者当中，朱毛组合是最为长寿的组合之一，从二八年到七六年，历经四十八年，也许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合作比这个年限长一点。

朱毛相会有很多偶然的原因，比方说朱德恰好在跟地下党接头的时候得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消息。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派了何长工去找南昌起义的残部。何长工下山先到长沙，然后前往湘南。但那里白色恐怖严重，过不去。何长工只好折回长沙去武汉，在汉口坐美国轮船到了香港，经广州到韶关，已经是二七年年底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何长工去澡堂洗澡，听两个军官聊天，说这里驻扎的一四零团是参加南昌暴动的队伍，团长王楷就是朱德。何长工立即收拾东西，化装成华侨商人，去找朱德。这些偶然性结合在一起，朱德、毛泽东就取得了联系。

但更多的还是必然性：此时疲惫不堪的朱德已经意识到根据地的重要性。一支军队要想生存下去，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这一点，南昌暴动时就没有考虑到。不管是周恩来，贺龙，还是叶挺，都是想趁国民党的内部不统一，干了再说。毛泽东懂得首先要武装割据，维持生存的道理，朱德对这点比较赞同。

一九二八年，朱德的大手和毛泽东的大手握在一起，从此天下风起云涌。

一九二八年的朱德四十二岁，虽然是共产党员，实际上已经从军二十年，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争数十次，军事斗争经验极其丰富，已经是个优秀的统帅。一九二八年的毛泽东三十五岁，虽然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却没带过几天兵，本质上还是一个书生或者说是理论家。两人的结合可以

说是天作之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在毛泽东由书生转变成军事家的过程中，朱德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没有朱德带去的那些职业军人，很难想象毛泽东如何应付最初的围剿。在后来的将帅中，跟着毛泽东从秋收起义去井冈山的只有罗荣桓和谭政，都是搞政工见长的。跟着朱德上井冈山的却有林彪、陈毅、粟裕、黄克诚、许光达这些战斗尖子。

（三）伟大的争吵

历史教科书总喜欢把历史上的伟大组合描述为亲密无间的搭档，仿佛相敬如宾的模范夫妻，一生其乐融融。事实却往往是另外一个样子：伟大的战友之间常常争论不休。有时候，伟大的战友之间必须争吵，因为战争毕竟不是过日子，战争中的男人如果想要存活、胜利，必须强悍。强悍，是所有伟大战士的基本素质。

伟大的统帅也一样，必须强悍。因为伟大的统帅不是因为他是朱德或者毛泽东而伟大，而是因为他干的那些事。所有的伟大的统帅必须做出伟大的选择。选择，往往伴随着分歧。即使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毛泽东和朱德，也不可能立场完全一致。分歧总是伴随着着争吵，所以毛泽东和朱德之间也有争吵，没啥好隐瞒的。两个伟大的男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争论，争吵也是伟大的，所以称之为伟大的争吵。

争吵的大致原因是这样的：朱德带去井冈山的大兵都是国民党正规军。国民党军队和后来的共产党军队差别很大。国民党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司令、军长、师长这类“长官”很重要，后来共军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政委的权力很大，有时候甚至大过司令，比方说后来的项英就把新四军军长叶挺给架空了、饶漱石让陈毅军长的日子十分难过。这个转变起源于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定下的一条原则——党指挥枪。朱德和他带去的那些人对这种政策没有任何印象。没有印象不要紧，要把手中的权力拿掉一些可是实实在在的。朱德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就算不计较个人利益，对毛泽东也未必放心。在当时的朱德看来，毛泽东毕竟没有经受过战争的考验，却相当强势，把权力交给他也不放心啊。等到后期，毛泽东展现出气吞山河的魄力之后，朱德也愿意慢慢淡去。在两人刚刚接触时，就让宽厚稳重的朱德服从毛泽东的领导不太现实。退一步讲，就算朱德愿意服从，其他人也未必愿意。

正因如此，朱德和毛泽东的早期关系也是波澜起伏。主要是朱总司令的实力强一些，而毛代表的力量相对弱小。但是在性格上，朱老总比较宽厚，毛代表则较为强势。朱老总虽然有行军打仗的经验，但政治水平一般。毛代表虽然打仗经验不多，但指挥作战的水平不差，要不然林彪那种怪异

的天才也不会从朱司令的身旁走开，投入毛代表的门下。而且毛代表还要按照自己定下的原则——党指挥枪去改造朱司令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想不发生争吵都难啊。

上层这些分歧还是次要的，主要还是大兵的问题。朱德的大兵来自全国各地，到了井冈山才发现，原来条件如此艰苦，南瓜汤都不能保证供应，打仗还可能随时掉脑袋，还不如回老家种地呢，于是以湘南农民为基础的二十九团就闹着要回家，说咱们要回家，打仗也回家乡打，顺便看看老婆孩子、种种地啥的，不亦乐乎？

大兵的这种反应，又加深了朱德和毛泽东的分歧。争论终于爆发了。先是毛泽东写信给中央，大意是请中央派两个高明的同志来苏区，最好是刘伯承（当时名气大）、恽代英（名气大且资格老）过来管军事。毛泽东这是虚晃一枪，因为刘伯承当时还在苏联学习呢，恽代英在中央搞宣传。这两个人都不太可能去苏区。然而毛泽东这一枪却招来另外一个人。

中央想了，既然要人，也不能不给，就刘安恭吧，看起来比较合适。

刘安恭，四川人，一八九九年生，二二年入党。参加南昌起义，跟刘伯承一起去苏联学习，但比刘伯承早一年回国，正在待业呢。刘安恭在一九二六年时和朱德合作过，又有过一起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可以说和朱德是同一条战线的。他的到来，加剧了争论。这么说倒不是说刘安恭的人品差，帮助老乡兼战友对付毛泽东，而是另有原因。

刘安恭此番回国，雄心勃勃，准备来前线干一番事业。当时处于创业阶段，很容易做出一些选择性的贡献，即只要把苏联当做模板抄袭就行了。按照苏联模板，就应该有军委。于是仿造苏联设立临时军委，自任主席。从苏联回国的同志大多有这样的毛病，想要与众不同。比方说刘伯承，回国之后要打运动战。刘安恭也一样，要设军委。军委就是一个军事管理机构，看起来似乎必不可少。但当时情况不一样。如果有足够大的地盘，有足够多的军队，设立一个军委是必须的，问题是当时没有固定地盘，总共就那一点人。今天在福建，明天又跑到江西去了。网络没有，电话没有，写信都没有邮递员，军委在后面怎么指挥？所以毛泽东坚决认为应该由前委指挥作战。因为前委就在前线啊，跟着队伍跑，要怎么打，怎么转移，派人通知一声就行了。这么一来，相当于前委包办了军委的工作，加上毛泽东的性格强势，前委很有家长制的范儿。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刘安恭要改变这个情况，就和毛泽东争论起来。朱德本来就和毛泽东有类似的分歧，此时又认为，既然党指挥军，就应该听中央的，刘安恭是中央的人，应该支持刘安恭。毛泽东的支持者中，最坚定的是林彪。林彪是在前线打仗的，当然愿意接受前委的指挥，要不然以后盖个章都要跑回后方，仗就没法打了。

开会时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刘安恭说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要恢复正式军委；林彪说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反对设立军委。大家各不相让。

两边在争吵，让下面的人很难办。大家认为刘安恭有道理，林彪也有道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时多数人都不同意刘安恭的临时军委。这厮仗着自己喝点洋墨水，回国就想骑在咱们头上，没门。

二九年六月八号的前委扩大会议上，连以上的干部都来了。刘安恭和林彪再次针锋相对。刘安恭慷慨陈词：“毛泽东总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按这条标准来衡量朱毛，两人存在很大的差异。朱德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的命令。这次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央二月指示就是一个明证。所以，现在不仅有一个划分前委与军委职权的问题，还有一个红四军是留朱还是留毛的问题。”

林彪再次重申了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朱德为缓和会场紧张的气氛，耐心做解释工作。

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他将自己的意见写出来放在会议桌上，理由很简单：“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此举使大部分与会者对刘安恭的做法不满，接下来投票，前委以 36 票对 5 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被免去，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随后在这个职位上光荣牺牲，晋升为革命烈士。毛泽东虽然暂时获胜，然而此事还没完。从长远角度看，军委是必须的，朱德的立场和刘安恭一致，刘安恭指出的那些问题确实存在，不少人确实厌倦了毛泽东的霸道和强势。

两周之后，也就是六月二十二号，红四军在福建龙岩这个地方召开第七届党代表会议。大会和两周前的情况差不多，吵得特别厉害。各方面的态度还是一样的，但局势发生了逆转：人家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已经没有了，目标就集中到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上面，说老毛你要把自己的那一摊子事说清楚咯。

经过陈毅同志和稀泥似的慷慨陈词，大会再次选举，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也没有了，而陈毅莫名其妙地成了前委书记；陈毅之前就当过前委书记，但是搞不定；这次再次当选，依然搞不定。出现这个结果，只能说明：一，大家累了，不想再吵了，都走吧；二，政治平衡，并非军事需要。

不管台前的人如何叫嚣，争论的根本还是朱德和毛泽东的看法不一致。

刘安恭只是一个外来户，虽然参加过南昌起义，但职位不高，而且随后去了苏联。来到苏区相当于空降兵，独门独户，想找茬，手里也没家伙。朱德主张接受中央的策略，好像没错。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央自己都是东躲西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何能给出正确主张？还是刘安恭说得对：毛泽东总是自创原则，拒绝中央命令。这个问题一直存在，随着中央对苏区的干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突出。一九二九年，仅仅是一个中央代表刘安恭就闹成这样。接下来，中央进驻苏区之后，冲突更猛烈了。但是以当时毛泽东的力量，可以搞定一个刘安恭，还没法和整个中央对抗，所以毛泽东起起伏伏，多次下岗。要不是拜蒋介石的强力干预，第五次反围剿惨败，毛泽东恐怕很难复起。这个问题一直持续，持续到遵义会议，持续到延安整风结束，毛泽东成为最高领袖，再也没有人干预他自创原则为止。

这就是毛泽东最特别的地方——总是能根据形势自创原则，并且非常有效。按照中央那一套，共军早就玩完了。既然中央搞不定，那就自创原则呗，只要能够扭转不利局势，只要有用。事实证明确实非常有用。比方说三湾改编，毛泽东创立“党指挥枪”；比方说毛泽东自创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比方说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自创放弃西进而北上等等。没有毛泽东的这些自创原则，队伍差不多可以散了。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害的一面。这种随心所欲的自主性在战争年代非常有效，在和平建设的时候往往是一种伤害。同样一个毛泽东，同样自创原则，自创大跃进原则，自创文革，就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合作者之一，朱德承受了、也必须承受毛泽东自创原则带来的荣耀和痛苦。荣耀，战争的胜利；痛苦，战争之后的政治运动。从带着千把人上山到红军总司令，到八路军总司令，到解放军总司令。这一系列职位的荣耀只属于朱德一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再也不会另外有一个男人能享此等尊荣了。

没有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更加困难重重。没有毛泽东，朱德也不会有后来的地位。朱和毛，军和党，是一体的。一体的朱和毛共同探索了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比如十六字诀。两人通力合作，创造了游击战术的精髓——十六字诀：敌进我退——保存实力，待机转移攻势；敌退我进——打击其士气，积小胜为大胜；敌驻我扰——以疲惫敌人，造成对我有利之形势；敌疲我打——应集中兵力，主动进攻，以歼灭敌人。

关于十六字诀，现在又惹起争论，有人说是朱德最先提出的，有人说是毛泽东最先提出的。争论这个毫无意义，因为朱德和毛泽东是一体的。朱德的战争经验丰富，毛泽东的政治理论水平高。这个十六字诀，很可能是毛泽东根据朱德的军事实践总结出来的。即使是朱德先提出来，也不会掩

盖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即使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也不影响朱德在中国军史的地位。

龙岩会议之后，毛泽东离开了前委，陈毅重新成为前委书记，却搞不定前委。没有毛泽东，朱德也是寸步难行。于是又经过一番折腾，毛泽东又回到前委书记的位置上。朱德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不可或缺。朱德本来就是心地宽厚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朱德对毛泽东越来越认可，越来越包容。以二九年为转折点，转变如下：

两年后的宁都会议上，中央高层要对毛泽东动手时，朱德能做到中立已经很不容易。

六年后的遵义会议上，当博古、凯丰等人和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激烈过招时，朱德的表现是这样的：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说：“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随后，朱德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

（四）朱德和张国焘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遇见命中的克星张国焘。三个月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彭德怀红三军团的保护下悄然北上，逃离了张国焘的魔掌，然后带着红一、三军团北上。朱德和张国焘同行，相当于与狼共舞。在与狼共舞的途中，朱德依然支持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朱德的作用不仅仅是支持毛泽东和张国焘对抗那么简单。遵义会议上的朱德只是像政治家一样做个表态，博古等人并不能把朱德怎么样。而在南下途中，除了要面对来自张国焘的危险，还有整个红四军面临的实实在在的 danger，因为南下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张国焘只是一个政治家。当战略错误时，就可能造成一支军队的毁灭。比如说当年的石达开，军事水平一流，但因为战略失误而导致最后身首异处。张国焘的军事水平还不能和石达开比，当然他有徐向前等能征善战的人，可是之后的西征，由于战略失误，即使天才的徐向前也没能挽救队伍。在战略错误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虽有损失，并不致命，这其中肯定有军人的功劳，主要还是说服了张国焘北上。当时红四军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徐向前，但是徐向前只能服从命令——服从张国焘的命令，张国焘当年秘密杀害了他老婆，他也没吭声。在南下无望的情况下，真正促使张国焘北上，且有影响力促使张国焘北上的只能是朱德。是朱德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望，最大限度地保全了红四方面军，而且避免了贺龙的红二方面军落入张国焘的手中。

这段历史应该很精彩，可惜模糊不清，但我们依然能找到如下片段：南下的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开始对朱德的围攻。张国焘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朱德坚决拒绝。接下来，张国焘在阿坝一个喇嘛寺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会议。会场外挂着书写“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首先讲话，攻击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鼓吹南下。很多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朱德稳稳地坐在那里，不予理睬。张国焘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这才从容地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

随后有人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依然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朱德看似稳坐钓鱼台，实际上处境相当困难。张国焘以各种名义召开各种会议，宣传“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们给朱德起一些响亮的名字：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等等。张国焘要另立中央，朱德坚决不同意。朱德和张国焘的较量是另外一种风格：当年的党内斗争十分激烈，开会时常常是上蹦下跳，吵得脸红脖子粗，而朱德却不一样。

彼时的朱德已经到了知天命之年，历经大风大浪，很多事早已看透，心态宽厚，和颜悦色。他的表现是这样的：张国焘的追随者对朱德亮出言辞上的“坚船利炮”，朱德则安稳如山，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如同身在女儿国里面对诱惑却闭眼诵经的唐三藏同志。等对方斗完骂完，他又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又如唐三藏那般宣扬“佛法”：南下没出路，要北上，不要南下，要北上等等。

对于朱德的表现，徐向前很佩服，如此回忆：“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者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俩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办法。朱总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张国焘是掂量过的。没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军委’也好，都成不了气候。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

脚迈出一大步，后脚跟说不定就打哆嗦。朱总司令看透了他，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远。”这话有少量水分，但基本靠谱。

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承认：“顾到朱德所说留下转圜余地的意见。”张国焘同志的回忆录把很多人啰嗦一通，对朱德很客气，可以说他对朱德相当尊敬。赢得张国焘的尊敬可不容易啊！

朱德为啥这么干？是觉得张国焘霸道难合作？非也，毛泽东比张国焘还要霸气。也可以理解为朱德的家底都在中央军，这样未免小看朱德的气量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从军事统帅的角度看见南下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当时国民党是正统，共产党是造反派。唯有以抗日的名义北上，方能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对于弱小的一方，失去道义优势的话，结局只能是灭亡，跟战术无关，跟天才无关，甚至跟政治无关。

张国焘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晚了，再北上，他的政治威信尽失，只能仰人鼻息了，最后觉得仰毛泽东的鼻息没意思，跑去仰国民党的鼻息去了，一世英名就此断送。而朱德依然稳稳地坐在总司令的位置上，迎来人生的巅峰。张国焘和朱德比，战略眼光还差一点儿。

延安整风，朱德沉默不语。朱德之所以能够沉默不语，是因为他当时的分量很足，不至于整到他身上。分量很足的朱德之所以沉默不语，没有站出来说话，是因为他的政治敏感性不够。比方说在遵义会议之后，他回到家中，对妻子康克清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康克清问：“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朱德沉思一会，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这段对白如实反映了朱德的心态和政治觉悟。

此后的政治运动，朱德即使表态，也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政治上，朱德从来只是表达观点，不搞动作。能在政治涡流中长久生存，是因为自身的威望和宽仁。在战争年代，朱德的这种性格有利于平息各个山头派系之间的争端。等到和平年代，政治为主的时候，却又不可避免地淡去。宽厚坚强的朱德愿意慢慢淡去，可是朱德又没有真正淡去，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是总司令，是共军之父，军界最为光辉的形象飘荡在共和国的上空。当共和国发生悲剧之时，朱德那光辉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触及。

庐山会议，时任人大委员长的朱德对彭德怀有袒护之意。彭德怀长期以来虽然是副职，八路军副总司令，解放军副司令啥的，对战场的实际指挥多于朱德。而且彭德怀的性格比较霸道，有时候

甚至刚愎自用，对朱司令也有顶撞。对于这样一个副手，没有宽大的胸襟是没办法和谐共处的。但朱德处理得很好，两人的关系总体上还算融洽交心的，也只有朱德的心胸才真正容得下彭德怀的狂傲。正因如此，听到彭德怀去世的消息，朱德老泪纵横。融洽归融洽，在庐山会议上，那种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为彭德怀说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毛泽东果断讽刺朱德是隔靴搔痒。不仅如此，庐山之后，朱德也做了检讨，这事再次证明了朱德的政治敏感性，或者说是大智若愚，不屑于摆弄吧。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朱德也是左右为难，三改稿子之后方才端出一盆稀泥。还好，一九六二年，还有和稀泥的空间，等到一九六六年，这一点空间也被压缩了。

和所有人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朱德注定无法幸免。

在文革这样一幕大戏中，第一代四大天王各有不同的角色。就核心毛泽东而言，他希望通过发动文革来解决一切问题，解决的问题是以刘少奇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此时的周恩来和朱德就比较尴尬：周恩来身在行政系统，但他也无力反抗；朱德虽然挂着人大委员长的头衔，但余威依然在军界。让人尴尬的是，军界没有朱德的位置。

实权在毛泽东和林彪手中，要发动文革，必然要动朱德。

唯有动朱德，才能显示文革的力度。

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下，因为倒了朱德，会出现连锁反应。

所以才有批判朱德的那一幕。在讲述那一幕之前，先看看那一幕出现的原因，即为啥要动朱德，又不能让朱德倒了。

（五）在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

前面分析过，开国将帅的事业线是不同的。比方说彭德怀，事业线的顶峰在抗美援朝；比方说贺龙，事业线的顶峰在红军时代；比方说聂荣臻，事业线的顶峰在建国后领导军方的科研团队；比方说叶剑英，事业线的顶峰在文革之后。而朱德的事业线顶峰在抗日战争。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朱德身上的时候，通常看到最为光鲜亮丽的部分是朱德寻找党，是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指挥独当一面，往后的形象便渐渐模糊了。以至于在很多文艺作品中朱德的形象就像一个宽厚的老爷爷，是负责举手表示赞成的。

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举手的背后因素都是实力。当年张闻天只负责在党内举手，结果就没

能举下去。没有实力，举手也不行；有实力，不举手也行，比方说张国焘就拿不举手的朱德没办法。军内竞争同样非常激励，单凭老资格是没办法一直坐在总司令的位置上的。比资格老，朱德比不过贺龙或叶挺，他们是南昌起义中最大的两个股东。朱德能一直坐在那里，就因为实力。但朱德的实力却换来了尴尬的结果。

朱德的尴尬是——被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被迫成为政治家，却不行政治家的手腕。所以出于政治需要，朱德虽然是军方最大的形象代表，却模糊不清。

井冈山之后，朱毛合作。由于毛泽东在军事政治方面过于雄才大略，现在很少有人注意到两人合作之初，朱德对毛泽东成长上的重要影响，仿佛毛泽东天生就是一个天才军事家。事实上，朱毛合作之前，毛泽东基本上没打过胜仗，甚至连完全控制军队都做不到。毛泽东真正成为那个无敌的毛泽东，是在和朱德合作之后。毛泽东天才的头脑加上朱德丰富的军旅经验，产生耀眼的化学效应。在这个化学效应中，朱德的作用被忽视了。

在井冈山的历次反围剿过程中，朱德的作用不比毛泽东小。因为毛泽东隐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人便以为前几次的胜利都是因为毛泽东很神，加上后来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作用突出，更是加剧了人们的这种看法。

张国焘搞分裂，由于对手是毛泽东，最后又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后人便又忽略了朱德在其中的作用，以至于大家认为是毛泽东打败了张国焘。

如果这一切都不算特别尴尬，那么最大的尴尬则在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朱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后期宣传时却回避了。事实上，抗日战争中的朱德，特别是抗战初期的朱德，是最为耀眼的朱德，是符合十大元帅之首这个荣誉的朱德。因为此时的朱德夹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间，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这一时期的朱德，虽然身在共产党，却同时指挥国军作战。看看朱德最为耀眼的那段时间吧。

抗日战场上的朱德没有指挥过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运动战，没有指挥过平型关那种政治意义强的战役，没有黄土岭狙击战那样搞死过日军高级军官，然而朱德的作用依然是最大的，因为朱德的作用是基础性的、全局性的。

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意识到要抗日了。其实蒋介石早有抗日的意向，只是一直没有办法搞定国内的共产党和军阀来专心抗日，然而历史老人已经决定不再等蒋介石了。当时的共产党和军阀只是折腾蒋介石，日本人是想要蒋介石的命。如果说当年日本人吞噬东北，还是张家的地盘，战刀还没有砍到蒋介石身上，那么日本人拿下东北之后，补血充电，精神抖擞往华北去了，蒋介石就再也

不能气定神闲地稳坐南京了。毕竟嘛，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全国都在吵闹着要抗日的情况下，再拖的话，估计又得下野。西安事变更让蒋介石意识到：一直拖下去，不止地位不保，生命还可能受到威胁。不仅如此，日本人步步紧逼，已经威胁到长三角地区——那可是蒋介石的立命之本啊！

三七年到三八年，经过残酷的淞沪会战、残忍的南京保卫战、惨烈的太原会战、血腥的徐州会战、惨然的武汉会战之后，蒋介石和他的国军一退再退，这个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丢失国土最为严重的两年。但这个阶段的蒋介石是英勇无畏、不惧牺牲的，是名副其实的领袖和英雄。这一系列的失利，使得蒋介石没有精力和共产党在政治上磨嘴皮子。

西安事变之后，两党开始谈判。由于国民党处于优势地位，谈判中处于“开价”的地位，一开始国民党开价很低，然而华北危急，国民党提高了价码，允许共军改编为三个师。接下来淞沪会战，国民党再次提价，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正式发表这项任命。淞沪会战期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九月十一号，太原会战期间，八路军升级为第十八集团军。太原会战之后，即三八年二月十六号，朱德升为右翼兵团总司令。一九三九年三月，朱德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从东路军开始，朱德不仅指挥八路军，还指挥国军抗战。前面已经介绍过，朱德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加入共产党的，现在，朱德又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指挥国军。有这种威望和经历的，共军内部有且只有这一位。这段时间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朱德率领八路军（习惯性称呼）东进，完成进军敌后的基础性部署。这个部署有多重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三个师从陕北开出时，不到五万人。抗战结束后，已经发展到上百万。在这段时间里，后来的将帅皆直接听命于朱德，在朱德的指挥下干活。所以说，抗日战争中，朱德才是共军最重要的统帅。

在这个时期，朱德不仅完成了八路军的决定性部署，而且以自身的魅力赢得了很多顶级人物的赞赏。比方说共军内部的贺龙元帅，南昌起义时领导朱德，如今被朱德领导，毫无怨言，因为他发现“朱德确实是一个帅才。”再比如国军的牛人卫立煌，这段时间和朱德共事，对朱德叹服不已。卫立煌是谁？蒋介石的五虎大将中唯一名副其实的统帅，在太原会战中，也就是他指挥的忻口会战打得最好。这期间的国共合作很好，比方说忻口会战，卫立煌在正面打得很英勇，但是被日军的飞机杀伤得很严重。此时陈锡联带着一队人马夜袭明阳堡，炸毁了日军二十多架飞机，大大缓解了国军的正面压力。比方说，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一二零师在雁门关干得都非常不错，特别是平型关战役，加分不少。国共合作，成果多多。又联想到十年前，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唉，啥时候第三次合作，台湾等着解决呢。

但是朱德的战功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历史书上只记着毛泽东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只记着彭德怀在百团大战中的豪气干云，只记着林彪在平型关扬威，只记着刘伯承教科书般的伏击和狙击，很少讲述朱德的决定性贡献。原因为何？可以理解为为了宣传毛泽东而忽略了朱德，实际上这个理解站不住脚。作为毛泽东的合作者，朱德的形象也应该是光辉高大的才是，是因为其中牵扯到另外一个人——蒋介石。

现在大家都认为蒋介石并不是一个一流的统帅，因为面对强大的日本人或弱势的共产党都没办法搞定他们。但是蒋介石一直在打仗，他能在国民党内部崛起，靠的就是军事成绩。有趣的是，在面对日本人和共产党之前，蒋介石竟然战功赫赫，先后打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以及他们之间的排列组合。之所以如此，只因为蒋介石虽然不是一流的军事家，却是一流的政治家，政治手腕一流。特别是通过人际关系挖对方的墙角，绝对是大师级别的。

蒋介石和冯玉祥打仗，成功策反了冯玉祥的嫡系将领——韩复榘和石友三，结果冯玉祥不战而败，通电下野。战后韩复榘去了山东当土霸王，石友三去安徽当老大。

蒋桂战争，蒋介石敏锐地发现，李明瑞、杨腾辉和李宗仁有间隙，立刻送去重金。结果李明瑞和杨腾辉火线倒戈，李宗仁狼狈败走香港。战后，李杨二人由旅长升为师长。

中原大战，双方打得热火朝天，蒋介石拉来一个重量级选手——张学良。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晋军溃败。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奖赏是——海陆空三军副司令，中央政治委员，北方八省军务。

蒋介石通过政治手腕控制中央，挟中央以令军阀，对敌方的政治人物打压，拉拢对方阵中的要人，给钱给官位，百试百灵。这一招可以说是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必杀技，然而这招对中共就不灵了。蒋介石派黄公略的哥哥去游说，结果黄公略杀了哥哥。蒋介石派人拉拢贺龙，贺龙杀掉来使。至于彭德怀、徐向前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鸟他。

蒋介石很纳闷：娘希匹，难道共产党人都不食人间烟火？不对啊，周佛海、张国焘这种老家伙还不是乖乖地来投降了么？一定还有办法，还有办法。只要有办法，蒋介石就不会放过。蒋介石抓人际关系的水平堪比苍蝇叮鸡蛋的缝隙。

抗战合作，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一个拉拢共军高级将领的机会，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试图劝说彭德怀、贺龙，试图勾引林彪。对共军内部威望、地位最高的朱德，蒋介石绝对没有理由视而不见。对于朱德而言，条件更为有利。朱德曾经是国民党党员，在国军内混过很长一段时间，国军既没像对待贺龙那般去杀朱德全家，也没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去刨祖坟。而且朱德远不

像林彪那般离不开毛泽东。

蒋介石盘算着：能把朱德争取到，作用远胜于张国焘之流。

所以对待朱德和其他人不一样。韩复榘、石友三之流本就是欲望满满的势利眼，给点钱、给顶乌纱帽，马上乖乖来请安。李明瑞、杨腾飞只是小角色，给点大洋就行了。张学良分量够重，却年少易冲动，没有政治头脑。朱德不同，战争经验（一直在打）、阅历（游离欧洲各国）、地位（当时共产党内第二重要的人物）、信念（从国民党加入共产党）一样都不缺。要想拉拢这样一个人，直接封官许愿肯定是行不通的。怎么办呢？蒋介石把他的拉人艺术发挥到极致——给荣耀和尊严。

具体方式就是，对共产党打压的同时，对朱德一再提升。

如果说八路军总司令或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的职称是朱德在共产党军内地位的自然体现，那么东路军总指挥就是国民党任命的了。如果说这个职位是虚的，那也就算了，卫立煌直接拨六个团给朱德。等到朱德继任，由他指挥军队，除了共军之外，编制上还包括国军第六十一、九十一、九十四、一六九师和第十七、一一七师的各一部，实际指挥的国军达三个军、三个师、一个旅之多。即使国共合作，两党依然是在军队问题上讨价还价，唾沫星到处横飞，有雨点那么大。国民党对共军一再打压，想办法限制共军的发展，国民党脑袋进水了才会把自己的军队交给朱德。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抗战大局，当初任命朱德为东路军总指挥时，中共曾考虑用彭德怀代替朱德上任，国民党方面死活不同意。

蒋介石这么干的理由只有两个：一，赢得朱德的信任，二，融化共军。

非但如此，第二年，蒋介石又把朱德提拔为第二战区副总指挥，这已经是蒋介石能做到的极致了。要知道当时国军也就五个战区。每个战区的老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军阀，如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任何一个当时的实力都在共军之上。比如说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那是连蒋介石也动不了的人物。蒋介石的心头肉们，刘峙、陈诚他们也只是集团军司令。在蒋介石看来，他对朱德已经很够意思了。

共产党方面也是极为担心。因为共军很少，放在国军中间，很可能被溶解了。而且在共军将领当中，还有很多虽然精神崇高，但没有经历过物质考验的穷苦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彭德怀那般过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建国之后，就有不少干部经不起腐化，迈入腐败的官僚群体。所以毛泽东千方百计地要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

此时的朱德，处境相当微妙，政治上非常危险。那时候，从莫斯科归来的王明却又不合时宜地

提出要跟着国民党走，这为以后的政治失败埋下了伏笔。朱德的举动远比王明危险，王明只是嘴上说说，应该相信国民党。朱德却在行动上相信国民党，同时指挥那么多国军和共军并肩作战，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举动。

朱德虽然相信国军，共产党却不信任国民党，国民党也不信任共产党。在蒋介石的眼中，毛泽东和共产党始终都是捣乱的，属于肉中刺的类型，能利用，暂时利用，日后还是要找机会消灭的。在毛泽东眼中，蒋介石和国民党始终是最大的障碍，能利用就利用，利用完之后还是要大打出手的。

当时的朱德心中没有想这些，他只是从军人的角度上认为，此时两军应该好好地配合，才能在日本人面前少吃点亏。所以前后好几次会见蒋介石，商讨共军改编以及作战事宜，看起来接触得相当愉快，同时有时会顶住毛泽东的左倾意见，比方说，毛泽东不希望朱德担任东路军总指挥，为了大局，朱德还是去了。

能够让蒋介石和毛泽东如此纠结的人，共军内部，也只有朱德了。

朱德这么干需要超人的胆量和地位。没胆量，要退缩了。没地位，被换了。胆量嘛，不用说了，拒绝孙中山，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收旧部，都是胆量的体现。

战场上的朱德是一个奇迹。青年从军开始，数十年身经百战，无数次出生入死，有胜利追击、有败退逃亡，竟然从来没有受过一点伤。护国战争时，有一次朱德跟几个手下到一间土房子里休息，一颗炮弹正好落在房子里，其他所有人都炸死了，朱德却安然无恙。年轻的朱德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一下精神，继续战斗去了。这一次，再次身临险境。东线总指挥朱德在前沿使用电台指挥时，身边只有两百名八路军总部人员，仅相当于两个非战斗连的兵力。二月二十号，准备进攻临汾、潼关的日军先遣大队突然出现在朱德的驻地古县，当时临汾空虚，第二战区没有作相应的布置，同时日军又向陕北进逼，换成别人未必能顶得住。朱德镇定自若，于二十四号就地使用身边的警卫阻击日军，并与阎锡山、卫立煌、毛泽东和各部沟通，一边指挥阻击战，一边指挥全局。结果，日军苦米地旅团竟然被朱德阻滞了三天！当日军发现眼前竟然就是朱德时，高兴得哇哇乱叫，立即派出十几架轰炸机群准备把朱德炸个稀巴烂。奇迹出现了，一向严谨的日军竟然乐极出错，把山西临汾的“古”县弄成了河南灵宝的“故”县，轰炸机群飞到河南灵宝把故县炸个底朝天，而山西临汾的古县却安然无事。这样的奇迹，放在古代只能发生在传说人物身上，同时这也体现了朱德的非凡胆量。薄一波回忆：“他（朱德）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都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

或许朱老总相信能伤他的武器还没有制造出来吧。当时，司令部的人员和阎锡山、卫立煌，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都坐不住了。特别是对共产党而言，朱德战死，在政治、军事上都是难以估量的损失。在那个全国大败退的时候，华北失守、山东失守、长三角失守、连阎锡山的老巢太原都失守了，朱德指挥的东路军却是少有的亮点，不仅没有在日军强大的攻势面前崩溃，而且穿越日军的前锋和防线，进入华北、山东等地，开辟出一块又一块的根据地。

开到敌后的不仅是共军，也有一部分国军。朱德则拍着刘伯承的肩膀反复叮嘱：善待友军，给以适当的支持和帮助；不要让自己人沾染了友军的不良嗜好。可谓用心良苦啊！然而国军不是打游击战的料：官兵不具备游击思想，吃不了游击战的苦。如果蒋介石能把游击战这一块抓好，日后国共战争也不至于败得如此迅速。这些当时有助于国共团结的举动，到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可能成为被敲打的口实。

这期间，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入晋作战的基础上，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一）自主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进扰敌人，切忌被动的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留恋地向安全及便于进行作战的地带撤退。（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的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胜利，应估计敌之援兵可能与否，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当地带，不要久驻一地。”

此后，朱德和彭德怀根据中央精神确立了根据地建设方针：“（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这些措施对根据地建设和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

这就是朱德利用蒋介石的信任干出来的事业。正是这系列的动作，导致了共军在敌后的大大发展。等到鬼子投降之后，国共双方又因为这些地盘而上演了一部争霸天下的大戏。共产党就是靠这些根据地为本钱，以及游击战中锻炼出来的能力，成为了国共争霸中的主角。其实国共双方的命运，在国军在敌后无法游击生存这件事上就已经决定了。毕竟战争就是最残酷的生存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比的不是哪一方娇贵、名气大、手中家伙多，而是生存能力。

毕竟自古以来的丛林法则就是这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蒋介石一定没有想到，他溶解共军的招数非但没有凑效，反而暴露了自己的命门。不知道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他捧过朱德，拉拢过朱德，把拉拢艺术发挥到极限依然没有成功。他想过问题根源的所在么？

正是在那轰轰烈烈的抗战中，朱德以其超人的胆略和无人能及的地位完成了自身的使命。此时的朱德已经超越了党派，用自己的大气，灵活地游走在时代的丛林中，建立了不世功勋。但是这个功勋没有得到充分宣传，主要因为，强力宣传会涉及到国军和蒋介石。国军和蒋介石一直与共军和毛泽东搞对立，彼此妖魔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那宽厚雄伟的形象将会越来越清晰，而在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大家对此心领神会、心知肚明。

战场，就是最残酷的丛林。林彪和粟裕这种人都是丛林里的王者，朱德和毛泽东一样，属于丛林的创作者。和毛泽东不同的是，毛泽东还创造了政治丛林，朱德在战争丛林中游刃有余，但在政治丛林中却是门外汉。政治丛林里的王者桂冠属于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

解放战争开始，其他统帅强势崛起，朱老总的戏份就减轻了，成了稳坐中军的人物。此时的中军营帐，只需要战略规划，离战术指挥已经很远了。战略规划，属于天纵英才的毛泽东。朱德的光芒逐渐被毛泽东遮盖，却依然余威不减。建国初期，大家还在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喊一段时间就不喊了，朱德的万岁的总司令变成国家副主席，再变成人大委员长。等到文革到来那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停了，忙碌了一辈子的朱德成了一个闲人。

朱德成了一个远离战场的老兵，一个和光荣与胜利联系在一起的符号。

那个符号在政治运动中，可以淡在幕后。比方说延安整风，为了更具备战斗力，没有涉及到朱德，因为朱德当时的威望太高。比方说高岗事件，一场局部的政治风波，和朱德没有关系。比方说反教条运动，局限在军内，没有触及到朱德。但是政治运动一旦涉及到军方，那个符号依然难以回避。比方说庐山事件，军人涉足政治，朱德开始被触及，但是并不严重。随着运动的深入，政治和军事搅合在一起，朱德被触及的程度越来越深。文化大革命，则是这一切的顶峰。正是在这个顶峰，才出现了怪异的一幕。先看看那怪异的一幕，再分析原因。

（六）怪异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发生了很多事。《二月提纲》之后，又有《五一六通知》，又有林彪谈政变以及林彪开出的处女证明。特别是五月份，一切仿如惊雷，滚滚而来。每一个惊雷都炸了一批人。这些惊雷之中，有一个极为怪异，是冲朱德去的。

时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号。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目的：开会。

会议性质：批判会。

批判会主持人：刘少奇。

参与者：周恩来，林彪，陈毅，薄一波，乌兰夫等人。

这次会议本来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的主要助手；罗瑞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表面偏向刘少奇；陆定一，宣传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敢于和中央文革唱反调，和刘少奇关系密切；杨尚昆，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办公厅主任。批判这些人，主要是为了打通通往攻打刘少奇的大道。搞笑的是，主持人偏偏就是刘少奇。现在的看法是，刘少奇主持会议打倒自己！刘少奇为啥这么干？答案是，这是政治。

任何好事或者坏事在政治上都会出现。

刘少奇这么干，说明他还没有被打倒，还有不被打倒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批判彭真等人，不过是例行公事，此次批判会触及到军方的灵魂人物——伟大的朱德。

本来和朱德没有关系的，最后火烧到朱德头上，是因为朱德搞批判时态度消极。这是理由么？确实如此，朱德在批判会上一贯消极，从庐山会议就如此，也就是说说就过了。这一次不同，来真的了，而且火力异常猛烈。

朱德首先做了自我检讨，大意是：本人做错了事，对不起革命同志，感谢大家帮助云云。具体例子也有：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按道理说，像朱德如此德高望重，检讨一下也就应该过关了。政治运动说到底也就是权力重新分配。此刻的朱德既不主政也不掌军，挂一个人大委员长的虚职而已，而且已经老了，也折腾不动了。但是不然，朱德检讨完毕，大家开火了。这就出现了现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真伪难辨，但是通篇下来，还是偏真，说话的风格、逻辑都让人联想到那个年代。朱德讲完，林彪第一个开火。

林彪如是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

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的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的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是彭德怀在前方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这是林彪的风格，说话和逻辑都是一致的。这个逻辑看起来非常怪异，不像精明的林彪应该说的话，实际上不然，这话是站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来说的。如果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林彪为二号人物的立场来看，以道德为指挥大棒，那么这些就能理解了。

尽管如此，这些话事实上依然是站不住脚的。彭德怀的问题就不说了，冤。要把朱德和彭德怀联系起来却是说不过去的。如果朱德和彭德怀真的组成一个军事联盟，即使毛泽东也得掂量掂量。其它部分勉强能说过去。说南昌起义之后是无政府乱走也没错，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政府。但是要说是陈毅指挥去井冈山，那就搞笑了。陈毅当时的角色也就是朱德的助手而已。以林彪的性格，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才是。但是既然在那个年代，“朱德的扁担”可以变成“林彪的扁担”在博物馆展览，林彪偷换一下概念也能理解，为了批判而批判么。当然还不止这些，还要把朱德引向现实问题。

林彪：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那么此刻为何要对付朱德呢。事实上，朱德和林彪的关系也是源远流长，这还得从南昌起义说起。两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南昌起义。当时朱德四十一岁，是已过不惑之年的老军人；林彪刚刚二十，还是初出茅庐的黄埔小军官。在那场诞生了共军的暴动中，朱德是高级军官，林彪是低级军官。在起义的正场，两个人都没有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之后，两个人的个性和才华都有

了不同程度的施展。在队伍战争的过程中，不惑之年的老军人用尽全身解数，成为那支残兵的中流砥柱；初出茅庐的林彪显然看不清革命的前途，中途开了小车，但又转回来。

林彪虽然开过小车，在三河坝中有过动摇，此前丢失过军饷，此后又丢了押运物资，但与此同时，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也展示了军事天才的一面，耒阳一战中，林彪用一个连的兵力歼灭敌人的一个营，接着又是用一个连的兵力击溃敌人的一个团，最后，他还是用一个连的兵力打败一个师，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神话。对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而言，思想难免动摇，也不能要求更多了。

朱德发现这个小伙子不错，是个做大事的材料，在井冈山会师之前，提拔林彪为营长。正如粟裕一样，朱德也是林彪的第一个伯乐。然而林彪注定是为毛泽东而生的。到了井冈山之后，林彪投入毛泽东的门下。一九二九年红四军七大，毛泽东作为少数派时，林彪就是少数之中一个最坚定的支持者。在那场争论中，林彪代表毛泽东和刘安恭大战数百回合，从此彻底赢得毛泽东的心。

井冈山之后，朱德虽然一直都是林彪的领导，但真正指挥林彪的却是毛泽东。从红一军团长，到红一方面军司令，到一一五师师长，到东北野战军司令，到四野司令，林彪一直帮助毛泽东打理军内事务，正如刘少奇帮助毛泽东打理党内事务一样。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再次复出，开始超越老领导朱德。庐山会议之后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就帮助毛泽东指责过朱德曰：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整天嘻嘻哈哈的，实际不老实，相当领袖。等到文革开始，林彪要全面接班掌权时，唯一需要敲打的就是朱德了。因为军内威望高过林彪的就两个——朱德和彭德怀。彭德怀成了死老虎。朱德虽不掌权，威望还在。要想破除朱德的威望，必须继续敲打朱德，比如在罗瑞卿事件中。

这一次来真的了。既然要批判，那就需要材料。有材料要批判。没有材料，制造材料也要批判。所以在林彪的批判言词中，有不少不合理的私货。但是比起陈毅同志的大帽子，林彪那点私货还是能接受的。同样在这次批判会中：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现在把这几句话单独拿出来，非常不可思议，听起来像造谣，其实不然。陈毅和朱德的关系比林彪和朱德关系要亲密。南昌起义之后，朱德之所以可以把队伍聚集起来，主要就是因为陈毅的鼎

力相助。当时陈毅还是一个热血书生，豪情满腹，在班超光辉思想的指导下干起了投笔从戎的事业。周恩来让他去当团指导员（相当于后来的政委），上任之时恰好碰到林彪的军饷给人骗了，帮着说了几句好话，林彪重新得到一份军饷，对陈毅感激不尽。

主力部队失败之后，大车小车乱开之际，只有陈毅坚定不移地站在朱德身边。某日，朱德带着剩下的队伍去了一座叫信丰的山区小城。那里比较闭塞，没有经过什么战乱，起义部队入城后，人们的生活仍然比较正常，商店、饭馆、钱庄、当铺都在营业。

士兵刚从山林里进城，饥肠辘辘哇，大家按照旧时习惯搞起了营生。几人到饭馆大吃大喝，吃完就走，饭馆掌柜要钱，有人用枪口对着掌柜玩一把幽默：“跟它要吧，枪膛里啥都有，金银元宝、袁大头，样样都有啊，要多少拿多少！”。吃饱喝足之后，又有军人闯入当铺玩另一种幽默：把手榴弹往柜台上一放，故意把引线拉出来：“那个老板，称称这个有多重，当几个零钱花花呀！”当铺老板自然哆嗦着躲一边，毕竟是军人抢劫啊，谁敢拦截？

朱德听到这种情况自然很生气，心想，我老人家为了伟大理想干革命，可不是带着你这帮小子混黑社会的。当时陈毅是唯一一个团级政工干部，朱德就派陈毅去处理。陈毅充分发挥自身口才和强力手腕，把大家教育一番，再把带头闹事的主给毙了，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把抢来的东西给还回去。再动情跟大家说：“我的同志哥，我们的政策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城镇的工商业。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是军阀的队伍，我们要有铁一般的纪律，有了这样的纪律，人民才会拥护我们，革命才能胜利。”——搞定。

朱德见陈毅的动作如此干净利索，对陈毅刮目相看，当即表示：“今后这支部队，由我和陈毅同志领导。”从此，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这个格局持续到井冈山。井冈山之初，是朱德、毛泽东、陈毅组成最初的三人团。直到那次陈毅不小心让毛泽东失业下岗，才淡出最高决策层。长征之后，陈毅和朱德天各一方，一南一北，相隔十年，无恩亦无怨。又过数十年，陈毅和朱德依然没有交集。但是就凭两人老战友的交情，陈毅也不应该去批判朱德吧？

其实这个问题在粟裕篇章里已经分析过了。陈毅批判粟裕，口气听起来也挺凶，实际上是陈毅的一种政治生存技巧而已，对朱德也一样。陈毅需要生存，就需要政治智慧。因为在朱德和毛泽东的争论中，陈毅让毛泽东下过岗。那是陈毅的政治包袱，陈毅一直背着。所以无论任何人的批斗会，陈毅都会发言，都会说些狠话。

陈毅这些狠话没有任何作用。不管是粟裕还是朱德，或其他什么人，是否挨批，挨批到什么程度，跟陈毅啥态度没有关系，但是陈毅的态度却可以保存自己。了解了这一切就可以明白，陈毅说

的狠话无关痛痒，杀伤力远不如林彪讲的那些，因为陈毅不如林彪有实力。尽管如此，陈毅和林彪的发言，还是让朱德很难看。因为在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挨批之后，陈毅和林彪是当时四大野战中仅有的两个代表人物。这两个人向朱德发难，相当于往朱德已经不太光辉的身上泼了一瓢墨汁，打击了朱德的威望。

当然，批斗会不可能只有两个军人，最有意思的是乌兰夫和薄一波两个人。

乌兰夫：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要上纲上线，一点也不困难。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这个简直是搞笑了。就算兰花跟政治失意连在一起，也不至于和批判会联系在一起吧。经过这么一点，朱德讲兰花仿佛内心不满，要爆发一般。不得不佩服政治语言的博大精深。

乌兰夫，蒙古人，二五年入党，之后一直在内蒙活动。建国之后先后担任政府委员，政务院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党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等等一系列职务，文革受到迫害。从这些履历来看，文革之前，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中，他应该是偏向刘少奇的。薄一波就不用说了，一直是刘少奇的左膀右臂。他们两个完全没必要批判朱德。

因为朱德威望越高，对刘少奇他们越有利。朱德威望高，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难度加大。因为朱德并不是毛泽东的吹捧者。其实乌兰夫和薄一波也是没有办法，形势所逼嘛。彭真等人的例子就在眼前，表现不好，下一个反革命肯定跑不了。

最有趣的是周恩来的发言。这些发言中，唯有周恩来的发言最有水平。现在已经公认，周恩来在文革中干了很多身不由己的事，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话。

在这次批斗会上，周恩来的一番话最有味道，最能反映那个时代背景。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周恩来：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周恩来：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由于周恩来的位置，每一个挨批的人，周恩来都要表态。周恩来每一次表态都有一个模式：首先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夹叙夹议，夹叙夹议中批评别人，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

在此次批斗会上，批判者的角色不一样。林彪最有理由批判，因为他需要上升，需要积累威望和人气，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破除朱德威望的办法来积累威望。所以林彪发言杀气腾腾，那是真实的。没道理批判朱德的是刘少奇等人。对刘少奇而言，朱德还在的话，刘少奇至少多一个同情者。但是批判朱德也有一点隐晦的好处，即可以转移一下毛泽东的注意力。最没有理由批判朱德的就是周恩来。

之前已经分析过，在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一个合作者，不论谁是一把手，周恩来都能很好地与之合作，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甚至蒋介石，周恩来都能合作愉快。即使后来刘少奇真正上台，周恩来依然可以扮演一个完美的合作者角色。周恩来不仅不当一把手，而且不把自己和一把手捆绑在一起，接班人之类的头衔从来不会轮到周恩来。相反，周恩来和一把手中间，总是隐隐约约地隔着个把人，比方说刘少奇，比方说林彪。这样，周恩来既可以放手干实事，又不至于成为招牌。由于周恩来的处事能力，任何一个一把手都离不开他。周恩来没必要批朱德。因为朱德和他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毛泽东身边，和周恩来同一个量级的人物一共也就朱德和刘少奇两个，后来加上一个林彪。这几个人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区。在刘少奇即将被冲垮的情况下，再把批倒朱德，那么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的缓冲地带没了，这样的处境反而对周恩来这样的合作者不利。好在后来林彪填补了刘少奇的空缺，要不然刘少奇倒了之后，朱德淡去，周恩来成为毛泽东身后的二号人物，也将是文革洪流直接冲击的对象。有了林彪，周恩来就可以隐在正副统帅身后干实

事，那是周恩来的乐趣所在。

周恩来不愿意批判朱德，最终却批了。那么抛开政治选择不谈，个人关系如何呢。一九二二年，三十六岁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在法国遇见二十四岁的周恩来时，两个人一辈子的友谊就开始了。南昌起义时，两人有过合作。但彼时地位不对等。两人第一次对等合作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

第四次和前三次反围剿是不尽相同的战争。前三次的主要战术是诱敌深入，再寻找机会咬上几口。第四次不一样，敌人力量大增，想要诱敌深入并不容易。红军的人数也增加了，不容易隐蔽。朱德改变了战术，采取直面敌人的运动战，在黄陂和东坡两个地方打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歼灭战，直接搞掉陈诚两个精锐师，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和前三次反围剿一样，第四次的主要指挥者是朱德，只是这一次朱德的主要合作者由毛泽东变成周恩来。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主要搞统战去了，朱德依然在军中。

评价一下两人的地位，总体上相当。战争年代，朱德比周恩来重要。和平年代，周恩来的重要性超过了朱德。要评价两人关系，还要把那件毛毯拿出来。西安事变前后，周恩来冒着严寒往返于延安与西安之间。当时延安物质贫乏。某日，朱德送别周恩来时，把自己身边唯一的一条毛毯送给周恩来御寒。

三七年三月份，周恩来由延安去西安途中，路上遭到土匪伏击。周恩来摆脱了敌人。想匪徒们没有抢到东西，气急败坏地在朱德送给周恩来的毛毯上戳了几个大窟窿，然后逃窜了。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即将奔赴太行山抗日前线时，周恩来想到那里天气寒冷，又把这条烂毯子回赠给了朱德。在太行山前线，朱德住在老乡家里。老百姓厚爱朱总司令，总想把火炕烧得更热些，结果毛毯又被烤了一个大洞。朱德仍舍不得丢掉它，让康克清一针一针把烧破的地方给补缀起来，继续带在身边使用。朱德带着它经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后来那条烂毯子成了朱德和周恩来二人自己的友谊之毯，陈列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男人之间的故事也可以如此温馨呵。伟大的男人总是与众不同。通过光环往里面看一看，总是能看到可贵之处。

周恩来遗体告别的那天，朱德穿上军装，赶往医院。当他吃力地走进灵堂时，望着静卧在鲜花和翠柏丛中的周恩来，九十岁的朱德泣不成声。朱德并不是一个爱哭的男人，好友孙炳文遇害，他哭过。面对周恩来的遗体，朱德再次哭了。从欧洲相会，到南昌起义，到第四次反围剿，到开国大典，到文革……往事一幕幕，说也说不清。最后朱老总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人生中最后一个军礼。当战火和政治风波之后，咱们还是朋友。好吧，咱们并不遥远，你先走一步，我也不久于人世。半年之后，朱德过世。

了解了这一切之后，自然而然得到如下结论：于情于理于利，周恩来都不应该批判朱德，但确实批了朱德。这表面上的矛盾，透过文字背后就会发现，周恩来实际上不是在批判朱德，而是通过自省的方式在说服、暗示朱德，表个态过关。因为长时间以来，周恩来和朱德都属于核心最高层，就那么几个人，周恩来经历过的事，朱德基本上也经历过。周恩来取代过毛泽东，朱德没有。也就是说，周恩来在用自身经历告诉朱德该怎么做。

面对这一系列批判，朱德是怎样的反应呢？心理堵得慌是肯定的。不管他朱老总如何肚大能容，都不可能淡而处之。朱德是这么辩解的：

朱德：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听起来让人心碎。

但是不用担心，朱老总是不会被打倒的。现在这么说，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就当马后炮吧。道理还是可以讲讲的。

（七）朱德不会倒

像朱德这个级别的人，除非像刘少奇那样走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否则都不会轻易被打倒，因为代价太大了。可以这么简述一下，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冲刘少奇去的。大家都在说刘少奇和毛泽东的矛盾。实际上，就毛泽东和刘少奇而言，两人还是几十年的同志关系，见面还是客客气气的，见面里面还相互祝福身体健康之类的。之所以不可调和，只因为两人背后都站着一个集体。刘少奇的背后就是整个行政系统。打倒刘少奇并不需要那么大力气，主要是刘少奇背后的行政系统，从上到下一扫而光。这个代价大家现在都明白。

打倒刘少奇的借口，也无非就是被捕的那段时间里一些隐性的东西。什么叛徒、内奸、工贼都是引申出来的。如果非要打倒朱德，也不是没有借口。因为朱德直接指挥过国军，而且被国军指挥过。借口多的是。比方说东线总指挥的问题，就是听从了国民党的任命。和刘少奇不一样，朱德的基础在军界。而年事已高的朱德已经淡出军界，背后那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军方系统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的身后。但是如果非要把朱德打翻在地的话，就要牵扯很多人。

比方说按照林彪的批判，要清算南昌起义之后上井冈山之前那段无政府盲动。那么好吧，在那段时间里，朱德提拔了陈毅，提拔了林彪，提拔了粟裕，是不是也得一起清算？如果清算朱德在井

井冈山时代和博古、李德合作，那么好吧，那时跟着朱德和博古、李德合作的人多了，比方说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都是在朱德指挥下作战。如果清算抗战时期，那么好吧，元帅将军们都在。相当于把本来已经站在毛泽东和林彪身后的军方又扯出乱子。按照之前批斗将帅的模式，刘伯承是教条主义，粟裕是告洋状、争权，彭德怀是里通外国，贺龙连批斗会都没有，黄克诚、罗瑞卿等人都是反党反革命。从来没有一个说是以站错队为批斗理由，因为那样会影响军人的士气。

朱德在军内是一个盘石一样的人物。有他在，军内象征就在。不同的山头 and 派系都会聚集在这个巨大的象征之下。打倒朱德，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这些真空需要有人填补。填补之人是否能服众且不说，会比朱德更淡泊名利么？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朱德这个人虽然和彭德怀关系不错，为彭德怀说过话；和刘少奇、周恩来关系也不错，然而朱德明白、而且谨记：最为重要的那个人还是毛泽东。

朱德和毛泽东有过不快，特别是井冈山时期。朱德的实力强于毛泽东。要问游击战的源头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说是井冈山。其实不准确，可以延伸到南昌起义之后，朱德带领残部在江西、福建、湖南游荡的那段时间。正是那一年多的经历，南昌起义时代这个队伍由国民党正规军过度到机动性十足的早期红军。他们就是游击战最早的实践者，原因很简单，不搞游击，一两千人早就完蛋了嘛。主力部队没搞游击，结果在福建、潮汕失败了。朱德上井冈山之后，军队战法也就延续了下来。前三次反围剿斗争，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天才军事思想成熟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朱德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两人关系一直磕磕绊绊，因为毛泽东的性格很强势，他的天才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第四次反围剿，基本还是朱德在指挥。周恩来虽然也在指挥，但人马是朱德的，周恩来只是一个中央外来户。

可以说井冈山时代，朱德的作用至少不低于毛泽东。然而朱德也有缺陷，缺陷就是不能玩政治，注定无法成为领袖。任何时代，单纯的军事将领都无法成为领袖。比方说楚汉争霸，项羽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不能玩政治；刘邦虽然打仗不咋样，却是一流的政治家。靠军事的项羽，无法让韩信、陈平等入信服，所以他们跑到靠政治的刘邦那里，结果刘邦赢了。在帝王领袖里面，武功当属李世民和朱元璋，此二人最终成为领袖，依靠的并非单纯的武功，更多的是政治。李世民能把李靖、屈突通、阿史那思摩、李绩等人安排稳妥，靠的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手腕。同理，朱元璋掌控徐达、常遇春、李文忠、蓝玉等人，也是政治手腕。朱德这样一个军事家，是没办法把军事政治同时收拾稳妥的，比方说林彪，本来是跟着朱德的，最后跑到毛泽东那里去了。比方说罗瑞卿，单独上山的才俊，就投入到毛泽东的怀抱而非朱德。

朱德无法成为领袖，那就要认可一个领袖。朱德对周恩来感觉良好，通过第四次反围剿，感觉

更好了。如果周恩来成为领袖，朱德也没话说。如果不是李德瞎摆弄，朱德对博古也没意见。说白了，离开战场的朱德就是一个老农民；即使战场上，看起来也像农民爷爷。他会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既定政策。比方说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某次战斗，朱德因为周恩来和中央扯皮，白白等了二十天。比方说第五次反围剿，明知道中央的战法不行，朱德不敢、也不会、也没办法反抗。因为政治圈子的水太深了，他没办法测试深度，也没办法疏导其中的暗流。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长征途中损失惨重，最痛苦的是谁？是毛泽东吗？他也在痛苦，但很大一部分是为自身的生存和前途担忧。真正痛苦的人是朱德，因为井冈山根据地耗费了他无尽的心血。红军队伍，主要是朱德拉扯出来的。死去的那些人，多半是朱德辛苦栽培的；加上朱德本就心地宽厚，痛苦便会加倍。所以在遵义会议上，其他人搞斗争时，朱德才会悲愤到流眼泪。正是此时，朱德把心思锁定在毛泽东身上。朱德心中应该有这样一把算盘：周恩来虽然看起来更为和善，可是他没能保住井冈山，其他人更是不足道。至于老毛，为人虽然霸道，有时候不近人情，至少能保住家底。没有家底，一切都免谈。

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朱德认可了毛泽东。在此后的岁月里，朱毛变成毛朱，最后毛变成神，朱处境不佳。朱德对毛泽东看起来若即若离，实际上朱德对毛泽东始终是不离不弃。如果说朱德对毛泽东的忍让和迁就不足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感情，那么就看看生命的最后时刻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去世之后，朱德不顾八十九岁高龄，不是选择养病，而是增加工作量，理由是为了同样身体不好的毛泽东分担工作。

那么毛泽东对朱德又如何呢？没有文字可以作为佐证。虽然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讽刺过朱德隔靴搔痒，总体上来说，他对朱德还算尊崇的，特别是朱德甘愿逐渐淡去，和刘少奇逐渐浮上水面简直成了一个鲜明对比。正因如此，毛泽东最后没有动朱德。对比一下时不时检讨的周恩来，朱德待遇已经不错了。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为何又把朱德拉出来批？答案很简单，文革全面展开之前，需要一个样板。不能一开始就把国家主席打成叛徒，政治需要一步步来。除了彭、陆、罗、扬这些人，还需要一个样板，通过这样的一个样板来展现文革的力度和决心。当时中央高层之中。刘少奇和邓小平是要打倒的对象，周恩来政治手腕高明，动他难度不比刘少奇小，而且还指望他担任刘少奇案件的组长呢。要不是周恩来在，刘少奇的案子唯有毛泽东亲自负责了，江青肯定是压不住的，林彪都未必能摆平。因此，唯有朱德最为合适了。因为朱德资格老、威望高、实力弱。所以有了这场怪异的批斗会。

而这场批斗会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接下来，孙炳文之子孙泱因为担任过朱德的秘书，被活活打死；贴朱德的大字报；冲击朱德的家。

而且捏造了一个骇人离奇的案子，号称“中国（马列）共产党案”。过程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提供了一份名单，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九人，委员有王震、萧华、伍修权等十六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批判朱德，只是文革的一个步骤。

我们通过三个案例，分析了文革的三个基本特点：一，道德大棒高高飞舞；二，没有谁是安全的；三，力度是空前的。有了这个基本常识后，我们就能进入正文了。

五、从江青说起

（一）江青的出身

说起文革，江青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那么就从江青开始说起吧。

江青有三重身份，女人，玩政治，影响过时局走向的历史人物。

女人遍地都是，玩政治的女人不多，玩政治玩到历史留名的更寥寥无几。数千年以来，女人局限于家庭之中，多为生存忙碌，命运较好者也就是学点诗书礼仪之形、相夫教子之道而已。即便如此，能够快快乐乐地生活的女人依然不多。能够涉足于政治的，多半是因为男人。因为男人在玩弄政治，男人通过玩弄政治而统治历史。女人能够玩弄政治的，基本上都是因为男人有权势，而且死得早。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在政治上影响了历史的女人。比方说汉朝初年的吕雉，她的男人叫刘邦。刘邦搞定了秦末乱世，当了皇帝。刘邦比吕雉死得早。刘邦死后，吕雉就用自己的老辣影响了汉初的历史走向，萧何、陈平之辈，也得低头装孙子。从吕雉之后，有过不少女人，或是贤淑，或是有才，或是美艳，或是风流，也没有折腾出太大的动静。直到武则天出现。武则天的男人也是皇帝，而且比武则天死得早。武则天就利用女人罕见的手腕，把女人的故事推向极致，让天下男人下跪磕头。此后理学兴盛，女人遁入历史，值得说的，似乎就是秦淮名妓。然而名妓和政治无关。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女权复兴。女人不仅仅走出了家庭，而且在此走向政治舞台。才貌双全的宋氏三姐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宋霭龄下嫁有捞钱手腕的孔祥熙，和财富连接在一起。宋庆龄追随革命领袖孙中山，献身于理想。宋美龄则下嫁权谋大家蒋介石，伴随权势度过一生。当宋霭龄隐于幕后，暗中操控家族事宜，亲手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宋庆龄为了孙中山的遗愿游走于各个党派之中，赢得广泛尊重。当宋美龄游说于美国，为国民党挣得美援。数十年间，宋氏三姐妹让多少豪杰失色！然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至少有两个女人对时局的影响胜过她们三姐妹。

一个是慈禧，慈禧的男人很早就死了，她通过自己的谋略摆平了男人们。严格来讲，慈禧应该算十九世纪的女人，她仅仅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八年。然而慈禧太重要了，她是封建王朝最后一个象征性人物。慈禧的死，意味着清王朝的死亡，也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死亡。慈禧之后，清帝国失去最后一根支柱，死亡已是不可避免。三年后的辛亥革命不过是为这个已经死亡的王朝举行一个死亡仪式而已。

另一个在政治影响上超过宋氏三姐妹的，就是江青同志了。江青能在政治上超过宋氏三姐妹，并非她本人比宋氏三姐妹强多少，而是她的丈夫强过她们的丈夫。江青的倒台，同样具有象征意义，即中国政策的大转变，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意味着中国开始融入世界。中国的这场转变，在世界历史中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个中国女性名气排行榜。整个二十世纪，江青的名字将名列前茅。即使把这个期限延长到整个中国历史女性排行榜，江青依然会榜上有名。

那么江青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曰，是个演员。演员当然一直在表演。江青在舞台当演员的时间并不长，但江青表演的时间却很长。因为在戏中她的表演水平只是三流，她的舞台在生活中。她生活在男人的世界里，把这些男人给自己当背景，让他们哭，让他们笑，把他们掌控于只手之间。

江青，生于一九一四年（存疑），原名李云鹤，正如那个贫苦的时代一样，江青有一个贫苦孤独的童年。祖父李如海本是地主，有一百多亩地，到了父亲李德文当家时，仅剩下一个木匠铺。李德文有两个老婆，江青的妈妈是李德文的小老婆。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已经六十岁，在那个时代已经算相当长寿了。

李德文脾气粗暴，手里没钱时就打老婆。一九年元宵节：那诸城淮河岸边，有钱人家早早地挂起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憋了一肚子气。恰好在此时，江青的妈妈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火了，抓起一把铁铲再次打老婆，先打背，后打手，打断了她的小手指。江青见状吓得大哭。父亲给江青一巴掌，打掉了一颗牙齿。江青妈妈再也无法忍受了，背起江青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妈妈只是一个普通妇女，只有力气没有文化，出走之后，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两母女的生活。江青曾回忆：“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如此童年，似乎过于残酷了一点，然而没有办法，这就是那个时代。和同时代的宋氏家族三朵骄花相比，江青只是一株顽强的野草。

江青的妈妈曾经在诸城姓张的地主家当过佣人。张家有位二少爷叫张少卿，当时十五六岁。这位张家二少爷进过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上海大学特委支部书记，最后和王明联系上了，去了苏联。在苏联，这位二少爷给自己取了一个时髦的名字。那名字音译过来就两个字，康生。此后，世人皆知康生，而不记得张少卿或张家二少爷为何人。正是这层关系，三十年代，江青在延安的一切才顺利过关。

江青念完小学便进入山东实验剧院学艺术、学习话剧。那一年，江青十五岁。话剧是江青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没有学话剧的李云鹤就没有后来的电影演员蓝萍。这段时间江青的生活还是比较充实的，认识梁实秋，结实沈从文，学话剧，当演员，有滋有味的。这只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的江青依然赤贫。作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修说满足那日益觉醒的爱美之心，她甚至没有足够的衣服取暖。

一九三一年，十七岁的江青回到济南，当剧社一个小角色，类似跑龙套的，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也没有一个安定的家。那是战乱年代，工作本就不好找，江青既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没有家庭背景，怎么办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某日，江青在《湖上修事》出场，引起一位富家公子的喝彩。他便是裴明伦。裴明伦家境不错，算个富二代；人长相也不错，是个帅哥；学历也还行，当时中学毕业，和现在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值钱。裴明伦大江青几岁，被江青迷倒了，壮胆给江青写了几封情书，成了江青一生中第一个求爱者。

性格方面，裴明伦宽厚斯文，是个可靠之人。和一般意义上喜欢玩票的富二代不同，裴明伦真心喜欢文艺，对江青也是真心的。江青了解这一切之后，觉得裴明伦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当时还是讲究门当户对的年代，毕竟当时演员的地位不高，常常食不果腹，毕竟江青在当时的演艺界没有任何地位，想找一个年轻、有钱、又喜欢自个的主并不容易。江青的家人也觉得裴明伦是个不错的选择，让她不要错过机会。江青决定嫁给裴明伦，这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比方说衣食住行等等。江青和裴明伦的恋情是地下进行的，主要是江青担心裴明伦的家人不同意。然而他们的关系进展很快，裴明伦最后向家庭摊牌成功。这样十七岁的江青坐着一台挂着大红花轿子，在传统的唢呐声中嫁入“豪门”，成了裴妇人。

现实是残酷的：精神和物质常常无法统一调和。江青是个野性子，别指望她能适应裴家一系列的家规。和所有的年轻女孩子一样，她要睡懒觉，不懂得如何与婆婆相处，总是和一些在裴家看来不三不四的朋友一起聚会等等，把生活当成舞台。站在裴家的角度上看，如果是大小姐也就算了，迁就迁就，一个小戏子还这么着，不丢人么？在江青看来，裴家因循守旧、生活单调乏味、婆婆古怪。双方矛盾一大堆，麻烦一大堆。虽然有吃有住了，但是江青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也是接触过梁实秋、沈从文的新潮姑娘，很难选择去做回一个旧时代的小媳妇。她需要到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去消耗那多余的激情。两个月之后，江青离开了裴家，去了青岛。此时的江青，是一个敢于为了个性放弃幸福生活的姑娘。

青岛当时是外国势力范围，生活花样远胜济南。江青通过老师的关系进入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的图书馆当管理员，偶尔去中文系旁听一下。彼时彼处，江青认识了大她三岁的物理系学

生黄敬。

（二）生活和舞台

如果说斯文而略显保守的表明伦还无法满足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世界的话，黄敬可以说是完美的人选，可以说是表明伦的加强版。

黄敬真名叫俞启威，绍兴俞氏家族的三少爷。俞家和曾国藩家有过姻亲，俞启威的爷爷当过鲁迅先生的老师。俞家很有钱，在很多大都市都有豪宅。俞启威的爸爸留学日本和德国，当过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的局长。俞家三公子俞启威更绝，身为官僚大族的公子哥，放着吃喝玩乐的日子不过，满腔热血地跟着甘愿为穷人闹天下的共产党，而且在白色恐怖时代秘密加入共产党，也算是与众不同了。认识江青时，黄敬是个地下党。

江青和黄敬初相识时，两人的差别非常大。黄敬出生名门世家，英俊潇洒。江青不过是个土包子，虽有姿色，但称不上绝色美人。能彼此吸引，是因为二人皆为不安分的主。江青的精神是动荡不安的，正是这动荡不安的精神支持她在乱世生存下来。黄敬的思想是激进的，很简单，那个时代不激进的人不会当地下党。虽然现实诸多差异，精神的相似性让他们走到了一起。两人成了磁铁的两级，深深地吸引了对方——他们结合了，没有办理结婚证书，也没有举行婚礼，即同居了。黄敬的激进言行引导了江青那骚动不安的思想。于是江青在十九岁那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需要冒被捕杀头危险的地下党。两个月后，黄敬被捕，江青逃往上海，与组织失去联系。

在那个时代地下党被捕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要知道蒋介石正在全力剿共，很多有名的共产党人，如邓中夏、蔡和森等等都被咔嚓了。然而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金钱和武力能解决很多问题。俞家没有武力，却有足够多的金钱，就把黄敬给捞出来了。

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看，黄敬都是江青一个很好的归宿，然而两人没有结婚。原因很简单，俞家强烈反对。黄敬的姐姐因为要学演戏，他爸爸认为戏子有辱门厅，竟然要断绝父女关系，指望俞家接受江青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土戏子，那是难如登天。任凭黄敬磨破嘴皮子，他妈妈就是不让江青进门。不让江青进门，于是黄敬和江青一起去了北平。俞家更狠，断绝了黄敬的生活费。这一招太狠了，江青在北平活不下去了，又回到上海。

屋漏偏逢连夜雨，回到上海的江青被捕了。因为江青是地下党，在和地下党接头时被捕了。后来江青回忆：“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

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样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这地下党工作干得还不错呢。

江青在监狱里蹲了一个多月，被保释了出来。出来后躲了一阵子，好在她只是个小角色，也就无所谓了。政府可以忽视她那样的小角色，但是命运不会。一个年轻女人，孤身在上海滩闯荡，衣食住行很成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江青那里好像不是问题，她把名字从李云鹤改为蓝苹，决定成为明星！

首先她得到一个话剧主演的机会，就是她日后赖以得意的作品《娜啦》，改编自易普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演出效果很不错，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并不是江青的演技有多高，而是剧中主角的个性和江青非常相似，因此她无须演技，只要本色演出就行了。二十一岁的江青有点飘飘然了，决定进军电影界，觉得自己的资质可以成为大明星，取代蝴蝶，红遍上海滩。为了这个梦想，江青做足了功课。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唐纳。

唐纳，苏州人，和江青同年，典型的江南文人：眉清目秀，情感丰富细腻，性格优柔寡断。然而江青看重的不是这些，而是唐纳的身份：演员、编剧、影评人。唐纳写影评，文笔流畅，言词适中，评价中肯，各大报纸争相转载。因此唐纳在电影界也有不错的知名度，而他手中的那支笔既能捧人也能贬人。江青看中了那支笔，也就是说江青打算一边恋爱一边搞宣传。这么说，并非想说江青的爱情观怎么样，任何高雅的爱情都有一个庸俗的开始，比方说相貌、才华、财富等。作为一个孤身闯荡上海滩的外地女艺人，似乎也找不到更好的宣传方式了。

江青并不十分漂亮，甚至有一颗门牙还是黄色的。在大上海俊男靓女满把抓的地方，想要宣传谈何容易呵。但是她足够机灵，很快便收服了唐纳。

唐纳回忆“纵然在上海，像她那样大胆，也是例外。不要想象她是胆小怕生的中国女孩。她不是你通常所见的羞答答的中国女孩。主动地和男人谈话，她毫不在乎。她的行径，一如男性。啊，她是勇敢的女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江青的性格——敢作敢为。

关于两人相见、相识、相爱的过程，当年的新闻如此描述：在电通影业公司，有一天，有人亲眼看见蓝苹挽了唐纳的手臂，肩并肩地出去，剩下来的睁大了眼珠对他们看。当天晚上，他俩没有回来。第二晚，也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下午的六时许，才见唐纳与蓝苹，仍旧手挽手，肩并肩，

满面春风的回来。他们一回到公司，就往经理室而去。到晚饭的时分，才和经理马先生回到膳厅。饭吃到一半，马先生立了起来，对大众报告了一个好消息，说是：“同事唐纳先生，与蓝苹女士因意见相投，互相了解，而将实行同居。”说完后，轰雷似的一声，都围住了二人，一半祝贺，一半要他们报告同居前的过程。这一晚的晚饭，就在这样的纷乱喧嚣中过去。

恋爱的过程可以用一见钟情、干柴烈火等词来形容。非但如此，两人还有一个浪漫的婚礼。半年之后，江青、唐纳等六人组成三对夫妻到六和塔在旅行中举行婚礼。唐纳如此设想：六和塔又名六合塔，矗立于钱塘江畔月轮山上。唐纳取其“六和”、“六合”之意。当时新闻界再次轰动，认为有趣。连上海法学院院长、著名大律师、大名鼎鼎的沈钧儒也觉得有趣，兴致勃勃跑过来当证婚人。

尽管如此，江青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没有改变。电影和话剧不一样：话剧成本小，一群热心人士把世界名著改编一下就能表演了；而电影是需要成本，需要砸钱的。明星背后都有权贵支撑着，什么干爹啊之类的角色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谁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三流外地菜鸟砸钱？有啥好处吗？唐纳手中有笔，心中有才，可是口袋里没钱，即使把自己赔进去帮助江青造势，依然是镜中花水中月。江青只懂得制造新闻，不懂得新闻背后的利益动机，所以即使制造出新闻依然于事无补。我们把场景转换一下，看一看文革时代的江青，不停批斗这个打倒那个，每天处于风口浪尖，却从来没有弄清楚背后的权力关系。到最后，靠山倒下之后，她依然是一无所有，成为刀俎上的鱼肉。

江青不明白这一点，以为新闻不够强悍，便继续制造新闻。

六和塔浪漫婚礼之后仅仅两个月，江青制造了更为轰动的新闻。三六年五月份，江青以回济南探母为名，一去不归。唐纳在上海心如火燎。六月二十三号，上海的唐纳接到江青写来的一封信：

“纳！当你看到这封信，为了我走起来顺利起见，筹划好久的这件事，迟迟到今天才告诉你，我想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

“自从我跑进影圈，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我苦恼，我绝望，我想毁自己，可是我遇到了你，你使我暂时消灭了我所有的苦恼，但是更深的矛盾却也在这里生了根。我不愿林黛玉式的忧愤死，我知道怎样使得我言行一致，我更知道怎样使我自己死得有价值些，因此我决绝的离开你，还有那个大的诱惑——风头、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在我计划回家的那几天里，我竭力企图和你过几天快活日子，可是你那几天的脾气却特别的坏。有时你非让我下不来，而且使我非常伤心。虽然在搬家时候，我忍不住和你闹过几次，可是过后我马上懊悔了，懊悔得想痛哭。

“关于我这次的走，你也许会说我太自私，但是我的话是早讲在头里了。在你初恋我的时候，我曾经警告过你，爱我是痛苦的。你却说你愿忍受这个痛苦。接着我还说过，如果在必要的时候离开了你，可别恨我呀。你说，不会的。纳！想来不至于忘了吧。就连结婚，我也曾说过于你，是不利的，却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经济，逼我们走上这条路。为了应付你的社会关系起见，我不能不想一个法子补救。想了又想：是有一个法子，就是说我死了。这样，又可以应付你周围，说是于我以后的生活，也不无补益。纳！反正我是离开这个环境了，就算死了吧。希望你不要骂我做事走绝路。我认为一个人必须走一条路，同时也应该绝了所有的路，免得犹豫和退却！”

概括起来就是，我走了，不要怪我。虽然彼此相爱，却没有前途了，要名没名，要利没利。就当 I 死了，欠的钱也不用还了。唐纳一看，脊梁骨直发凉，立刻马上乘车去济南，脑袋里盘旋着江青的日常用语：“爱我是痛苦的。”

唐纳急匆匆地赶到江青家中，首次见到江青的妈妈和姐姐。她们告诉他：“云鹤不在家。”“她上哪儿去了？”“她不在济南！”“不在济南？她在哪儿？”“她没说，俺不知道！”“不知道？她走了多少天了？”“十几天了！”唐纳告辞。第二天清早，再去江家敲门，依然不在。中午再去敲门，还是不在。晚上依然如故。

江青真的不在，她去北平看望俞三公子黄敬了。黄敬去北京后，上了北大，又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混得风生水起。后来正是在黄敬的指引下，江青才去了延安。延安审干，除了康生帮忙，还有黄敬证明江青很早就是共产党员，江青才安然过关的。解放后黄敬曾任天津市委书记，五八年去世。

然而当时的北平已是高危地区，日本步步紧逼，别说发展前途，连工作机会都没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学生正在南下，其中有两个女学生，就是薛明和叶群。只是此时的叶群和江青还在人生低潮，素不相识。

这边痴爱着江青的唐纳毫不知情，彻底绝望。他本是感情丰富、性格软弱之人，遇到重大打击，感情便淹没理智。怎么办呢，没有活头了，那就不活了呗。他记起那部两人一起演出的影片《都市风光》。在影片中，他饰男角追求江青饰演的女角，失恋后喝下一杯又一杯药酒自杀了。他决定人生如戏：药店买很多消毒用的酒精和红头火柴。

绝望之极的唐纳留下遗书：阿苹，我最亲爱的：想不到你竟走得这样突然，这样匆匆！这是开头部分，中间啰嗦了一大堆琐事，结尾如下：

——我本想努力找到你，但是苍海茫茫，我上哪儿去找？

——沦落异乡客邸，雨，老是在铅皮上滴着，现在只是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一个人。

现在谁是真正爱我的人？谁能再真正爱我像你一样？

——我死，对社会没有什么利益，可也没什么害处，我再能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呢？

我死了，我相信只有使你更发奋，更奋力，因为可以常常使你遐想，常常使你追怀的人，现在，现在已经死了！

——没有什么别的遗憾，只是没有见到你最后的一面和那两个圆圆的笑窝！

应当佩服唐纳的才华，看这哀伤的文字，绝不次于《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名著里面虚构出来的生离死别。

然而唐纳先生没想到的是，戏和人生有很大的差别，即便是自杀，做不到位也无法成功。他喝了很多消毒酒精、吞了很多红头火柴，结果没死掉，被茶房送医院去了。一次不成功没关系，那就两次，两次不成功，那就三次，搞得大夫通宵守在床边，终于唐纳还是没死成。当然以后还有自杀的机会，因为他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人就是这么奇怪，本来想为某个人去死了，后来发现还有情敌，那就不死了。最关键的是江青在北平呆不下去了，只好南下回到唐纳身边，和他一起回上海。而她这么做的目的达到了。

江青要干啥呢，要新闻。这是江青刻意制造的新闻。她了解唐纳，知道唐纳在那种情况下会折腾出动静来。唐纳的表现可以说超出了江青的期望值。才子唐纳为情自杀的消息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这是现实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啊，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连篇累牍。甚至连大名鼎鼎的陶行知都惊动了，写诗勉励唐纳。

作为故事的女主角，江青的名字笼罩上海滩。江青回到上海之后，媒体争相采访。这正是江青想要的：提升知名度，积累人气，成为上海滩明星。

可惜，这是虚名。这些泡沫一样的虚名没能改变江青在电影界的处境。还是那句话，电影是个砸钱的买卖。有钱的人都是人精，没有切实的基础，没有人轻易愿意为虚名砸钱。江青好不容易演了一部电影《王老五》，送国民党电影审查机关。审查老爷硬是从中作梗，看到影片中有一段工头当汉奸的戏，非常不满，大义凌然曰“中国是没有汉奸的”！把片子删得七七八八，驴头不对马嘴。

虽然江青的电影事业没有转机，但她却用实际行动导演了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戏。这场戏很精彩，不是么？在那个男人玩弄女人如同换衣服一样方便的年代，江青能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也

算不简单呵，而且这出戏还没有结尾的迹象。

江青和唐纳虽然和好了，实际上已有裂痕。明星梦的破灭让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更为动荡，加上唐纳知道了黄敬的存在，两人本就不和谐的关系更加不和谐。苏州男人和山东女人，性格上本就相去甚远，再加上志趣不同，按照当事人的回忆，那就是很热闹：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时不时吵到朋友家，偶尔还大打出手。

无奈之际，江青又想起老本行，话剧。要回话剧界，她需要一个人的帮助，就是章泯。章泯是话剧导演，在话剧界威望很高。进入延安之前，如果说有谁真正帮助过江青的话，就是章泯。江青主演的话剧《哪啦》就是章泯导演的。章泯和江青的关系拉近之后，就和原来的夫人离婚了。章泯真正帮助江青，让她出演《大雷雨》。正是因为章泯的真心提携，二十年后，江青成为文革旗手，上海滩的“旧戏子”凡是能够得着的，均遭清算，比方说金山同志，就在监狱里享受了好一段时间。比方说和江青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女士，虽然有才有貌，却成了美国特务，光荣进入秦城监狱。大活人入狱，七年之后身死魂灭。同时入狱的还有王莹的丈夫谢和赓，若干年之后经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出狱时，人已经痴傻了。

有例外么，有，只有章泯例外。

江青和章泯的关系惹得唐纳再一次上演自杀好戏。在这自杀连续剧第二季中，唐纳不再是喝酒精、吞火柴，而是跳黄浦江。然而唐纳命大，再一次没死成。唐纳这次自杀，导致舆论对江青大为不利。江青苦心经营的人气没了，明星梦也没了。

当时两人的关系，有江青写的《一封公开信》为证：

“他又来了，进门就骂我，我请他出去，他不出去，于是我叫阿妈上来，但是他竟把房门锁了，急得我那个善良的阿妈在外边哭，可是我呢？我却平静的很，我知道他很痛苦，让他骂骂出气也是好的。可是天哪！他骂的是什么呢？我生平没受过的侮辱，他骂我玩弄男性，意志薄弱，利用男人抬高自己的地位，欺骗他……”

“我默默地让他骂，他骂够了走了。可是在我心里起誓了，让一让二不让三，他再来我就给他个厉害。我的让一让二，并不是怕他，而是可怜他，另方面是看重自己！”

“在一个夜里，他又来了，就这样我打了他，他也打了我，我们关着房门，阿妈和朋友都敲不开。我疯了，我从没有那样大声的嚷过，这一次他拿走了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他又说登报脱离关系，但是他并没有登。”

“我的家里除了一把小水果刀和一把剪刀以外，别无武器，不要怕，来吧，我绝对不躲藏！讲到所谓的‘新闻政策’，我绝对不是像阮玲玉一样，为着‘人言可畏’而自杀，或是退缩，我一动都不动地在等着，在等着他们用斗大的铅字来骂我！”

“唐纳万一再来找麻烦，以及他的朋友们要对我施以‘不利的打击’，不外是我们那次仪式（六和塔婚礼）在作怪。因为在这个社会，这个仪式——虽然没有婚书——被普通人视为一种良好的两性的约束。自然是很平常的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人利用来攻击别人，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

“起先我之不愿声张，完全是因为不愿为了这无聊的事来轰传一时，同时我不忍让唐纳受到更多的苦恼，因为我一直可怜着他的。可是现在他既这样，难道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虫子，可以随便让人踩吗？不！蓝苹是个人，永远不退缩。”

——实事求是，符合逻辑，言词犀利。文如此，人亦如此。

——江青的舞台并不是艺术表演的舞台，而是真实的人生。她在人生中的表演远比舞台上真实给力。所以说江青是个戏子，一个把人生当戏来演的戏子。至此，她的表演才开始拉开序幕，高潮尚未到来。二十年后，江青再次驾临上海，所有人都得匍匐称臣。前后的场景转变之巨大，应该是江青也没想到的吧。

此后抗战开始，唐纳和江青再没见面，直到八年之后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唐纳当时以记者的身份在重庆。江青去重庆治牙，约唐纳见面，唐纳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回绝之。此后唐纳另结新欢，晚年在法国经营一家中餐馆，生活幸福。

（三）在毛泽东身边

从裴明伦到黄敬到唐纳到章泯，这些人都不错，要么富家子弟，要么才子，要么精英，放在任何时候在大众之中都是抢手货，然而这些人最终都没能留住江青。裴明伦为了和十六岁的土包子恋爱，瞒住家人，最后用花轿把江青抬回家，可以说是真心实意。黄敬为了江青，也和妈妈争执，从上海出走北京，后来也是一帮再帮，诚意可见。至于唐纳，一而再再而三的自杀，不用解释了吧？就连地位颇高的章泯，也因为江青放弃妻子。而江青不过是一个从破裂家庭走出来的人。抛却政治问题被抹黑这个因素，这些故事至少可以证明一点：至少前期的江青，就算不是十分漂亮，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

她的魅力在哪里呢？应该说比较前卫大胆吧。放在现在不算啥，但是在那个女人依然裹小脚，依然无才便是德的年代，就显得很耀眼了。不是说那个年代的价值观有问题，而是在那个年代中国

积弱不振，热血有志之士对传统的东西不怎么待见。江青以新女性的姿态出现时，就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比方说她第一次见到唐纳，便告诉他，她是革命党人，唐纳听了之后佩服不已。唐纳性格虽然随和，却也佩服革命党那种刚硬的作风，便对眼前的这个女人好感倍增。正因如此，她才能让一个个优秀的男人变成她生活的背景。所以说，任何人成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

明星梦没有了，日本人来了，江青去了延安，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男人——毛泽东。最终在毛泽东身边，她成为一个明星，一个大大的明星，一个现实中大大的明星。

江青去延安并不容易。那个时代和现代不一样，上海也不大，也就虹口、闸北、闵行、徐汇那一块，黄浦江东岸还是一片荒凉呢，放现在也就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当时的延安更是巴掌大的一小块地，比当今一个小集镇大不了多少。这样两个地方联系起来非常困难，至少比现在困难很多。

至于交通那就更不用说了，延安虽然有个破机场，只有非常牛叉的人物才有资格在上面降落的。火车，没有；轮船，没有；汽车，没有直达的。一个女人要克服这些并不容易。即使是现在，让一个上海女孩到延安一趟，估计也是娇气好一段时间。江青好歹也是个明星，好歹被众人捧过，小有知名度。

从上海到延安数千里路不说。当时兵荒马乱的，贼盗横行，弄不好被强盗绑了，撕票也不一定。当时的大小军阀比现在的黑帮还多，到处抓美女结婚，比现在各种二代强悍多了。一小女子要过这一段并不容易。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从上海到延安要经历双重盘查，国民党要查，共产党也要查。当时国共合作，芥蒂却很深。往延安跑，国民党以为是共产党间谍，跑去送情报的；共产党以为是国民党间谍，跑去刺探偷窥的。要去延安需要组织关系，也就是介绍信之类的证明。经过一系列的周折之后，江青终于从博古那里弄到了证明信。

然而延安虽然号称革命圣地，却是生活苦寒之地。

上海和延安是两个世界。在上海可以住公寓，延安只能住民房或窑洞。上海有自来水，虽然质量有时出点问题，吃喝拉撒却也方便；延安只能在河里淘米洗菜。上海可以灯红酒绿，好吃好喝好睡；延安只能喝小米粥，吃小土豆，偶尔见点肉星。上海可以在黄浦江岸边吹吹风，延安只能吹来黄土高坡的风。即使上厕所，上海有马桶，延安只能蹲苍蝇乱飞的粪坑……差别太大了。

那么江青为啥要去延安那地方？原因有性格上的，也有现实意义上的。江青就是那种动荡不安的性格。在日本人占领山东，紧逼上海之后，江青已经无处可去。依据她的性格，她需要一个立足

之地。全国虽大，能容纳她的地方却不多，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去另一个极端之处吧，就是延安了。延安还有一个现实的目标，就是老情人黄敬。黄敬也去了延安，而且小有名气。在江青交往的男人中，黄敬是唯一一个能从精神上影响江青的。但是不能说她就是为了黄敬去延安，主要还是她那动荡不安的性格。黄敬的作用，仅仅是证明江青曾经是党员，帮助他恢复了组织关系。

由于条件艰苦，不少人来了延安又走了，江青留了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再一次改名，不再是蓝萍，而是江青。江青，取于唐诗“曲终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又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青，即江青，藍，即藍萍。江青勝過藍萍，那就再干一番事業吧。

江青要干事业，第一件事就要恢复组织关系。因为当时的延安啥都没有，只有梦想和热血。通往梦想和热血的道路就是组织关系。没有组织关系啥都干不成，江青孤身一人来到延安，孤身一人在小旅馆和苍蝇、蚊子奋斗了两个月。最后终于苦尽甘来，老乡康生从莫斯科归来，老情人黄敬也来到延安。在两个人的帮助下，江青再一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得到进入中央党校进修的机会。后来江青成为中央党校校长。老乡关系，使得江青在高层找到一个大靠山。康生非常有才，非常会钻营，很快便如鱼得水。两人这种他乡故知之情确实帮了江青很大的忙。

虽然延安比较艰苦，和大上海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没得比，但是江青很快就发现延安是个好地方，因为在这里她有了表演的舞台。在上海，她只是一个三流明星，挖空心思制造新闻，也只是博得他人一笑，在这里不一样，她成了高技术人才。

当时的延安虽然人才济济，能玩枪的很多，能玩舌头的也很多，还有很多人既可以玩枪也可以玩舌头，但是女人很少，有姿色的女人更少，有姿色又能演戏的就更少了，而江青就这样成为稀有动物，一下子身价大增。在上海，挤破头皮赢得一个小角色，还被人批来批去；延安不一样，随便演一演，就有中央首长来观看。那些人不只观看，还会真心欣赏，不挑刺，还会鼓掌叫好，还会亲切慰问演员，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很有成就感。这些人虽然衣着打扮上不如大上海的商贾公子哥，但一个个都是鼎鼎大名，其威势和魄力远非上海滩那些装逼的家伙能比。

关于江青如何与毛泽东走到一起，有很多版本。

传说中的版本：江青来到延安的第二天，便随着徐明清和王观澜去见毛泽东，然后彼此印象良好，良好变成亲密。然而徐明清同志根本就不是和江青一起去延安的。而且江青在延安小旅馆里闷了很久。所以这是不靠谱的。

八卦版本：江青演《打渔杀家》里的萧桂英，演得很好，把桂英同志演得英俊潇洒，活灵活现，据说毛泽东也去看了戏，很高兴，使劲鼓掌。江青同志感动之余灵机一动，第二天找康生同志带领，去毛泽东那里请教文艺问题。另有八卦版本曰，不是《打渔杀家》，而是因为演《被糟蹋的女人》而进入毛泽东视野的。又有八卦曰，是《锁在柜子里》。

不管是那个版本，可以证明两件事：一，延安的江青相当活跃；二，毛泽东看过江青演戏。有当事人回忆为证。

一九三八年七月七号，纪念卢沟桥事变一周年。上午开会，下午看戏。见证人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泽东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目击这样一幕：“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

但是这不见得就是毛泽东和江青第一次见面。所以又有秘史版本，而且比较详细。《江青秘史》记载：

出入中央党校的都是相当重要的人物。江青混入党校，是她取得政治资本的重要一步。下午大家到礼堂听报告。江青最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子。她想，一定要坐在显眼露面的地方，不管谁做报告；做报告者必是党中央领导人。

两点钟了，忽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全体起立。

台上出现了毛泽东，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

江青也站起来鼓掌，对准台上招招手，拍拍手；再拍拍手，又招招手。她清楚地知道，这几下可以使毛泽东发现自己在前排。听报告时，她一时似乎在认真地听报告，一时又像是在思考报告的内容；有时急速记笔记，有时又似乎支颊，偏着头看台上的人。姿态变化无穷。

两个钟头的报告结束了。同学们有的兴奋得没有心思去玩，马上整理笔记；有的互相交换学习心得。晚上，全校分组讨论。江青坐在那儿，不多发言；她的心早飞了，私心杂念，不能告人的隐情，一齐涌上心头。今天是和毛泽东第二次相见了，马上要来一个行动，否则心愿依然渺茫。学习

小组会快结束时，她巧妙地作了十分钟的发言，把会上同学们的发言加以归纳整理，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上漂亮的形容词重复一遍，言词动听，似乎有条有理。

晚上，等大家都睡觉了，她独自一人坐在灯下，提笔写道：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我今天专心地聆听了你的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报告，你指明了光明的方向，使我鼓舞。

我是一个木工的女儿，从小受生活的折磨，在三顿吃不饱的苦难中又遭父亲酩酊大醉殴打成性的逆境；母亲受压，家破人亡，流落他乡；我被迫学京戏，登台谋生；后到上海加入左翼文联，于一九三三年入党，先后当电影和舞台明星。这是党给我的培养，是你的光辉思想哺育了我，才有今日。

我向往延安，追求真理，现在是党校十二班的学员。我因理论水平极低，革命斗争经验极少，有许多政治思想上的问题缺乏先进者的指教。

我请求，敬爱的毛主席，请你在百忙中接见我一次，这是我这个苦孩子一生的唯一的希望！我思想上有许多问题，如能得到你的当面教诲，我当获益不浅！其中一部分是今天听你的报告之后，有关目前形势的分析。在某一点上，我还不甚明白。

敬爱的毛主席，我想你会欢迎我，你是一位善于联系群众的伟大人物，我这个纯真的女孩子只不过向你提出区区小小的要求。如果准见，我将于后日（星期日）下午三时来到你的居处。

啊！我写至此，全身热血沸腾！我将亲耳听到你的教导，的确：我已经见过你三次了，这幸福的第四次即将到来……。

中央党校十二班学员

江青

一九三七年冬

第二天，江青亲自把信送进城，到毛泽东居处的门口，又转身赶回党校。

她不再准备再追求别人了，她已经选定了奋斗的目标。

类似的秘史版本，还有好几个，大同小异，也不稀奇，只是开会的时间、地方不太一样。当然，这事也可能发生好几遍。单看任何一个版本都不太可靠，都有漏洞。但是毛泽东和江青的接触也不外乎这些途径了，因为专业不一样嘛，毛泽东搞政治军事，江青演戏，能接触的方式大致也就这么多了。从这点上也能看出来，江青对于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有着百折不挠的决心，结局往往是乐观的。

不论如何，江青成功了，她抓住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男人，这个男人比任何人都有魄力，思想行为超过了所有人。此时，江青那动荡不安的精神终于平静了。如果是她的精神是一阵旋风，那么毛泽东就是大山。旋风进入大山，终究要安定下来。

下面又有一个新问题，毛泽东为何能看上江青呢。要知道江青那些破事，瞒别人可以，绝对瞒不了毛泽东，中央特科的办事能力可不是盖的，连蒋介石都防不住。而且毛泽东当时的法定妻子贺子珍还在。

从性格上讲，毛泽东就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之人，凡是他想，必然去做；凡是他爱，必然去做；凡是他恨，必然去做，而且总是能做到。贺子珍虽然是他妻子，去了苏联，而且两个人关系并不和谐，感情也不是特别融洽。贺子珍是老革命、老红军，性格好强，而且不会隐藏女人惯有的嫉妒心。比方说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去延安采访，带一位女翻译去采访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个不拘小节之人，而且非常幽默。换成一般情况无所谓，然而对方是女人，问题就大了。贺子珍看见自己的老公和别的女人谈笑风生，自然十分不满，对那位翻译泼洒了好几碗纯正的老陈醋。

这种事人之常情，说不上对错。但是对一党领袖毛泽东来说，却是很没面子、很尴尬。类似的事还发生过好几次。后来贺子珍去了苏联养病，毛泽东更无聊了。当时毛泽东四十四岁了，很多工作要做，干活干到很晚。好不容易下班，身边连个异性都没有。就在毛泽东感情空虚的时候，江青出现了。贺子珍身上有很多优点是江青没法比的，但江青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势，那就是女人味。比起贺子珍的刚强和多疑，江青更有魅力。

如果说大上海的江青是一个风流女郎，延安的江青成了另外一个人。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曾经的艳丽的长发扎起来之后多了几分朴实。艳妆不穿了，入乡随俗。尽管入了乡，并不俗，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表情活泼丰富。再配上不差的容貌，在延安如同野地里的玫瑰，已经非常非常显眼了。

在个人能力方面，虽然和蝴蝶、阮玲玉等人比起来，江青只是一个三流演员。但是那些一流二流演员都不在延安，三流的江青就变成一流的。特别是在老本行话剧这一块，在延安可是台柱型的

人物呵。每次登台，都能让观看的大人物们鼓掌致意。——虽然文凭没有，但是才华在，让人刮目相看。而当时共产党里面，没有学历的多的是。

此外，江青同志文化程度虽然不高，却可以写文章，写给唐纳的公开信文采就不错嘛。而且字写得不错，楷书写得尤其不错。——表示江青是一个用功的人，不是那种只会抱怨的人。无论何时，用功远比抱怨重要。

另外，江青也有豪爽的一面：她很喜欢骑马，驯烈马，越烈的马越爱骑。当初贺龙给毛泽东送来一匹好马，江青就高兴得不行。骑马，增添了她的英武之气。骑马虽然英武，却不过火。英武过火，女人男性化，便失去可爱柔美，比方说秋瑾，英武得像个男人。爱骑马的江青就不爱打枪。虽然很爱打扑克，却也喜欢织毛线。织毛衣能增加女人味道。江青的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而且很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战争年代物资紧缺，许多高级将领都要自己动手做衣服，比方说徐向前、比方说粟裕都曾自己给自己做衣服。江青这一手无疑会让毛泽东心里暖暖的。

延安的江青能承受简朴的生活，能接近群众，常常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调和一下情绪。这相当于在一群大老爷们身上净赚奖励。

如此这般只表明，当年的江青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女人，非常有女人味。一个人在政治上失败了，不见得其他方面就差劲。如果不折腾，生活中的江青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这从她想追求男人从无失手就能看出来。虽然她的理论知识不怎么样，但是在毛泽东身边需要的不是那些，而是女人味。任何一个男人都想要有女人味的女人，毛泽东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传出去之后，仍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毛泽东是中共实际意义上的领袖，代表新生向上；江青不过是上海滩绯闻满身的旧戏子，意味着腐朽落后，不仅和国民党高官有往来，而且被捕过，是否有过变节行为亦未可知。康生临死之前曾通过关系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揭发：江青是叛徒。康生所指，大概就是指上海被捕吧。江青和毛泽东搞关系，不用别人说，党内就反对声一大片。

比方说总书记张闻天同志，就非常反对。当时的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的盟友，书生一个，为人处世的原则性非常强，正常情况下都会对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认同。张闻天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不能说张闻天就错了，但政治和生活终究不是一回事。比方说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项英同志，毛泽东

的对头，依然在百忙之中写个材料，表明“此人不宜和主席结婚”。但也有很多支持，比方说康生同志最为积极——此后康生也得到超额回报。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号，延安窑洞，两桌子酒菜，二十四岁的江青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礼炮是日本飞机扔下来的炸弹。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几个版本就如同评书，都有漏洞，比方说版本之一里面第二条，不准抛头露面。啥意思？蹲监狱还能放风呢。政治局会规定实际意义上的最高领导人么？版本之二第二条，当毛泽东的助手却不能干预政策的决定，瞎扯嘛。等毛泽东制定政策需要女人干预时，早就完蛋了。第三个版本第一条，不准再娶，要是江青死了呢？让毛泽东当光棍不成？政治局那些人才不会如此低能呢。

李银桥曾经否认过约法三章之事，他的理由：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虽然李银桥长期担任毛泽东的侍卫长，但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他没有亲历整个过程。即使真的有约法三章，能跟毛泽东约法的，也就是政治局常委那几个人，不可能把那事透露给一个小侍卫的。

后来台湾公布的《约法三章》：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这个根据是王若飞的日记。王若飞，生于一八九六年，反对过袁世凯，参加过五四运动，留学过日本、欧洲，二二年入党；指导过工人运动，参加过战争，搞过土地改革，蹲过监狱。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两年后任中央秘书长，有可能接触到所谓约法之事。四六年，王若飞和叶挺、博古一道，坠机而亡。之后国民党攻克延安，得到王若飞的日记，之后将约法三章之事公之于众，但至今未见原始记录，依然不能作为凭据。如果这是真的，江青也不能算违规，因为江青进入政治局，确实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之前她只是参与“文化”活动。

个人认为，所谓约法三章，不存在的可能性大一些。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央政治局那些人都是什么人，都是精英啊，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会在乎一个小小的江青玩花样？要知道江青的特长也就是演戏而已，玩政治？中央党校的纪律她都未必能搞清楚。在那些人眼中，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最多就是给人落下一点口实而已。即使有约法，最多也就是一种默契的君子协定，让江青不要过于活跃，出来影响共产党的形象。共产党纪律非常严格，形象问题非常重要，正因如此，为了占领道德制高点，江青同志狠狠地修理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人，连孙维世和金山都不放过。

在战争时代，江青是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把毛泽东照顾得很好。躲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见人微微一笑，点点头，一副听话懂事乖巧可人的小媳妇模样。此时的江青还没有、或者说没有机会表现出政治欲望。

就像演一出戏，不了解舞台的新人肯定要小心翼翼地了解情况，慢慢适应舞台的。成了毛泽东夫人的江青，就成了中共舞台上的一个新人，谨小慎微地进入角色。当时在高层夫人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走过长征，任粥时的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去苏联、走过长征，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只有后来的叶群比她资历差。此时的叶群也还是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人，精心挑选追求者，若干年后才等到林彪。

（四）转折

从一九三八年，江青在延安住进毛泽东的窑洞开始，到六十年代登上舞台，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江青基本上就是一个沉默的主妇。这期间，她生了一个孩子，去过不少地方观光、治病等等。江青倒台到现在，很多人认为，江青是一个阴险的人、一条毒蛇，一直潜伏在毛泽东的身边寻找机会，终于在二十年后找到机会，释放身上的毒液。应该说这种解释相当扯。

一九三八年之前的江青，也就是一个爱折腾的娱乐圈人士，除了精神更加动荡不安之外，和现在娱乐圈那些爱折腾的女人并无不同。然而等到六十年代，江青重新走上舞台的时候，已经像个政客了，拉人、整人、污蔑、造谣等本领已经像模像样，完成了从表演舞台到政治舞台的华丽转身。这中间二十多年发生了什么？

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江青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只不过她的家庭有点特殊。在延安窑洞里居住的那些人，都是精英呵。特别是毛泽东的窑洞里，有资格进出往来的都是哪些人？要么是显赫的一方诸侯，要么是百战将军，这些人的实力和谋略都是第一流的。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每一个人都是人杰，每一次会议都决定很多人的命运。在每一次接触中，谈笑之间，天下风云就确定了。把一个

人放在监狱里关二十年，性格必然转变，因为环境影响人的性格嘛。同理，把一个人放在核心决策圈子里放二十年，日日观察揣摩，就能学到很多手腕。

所以说，江青的政治本领哪里来的？学的。江青只是一个女人，意志并不坚强，本就容易受影响。在那种环境下，除了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也就是拍拍戏之类的，正常女人逛街啊什么的正常娱乐，根本就没有可能，因为整个延安连柴米油盐都无法保证供应。而且窑洞之外就是炮火连天。终日跟在毛泽东身边，接触到的都是运筹帷幄、纵横捭阖之类的谋略技术。毛泽东那份雄才大略是学不来的，但毛泽东展现雄才大略的手腕却可以学一点的，就像葫芦画瓢呗，又不难。在现在看来，江青学毛泽东，也就学到一点皮毛。就是这一点皮毛，已经足够让很多人吃不了兜着走。

进入北京之后，江青过起了贵妇人的生活，衣食住行自不必说，所到之处皆有掌声欢呼，所干之事皆有人奉承。奉承她的人还都是修养深厚的理论家，如康生同志，不仅骂人不吐脏字，拍马屁时也可以于无声处见真功。这种生活状态下的江青，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外号——都红女皇。这个称呼虽然很架势，生活也就是吃喝拉撒睡，除此之外，闲来无事，看看电影，从国外买点干货，接受技术含量颇高的马屁等等而已。因为当时大家在轰轰烈烈地搞建设，江青学的那些谋略技术暂时无用武之地。就算闷得发慌，也没辙。

和所有爱折腾、不知天高地厚、任性傲慢的女人一样，江青从来没有真正的朋友，加上她本来就眼界颇高，又是第一夫人，随着毛泽东的地位巩固和提升，能看得上的人更少了，也就那么几个。比方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比方说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然而这两个人表面上对江青客客气气的，实际上根本就不如刘少奇和周恩来对毛泽东那般俯首帖耳，这让江青很惆怅。因为在江青看来，既然毛泽东在男人之中是领袖，那么领袖的老婆就应该是女人之中的领袖。

——然而，历史是公平的，只要你愿意，总会等到表演机会。

前面说过，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发生很多事，战争、剿匪、反右派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这些她都插不上嘴。即使是闹得天翻地覆的庐山会议，作为第一夫人的江青也就是拍几张照片而已。世道很快变了。大饥荒的到来，不仅打破了建国十年来坚持的建设主旋律，而且把中国政坛上能量最大的两个人——毛泽东和刘少奇——推向对立面。

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分歧开始，到小四清运动，到大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风浪一浪高过一浪，一浪比一浪猛烈。这些风浪如同狂风一样席卷了所有人。身为第一夫人、过了二十多年的平静生活、本来就不安分的江青同志自然而然的卷入其中，而且表现极为拉风。

（五）样板戏

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那动荡不安的心思再次动荡起来。换成一般女人，四五十岁之后，也是精神重新动荡之时，孩子大了，年龄也大了，爱情的魔力已经淡去，家庭的温馨也开始褪色，需要重新找点活干干，健身美容啊、做生意赚钱啊、拾起年轻时代的兴趣爱好啊等等。江青也不例外，过犹不及。因为她不需要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甚至连叠被子都不用自己干，而且她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见个面都要先打招呼。

通过二十多年的耳濡目染，江青已经了解了政治舞台，正如了解了表演舞台一般。她决定表演了。江青需要干点事，也就是捞点资本。有了资本才好炫耀。江青观察了身边那些人，那些在中央政治局走进走出的人，都是身经百战，要么战场，要么会场，或者兼而有之，都有自己的资本。江青明白，她需要资本。

如何表演呢，那就从本行开始吧。既然出身戏子，那就从戏开始吧。

戏和政治有某些相似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政治本身也是一种表演，一种高级表演。但是在现实中，戏和政治还是很难扯到一起，但是江青很幸运，生活在一个可以把戏和政治牵扯到一起的时代。

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每当国家强势，知识分子必然遭殃。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明代八股文、康乾时代的文字狱，莫不如此，只有盛唐时期好点。新中国诞生之初，也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反右派。也不能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不好，因为从古至今，政治体制都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而且长时间以来，占据主导地位 and 话语权的，依然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悲哀，非常值得分析，只是限于篇幅和题材，这里只能略过了。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乌鸦横飞。笔下有千言（都是抄来的），口中巨浪狂翻（都是唾沫），脑中又有面和水，而且常常摇头晃脑，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座右铭。凡是强势的政治领袖，都想清除这种烦人的声音。清除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扩大化，伤害到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如果说当初反右派是为了搞经济建设，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也就是经济建设失败之后，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几年间，中央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所谓四清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各显神通，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所谓的文化界呢，自然也不会落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戏和政治才能联系到一起，江青

的机会来了，她决定插手文化界。按照当时江青的身份，当演员已经不现实了，而且演员那点风光已经无法满足江青了。因此她决定重新自我定位，幕后操盘，也就是说要当文化界的旗手，方式就是搞样板戏。

六十年代在北京的江青已经不是三十年代那个为了一个电影角色争得头破血流的戏子了，已经升华了，升华为政治戏子。二十多年学到东西终于有机会使用了。在政治上，她那点手段算不了啥，在文化界已经足够使用。

什么是样板戏呢？所谓样板戏，简单一点说，就是官方戏剧。官方之前没有规定啥戏剧，后来要发展社会主义教育意义的作品。戏剧的内容要求以工农兵为主题，反应社会主义特色的戏。按照那个标准，鬼啊怪啊（惊悚悬疑类的）不能演的、才子佳人（肥皂泡沫类）不能演、王侯将相（古装剧）不能演、外国戏剧也不能演。动作片啊之类的当时还没有，按照这个标准，文艺节目统统下马了。

这样是不是太严格了一点？确实太严格了，然而和当时国情有关。大饥荒刚刚过完，国家满目疮痍，在毛泽东看来，这个时候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相当于吸食精神鸦片。中国是一个善于吸食精神鸦片的民族，每当困难时期，精神鸦片特别刺眼。比方说南朝靡靡之音，明末秦淮名妓，清末民国时代遍布天下的妓女。毛泽东决定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小四清）时，另一边就是要整顿一下文化界。这是有历史传统的，比方说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整顿了文化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江青才可能出来抓一下戏剧，才有机会成为文化旗手。江青同志为了所谓的革命事业，决定狠抓样板戏，干点事给那些男人看看。

江青抓到的第一个样板戏叫《李慧娘》。这出戏本是江青诸城老乡孟超编写的：一个权奸霸占了一个美女，美女爱上一个美男；权奸很生气，杀了美女，把美男给关押了；地狱判官同情美女鬼，法外开恩，准美女鬼还阳解救美男；最后正义得到伸张。

孟超编写剧本时，康生同志以老乡兼内行人的身份指出：这出戏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上演时，康生拼命鼓掌曰：“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同时观看的还有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当时有人质疑说，咱们社会主义新时代了，还摆弄这些老古董干嘛？廖沫沙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有鬼无害论》。

廖沫沙写到：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

有什么妨害呢？

这篇文章既没有惊世骇俗的观点，也没有批判啥，就是普通的一个评论。如果不是和政治挂钩，早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了。然而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份。一年之后，也就是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彭德怀写下《八万言书》，引出来所谓的翻案风。为了批判这股风气，长篇小说《刘志丹》成了反动派向党和国家进攻的新形势。江青一看机会来了，就选择《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为突破口，大加批判，也就是捞取政治资本。

然而江青同志当时还没有什么能量，文化部、中宣部等部门客客气气地招待她喝茶，然后摊开手表示爱莫能助。江青表示惆怅，很没面子。还好她有个好老乡，康生同志。康生当时任政治局补候委员，在庐山活跃一把之后，在七千人大会上嗅到了斗争的气息。在政治斗争上面，康生是不会失败的。于是他看准时机，来个一百八十度华丽大转身，狠狠地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同志有眼不识“鬼戏泛滥”。于是相关部门出台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接下来的情况就太俗套了，相关人士该写检讨的写检讨，该挨批斗的挨批斗。

在康生同志的配合之下，江青初尝胜利的快感。她决定乘胜出击，扩大胜利果实。随着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越来越大，政治风浪越来越高，江青的发挥空间越来越大。

自从江青重出江湖要干一番事业之后，文化界注定不太平。她抓住的第一个战果叫《红灯记》，怎么抓到手的呢？非常值得揣摩。早在大饥荒之前，江青就看过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但是那时候大家搞大跃进，没心思管文化界的事。等到六三年，江青渐渐活动开了，再次跑到上海去看《红灯记》，对林默涵（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说，这个剧不错，改编成京剧吧。因为沪剧的观众范围仅限于长三角地区，京剧可以面向全国。林部长也觉得不错，就找一个叫阿甲的导演改编。阿甲干得很不错，很快就搞好了，还请周恩来看了。周恩来一看也觉得不错。就在这个时候，要当旗手的江青出现了。

一九六三年的江青已经相当忙碌了，又是北京又是上海，又是开会又是批判的，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尽管如此，江青依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剧本重新修改，排练，把剧组上下折腾得不行。江青虽然演过话剧，在延安也是“一流”，但是到北京之后，在老京剧那里，“一流”的江青，重新回到“三流”的行列。但是此时没人敢告诉她，她的水平依然是三流的，所以她一直认为自己是一流的。这样一来，剧组难免有抵触。江青就去找周恩来，说剧组“不尊重”自己的意见等等，一直纠缠到五更。周恩来被她缠得不行，表示支持她。这样江青再一次“指导”。絮絮叨叨一大堆，比如某个角色某个声音应该怎么样、某一幕应该如何关门等等。为啥呢，因为编剧水平本来就很高了，江青挑不出来啥毛病来。为了表达自己的存在感，只能鸡蛋里挑骨头。

这一类苍蝇一般的意见，如果不是出自第一夫人之口，早就被赶出去了。江青非但没有被赶，她的这些意见还被当成指示加以落实。江青为啥这么干？她喜欢这个戏剧？她喜欢让人感到厌烦？或者说故意的？都不是！江青上过舞台，长期处于圈子的正中央，礼节啥的那是了如指掌。啥话该说，啥时候该说话，火候绝对到位。江青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想要流氓：把戏据为己有，当自己的政治资本！

因为那时的江青是有追求的：当年那个三流演员，因为身份变更，要当文化界的领袖、旗帜性人物。而且没有人敢告诉她真相，只能任她折腾。

江青成功了。后来很多人都说《红灯记》是江青搞出来的第一个样板戏。编导阿甲在文革中没有死掉，八十年代末后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感慨：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跟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然也。

接下来的两个战果是《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方式大同小异。江青在抓这些“战果”的时候，还会带点附加产品来展示个性。比方说《沙家浜》，本来改得好好的，江青同志非常热情，亲切地接待了剧组同志，对大家致以亲切问候，对主要演员进行亲切谈话。

特别是对一个叫赵燕侠的演员，特别亲热，亲自跑到后台跟人家唠嗑：“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等等。”翻译过来就是，我很喜欢你。赵燕侠自然受宠若惊。然而历史证明，江青看好的人，最后结局都不好。

为了表达对赵燕侠的特殊照顾，江青特地从上海沪剧中调来演员进行一对一辅导。可是人家赵燕侠是搞京剧的，不可能完全按照沪剧来。如果完全按照沪剧来，那还是京剧吗？

赵燕侠曰：“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江青一听这话，顿时表示很惆怅。好哇你个赵燕侠，竟然敢忤逆本人好意，你等着。

某日剧组彩排，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的衣服穿得少，第二天派人给赵燕侠送去了两件毛衣，说：“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一听这话自然云里雾里，借衣服而已嘛，怎么能和干净或脏联系在一起？但赵燕侠知道江青肯定不高兴。这一来更不敢穿了，就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的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立刻派人把毛衣要回来。

从此以后，赵燕侠的好日子到头了。先被点名批判，接着被赶下舞台，然而被教育（进牛棚），

角色也没了。这件事再次证明了老祖宗那句话——女人心，海底针，连报复起来都那么别致。其实江青这么干也不难分析。肯定是剧组有人站在专业的角度对第一夫人的改编意见不以为然。江青心中有气，决定考验一下剧中的主角。真想知道，如果赵燕侠把毛衣穿在身上，江青会怎么样？也许会哈哈一笑，表示赵燕侠对自己很崇拜？其实这并不重要了，剧本已经写好，赵燕侠必然要离开。

如果说赵燕侠命途多舛，还有惹了江青不开心的因素在里面，那么童祥苓就更无辜了。童祥苓主演《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绝对是一绝，形象逼真，活灵活现。凭借这个角色，童祥苓一炮而红，热度堪比几十年后赵薇主演的小燕子。

——但是两年之后，童祥苓突然从舞台上消失了。为啥会有这么诡异的事情呢？原来是想当年童祥苓的姐姐童芷苓曾经在戴笠的生日唱过堂会。戴笠已经死了，但是戴笠的小跟班沈醉还在，沈醉吃饱了不饿，写了本回忆录，回忆录里记录了堂会的事。好了，童芷苓成了特别的特务——文化特务，住到牛棚里，自然很伤心。童祥苓就写信安慰姐姐。这封信最后落到造反派手里。当红演员童祥苓就这样成了“文化特务”的安慰者，写了八十多分检讨之后依然过不了关，也就没了演戏的资格。

因为京剧版的《智取威虎山》很成功，要拍成电影。当年除了童祥苓又没人能演杨子荣。江青为了保证电影质量，再一次放童祥苓出山。演完电影版的《智取威虎山》之后，江青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要是看人家不爽，直接关起来就算了，何必强迫人家更换专业？

为难赵燕侠也好，强迫童祥苓转专业也好，原因雷同。江青同志要把戏剧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必须让主演走开。

不管怎么讲，江青树立了样板戏，有了政治资本。有了这些资本，她就往“旗手”的宝座上迈进一大步。成为旗手之后，就能对付敌人了。

然而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江青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她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弄几个样板戏出来，修理几个演员。江青出身寒微，乱世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来，最终走到领袖的身边，非常不容易。这段经历本身就证明了江青是个争强好胜之人，她的最终目的是在舞台上呼风唤雨，随心所欲地过日子。随着时间的转变，这个舞台逐渐发生了变化，在青岛，舞台就是话剧，混得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就去了上海；在上海，舞台就是电影，混得不爽，不能随心所欲，去了延安；在延安，舞台就是毛泽东的窑洞，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到了北京，舞台要面向全国，日子好多了，依然还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北京最重要的影响是政治。她要想达到、或者说接近随心所欲的境界，必须登上政治

舞台，去飞舞长袖。

她的最大资本就是丈夫毛泽东。毛泽东和江青法理上是夫妻关系。但毛泽东那样的男人有很多种身份，军事家、政治家、作家、诗人。任何一种身份都要浪费很多时间。开会、写稿子、和相关人士探讨诗词歌赋等等，而他本人又是个读书狂，真正和江青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少。到北京之后，江青见毛泽东都要提前通报秘书。从一个女人的角度讲，这对江青非常不公平，对于女人而言，家庭往往是第一位的。对江青而言，家庭中失去的，只能在事业上弥补。而当时恰好是大饥荒之后的那个不正常的世界，政治运动反复不停，给了江青登上舞台的机会。

伴随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越来越大，毛泽东发动政治运动的决心越来越坚决，拿下刘少奇的决心越来越大，江青一步一步登上政治舞台。尽管如此，江青登台并不容易。她首先需要跨过一个人。如果不是政治涡流极端汹涌，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不可调和，如果不是那个人一直坚定不移地站在刘少奇身边，那个人是江青无论如何都无法跨过的。他是谁呢？就是赫赫有名的彭真同志。

江青和彭真本来是八竿子够不着的。两人既没有老乡关系，也没有交情，甚至不是一代人。当江青跟随妈妈一起讨生活时，彭真已经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爱国去了。当江青在上海想当演员而不得，因为感情纠葛闹得满城风雨时，彭真正在为了爱国而坐牢。当江青在延安的毛泽东的窑洞里，小妇人一样对着往来者微笑时，彭真就时常在毛泽东的窑洞里进出。估计两人也没想到，若干年之后，两人会成为敌人。命运就如此诡异，原本互不相干的彭真和江青，在命运的安排下，以文化的名义，在政治风波中较量一番。

（六）彭真的历史功绩

中共历史上，有几个人在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是重要人物，建立功勋，参加过斗争，写过检讨；真正发挥能量的，则是在第二代领导的时候。除了邓小平之外，还有几个，比如陈云，比如彭真。陈云帮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彭真则在法制建设上建立不朽功勋。

现在回过头看文革之前的历史，总是非常惊讶于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我们不明白，那个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政治运动。运动怎么会一次比一次猛烈。要分析原因并不困难，最直白地说，就是缺少法律规范。

数千年以来，中国都是靠人治立于世间。翻开历史一看，全部都是圣人、贤人、明君、清官、忠臣、孝子等等。从上古时代的圣人，到中古时代的明君，通篇都是道德如何如何高尚。谁都不能

说道德不好，谁都不能说有德之人不好，问题是，道德是无法延续的。一个帝王非常贤德，并不能保证帝王的儿子非常贤德。所以整部历史就那么啰嗦一通，到头来还是人治、人治、人治……

中国人第二次智力爆炸的春秋时代，诞生了国人至今引以为豪的百家诸子。诸子之中，儒家讲自省自律、道家追求营造自身精神世界、墨家讲自我牺牲、法家讲法规建设，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那些条文对领导过于纵容，对普通人又过于苛刻。然而即使是法家，涉及整个法制世界时，依然同意有个人可以高高在上，凌驾于法律之上。秦始皇试图法家建国，遗憾的是用刑过于严厉，最终失败。继承者胡亥简直就是法律的畸形儿。

秦始皇之后，中国强势过，分裂过，欺负过别人，也被别人欺负过。然而有一种情况没有变，那就是——用人治理国家。人亡政息，王安石刚刚让位，他的改革就没了。张居正累到吐血，人走楼空，啥也没有。明孝宗朱佑樞拼了老命积攒人品，让明朝中兴，他的儿子朱厚照很快就把一切付之东流。这就是人治的缺点。

回顾中国的光辉历史，可以说法制是一个难以治愈的痛。欧洲能够复兴，得意于罗马法系的哺育。美国能够快速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得益于欧洲法制的熏陶。而中国，一切都得重来。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打天下那会，没心思搞法制建设。好不容易熬到抗美援朝结束，熬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第一部宪法和其它一些基本法律条文。

大家不禁要问，为啥不多弄一些法律出来？写法律条文不是包饺子，随便摆弄出来就可以了。要知道，法律是为了现实服务的。那些现实问题需要法律规则的约束，是需要有一个实践的过程的。也就是说，除了一些基本原则的东西需要保证（宪法）外，其它法律法规需要一步步完善。

遗憾的是，之后经济建设出了大问题，导致大饥荒的到来。因为大饥荒，又导致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原本就脆弱的法律基础砸个稀巴烂。大饥荒那么大的问题，表示之前的法律措施有巨大的漏洞。既然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解决，那就只有政治运动了。

等到文革结束那会，虽然有一些法律法规，但基本上等于零，一片空白。这个时候，彭真复出，主管政法系统，对法制建设做出卓越的贡献。彭真刚复出那会，负责两个大案子，就是江青案和林彪案。这两个案子大概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两个案子了。然而当时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没有法律依据。人抓了，要审判，却没有法律！

怎么办？那就制定法律呗。历史给了彭真一个书写历史的机会。在彭真的主持下，很快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不仅仅解决了两案的审理问题，同时解决了到目前为止，大家打官司的问题。

彭真的最大贡献，就是主持制定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就是一九八二年的宪法，也是迄今为止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一部法典。新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四部宪法，第一部宪法中的理念精神被打断了；七五诞生的第二部宪法，文革味道过于浓厚；七八年诞生的第三部宪法又过于简单。第四部宪法是以第一部宪法为基础修改的，承传的还是新中国刚建立时的那种精神。

——主管司法的彭真永垂不朽。

按照事业线划分，彭真的事业线是两头高，中间低。中间低，就是文革那会被打翻在地。被打翻在地那会，很大程度上是拜江青所赐。

（七）彭真遭遇江青

彭真，山西人，生于一九零二年。

籍贯，农民。

性格，坚韧、乐观。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彭真年幼家贫，小小年纪就得下地干活，果断反抗过恶霸地主的欺压。很晚才开始接受教育，直到十二岁才有机会念点私塾，子曰诗云到十七岁，刚刚进入小学就遇到五四运动。十七岁的小学生彭真，就带着大伙去宣传爱国思想。到了二十岁那年才进入中学。但有志不在学历高，中学生彭真想的不是日后就业问题，而是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就在那时，他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一九二三年，二十一岁的彭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参与创建了陕西省的共产党组织。

一九二三年，也算是党内老资格了。接下来国共第一次合作，共产党开始搞文斗，即领导工人运动。工运过程中，彭真并不是十分耀眼，但也是有声有色。大革命失败之后，彭真落入白区。白区工作，凶险异常。因为不仅有国民党当局要抓人，还会有叛徒出卖。如果被当局抓了，也就认了。被叛徒出卖，那绝对是双重打击。很不幸，彭真就是被叛徒给出卖了。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三号，二十七岁的彭真在天津被捕入狱。在随后的六年里，彭真在天津和北平的监狱里辗转。坐牢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性格坚韧的彭真硬是坐牢坐出好来了。

从这段经历来看，丝毫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终日奔波，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很少。那么他的那些理论知识、政法思想哪里来的？答曰监狱里。

彭真入狱之后，没有去悲伤哭泣，而是组成党支部，提要求，搞斗争。身为政治犯，随时都有可能当烈士。然而彭真他们不去考虑当烈士的问题，而是在没有成为烈士之前努力自我提升。无论到哪里，彭真都对狱方提要求：要看书，要看报。毕竟嘛，政治犯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文字是快餐。狱方不同意，他们就闹别扭，比方说绝食啊啥的。经过一番试探、交流、斗争，狱方点头：别闹了，答应。

当时北平那一带归张学良管。张学良相对开明一些，就说了：政治犯都喜欢闹事吗，关于闹事的书，比方说《水浒》、《三国演义》等书是禁书，绝对不可以看的，马克思主义这类的“洋书”没关系，可以看。对彭真而言，可谓天赐良机，有吃、有住、有时间看书，再不研究理论更待何时？六年之后，彭真的理论造诣飞速上升。

不能不佩服彭真的坚强和乐观，这种性格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有一番作为。

抗日战争前夕，彭真在刘少奇的斡旋下出狱，随后成为刘少奇最重要的助手。彭真和刘少奇的处境类似、经历类似，因此思考方式也非常接近。但是在每一个阶段，刘少奇的地位都要高彭真一些，从年龄到党龄、到白区工作成绩、到党内地位，刘少奇都是彭真的领导。但彭真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刘少奇不少。彭真也是刘少奇最为信任的人，刘少奇的理论水平一流，彭真也不错。在刘少奇写《共产党人的修养》那本书时，彭真也写了一份纲领，在那份纲领里明确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让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个观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当时正在延安整风的前夜，如何对待马列主义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

原滋原味的马列主义，意味着王明和国际派继续占领理论的制高点。

让马列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翻身当老大。

彭真一直在中国，闹革命蹲监狱都在中国，可以说是一边行走在刀刃上一边吸取理论知识，没有接受过纯粹的理论训练。因此他支持本土派是必然的。正因如此，在延安整风时代，优秀的本土派理论家彭真同志大出风头，同时得罪了不少人。这正是日后彭真反复不停地给人家“赔不是”的原因。

彭真是不完美的，他的缺点就是：虽然生在战争年代，但战争经验不足。

国共谈判那会，暗地里抢夺东北。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刘少奇留守延安。那时候，东北一把手就是彭真。然而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彭真暴露了自身的缺陷——不是一个伟大的统帅。确切地说，不能说彭真有缺陷，只能说当时就东北的局势而言，对一把手的军事素养的要求太高了。而彭

真虽然生在乱世，但很少战场考验。当红军将士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百炼成钢时，彭真在坐牢，修炼马克思理论，错过了磨练战争技艺的最佳时机。凡是经过井冈山和长征的人，即使搞政工或参谋，战争本领都不低，比方说聂荣臻、比方说罗荣桓、比方说叶剑英、比方说邓小平都是久经考验。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战场能人在前线和鬼子周旋，而彭真在中央党校工作，在后方搞工作。所以东北一把手彭真，并没有应付战争的经验。当时东北，表面上两党还在谈啊谈，实际上已经子弹上膛了。某种意义上讲，东北局势的转变，就是由彭真让位林彪开始的。没有办法，林彪的特长就是打仗。而战场上的彭真并不高明，至少和林彪差很远。他的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的特点是整合战争资源。

那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别人在打仗，彭真在干嘛呢？答曰在建设。战争本是一场破坏，最大限度地去打去砸，不打不砸就没法消灭敌人。打砸的同时需要成本，也就是所谓的资源。共产党那会控制的资源有限，但是在战场上却是纵横捭阖、应对自如。之所以如此，只因为后方搞得好。后方有哪些工作呢？就是土地改革、党政建设、金融建设。这些工作可是后勤保障啊。根据地别的没有，只有土地资源。土地政策搞不好，一切白搭。根据地的物质不多，正因为物质不多，分配不好就会出乱子。想当年刘邦和朱元璋赢得天下分封功臣之时，分别取了搞后勤的萧何和李善长为第一，虽有抑武扬文的考虑，却也表明后勤工作者的重要性。至于党政建设，那是未来国家政权的雏形。

所以在第二代搞改革开放时，彭真和陈云发挥重要作用是有历史渊源的。其实在建国之初，第一代领导集体时，他们也有过发挥的空间，只是当时毛泽东、刘少奇等重量级人物还在，彭真、陈云等人的角色只是从旁协助，发挥空间小一点而已。

建国之初，彭真干过这些工作：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如果说这些头衔比较虚，那么好吧，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书记，且兼任北京市市长。主政北京那会，彭真干了很多事，城市规划问题，比方说设计天安门广场什么的。那么彭真怎么就和热衷于当文化旗手的江青联系到一块了？答曰，宿命。

由于彭真要管北京那一块，需要干很多事。干事情，首先需要知识和人才。新中国非常缺乏知识和人才，需要自己培养。要培养人才就要造势，所以身为中央委员兼北京市首席公务员的彭真就去高校演讲鼓劲：同学们，你们要好好干，祖国和人民需要你们，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等等。这样一来二去，长此以往，彭真在科技界、文化界就很吃香。然而当时的政治风波时不时来一阵。一阵政治风浪，就有人成为右派。文化界历来都是右派的生产基地。一旦被打成右派，要么失去工作机会，要么就夹着尾巴在胆战心惊中工作。这样一来，人才和知识分子就会减少、就会影响建设。没了人才和知识分子，彭真的工作也不好干。所以他就想把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

问题区别开。

所以当江青试图搞文化运动时，彭真坚决反对。某种意义上讲，这不是江青和彭真的矛盾，而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只不过是通过彭真和江青表现出来而已。

在大饥荒总结大会——七千人大会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蓬勃兴起，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等到一九六四年，两人的矛盾已经很严重了。那一年的五、六月份，毛泽东提议中央设立一个小组，代表中央管理文化界，负责领导文化方面的工作。找谁挂帅（负责）呢？很明显应该是彭真。因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汇集各种人才，而彭真是北京第一公务员，对自己管辖的一亩三分地非常熟悉；而且彭真是政治局的，级别也够。

好吧，那就彭真为主帅吧。有了主帅还要有副帅，副帅为陆定一，他是宣传部长，合适。再加上老狐狸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一共五个人，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其他人是组员。五个人中，康生能揣摩毛泽东的意思，铁定唯毛泽东之意行事；彭真和陆定一倾向赞同刘少奇的主张。

这个机构一成立，命运就把彭真和江青联系在一起。江青大搞特搞的样板戏，理论上也属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管。

在小组没有成立之前，江青就和彭真杠上了。在江青找人批判廖沫沙时已经杠上了，廖沫沙和吴晗一样，是北京市委的人。主管市委的彭真认为不应该批判。因为彭真是北京地区的负责人，在那个物质、技术、人才均匮乏的年代，江青想干点啥必须要彭真帮忙。江青搞样板戏，就离不开彭真，因为京剧那一块需要北京市委协调。

江青的主要战功之一，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沙家浜》就是从北京市委，或者说彭真的手上夺去的。《芦荡火种》原本改编为《地下联络员》，都排练得差不多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说这出戏排得怎样怎样不行，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毕竟是第一夫人，彭真决定给个面子，就把几个主要演员找到家里开会，说服他们给观众退票道歉。

然而江青的真正目的不是要点面子，是要把这个戏给抓到手。江青要去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又从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的演员作观摩演出，还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这个太霸道了。要知道江青当时的身份虽然是第一夫人，但也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法理上讲，第一夫人受人尊重，但并没有法律效力。她这样把京剧团抓到手，相当于从彭真

手里夺资源。

彭真不高兴，也没辙，再次让了一步，就让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两场演示演示。这两场太少了，根本填不了江青的胃口。江青认为很没面子。女人认为没面子的时候，后果往往很吵闹，特别是有权有势的女人。江青就到处吵，和演员吵（演员没有招惹她），和文化局吵，最后吵到彭真家里。据当事人张道一回忆：江青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

很明显，她再一次取得胜利。照例，取得胜利的江青需要进一步扩大战果，再一次提出要求：一，把工人俱乐部作为江青的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二，为了把“试验田”搞好，江青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去搞“试验田”。那些演员还有其它戏在身，抽走后别的戏就没法演了。这一举动遭到演员、剧组、文化局的一致抗议。江青再一次去彭真家，找彭真吵架。彭真已经被逼到墙角，没有退路了，只好把江青给顶回去。江青没辙，只好气呼呼走了。抛开背景不谈，凭实力，不论是谋略还是手段，没有经过大阵仗的江青和久经考验的彭真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凭职位，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江青啥都不是。如果她不是毛泽东的夫人，和彭真讲话的资格都没有。毛泽东如果不是想要发动更高一级的政治运动，也不会把江青放出来败坏人品。

如果仅仅是和彭真交手也就算了，彭真大不了憋屈一点也就过去了。大风大浪都过了，忍一时风平浪静的度量彭真还是有的。然而江青的举动让很多人不爽。在京剧演员看来，把沪剧团调到北京给京剧团做示范，简直就是胡闹嘛。要知道剧种和军队不一样，调八路军和新四军做示范，或者反过来都有助于提高战斗力。两个剧种根本就是两种风格，两个体系，硬要融为一体，只能是四不像，演员肯定有情绪。再加上江青管太多，怨言是难免的。因为彭真负责时只管理政治，艺术上属于剧团的自留地，归导演和演员自己协商。而江青同志要插手艺术，让艺术家们情何以堪？前面提到过的赵燕侠毛衣事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江青修理演员们，还有一个意图，就是要给彭真难看。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在彭真的领导下工作。

江青为啥这么干呢？她就是要打破传统方程式，要大改大干，干点不一样的。为了破陈出新，主张把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在地。江青能搞出这些名堂，倒不是因为她本人有多么高明，对艺术见解多么深刻。就艺术方面而言，江青是一个合格的话剧演员，仅此而已。让她对艺术理论给出贡献，那绝对是为难她。说到底，她就是一个小学毕业生而已，小学毕业后的精力并没用在艺术追求上，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追求艺术。她的主张，实际上是把长期以来在毛泽东身边学到的政

治斗争方式生搬硬套到艺术上而已。

对于江青在艺术上的高论，彭真当然不赞同，明确表示：“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江青觉得很受伤。不仅如此，北京市委开始对她进行冷处理。市委书记彭真不理她，市委副书记刘仁也不理她了。一开始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全程陪第一夫人看戏。本来这是一个拉关系的好机会，但是邓拓本人是个艺术家，并非善于搞逢迎拍马屁的人，看不惯江青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就头疼了，不陪了。江青表示感到很惆怅。

好吧，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北京市委，你们等着。

江青去了上海。上海有一尊大神在等着她。

（八）一尊大神

柯庆施，安徽人，生于一九零二年，和彭真同年。

职业：政治家。

性格：沉稳有余。

绰号：毛泽东的好学生。

早年满腔热血，投身爱国斗争，学业中断，继续爱国，受到老一辈的赞赏，得到继续求学的机会。一九二二年，年仅二十岁的柯庆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党内老资格之一。柯庆施去苏联进修，和伟大的列宁握过手，倾听过列宁的教诲。正因如此，党内尊称为“柯老”。毛泽东就一直这么称呼他。

如果按照当年的情况，柯庆施应该是国际派的，事实上他确实和王明的关系不错。延安整风那会，国际派完蛋，柯庆施也跟着遭殃。柯庆施之所以遭殃，是因为他没有揭露王明。他本是最有资格揭露王明的人之一。柯庆施因此成了康生盘子里的菜，老婆被逼投井。毛泽东出手相救，终于幸免于难。有感于毛泽东的救命之恩，此后以毛泽东的学生自居。

建国之后，柯庆施从南京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委书记，再到上海老大。华东本是饶漱石的天下。可惜饶漱石打错了算盘，最终身败名裂。此后陈毅短暂主持过华东一段时间。一九五四年，柯庆施从江苏调往上海，接替陈毅的工作。此后十年，柯庆施坐镇上海，为全国最重要的封疆大吏之一。

这位封疆大吏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追随者，开始对毛泽东进行吹捧曰：相信毛主席到迷信程度。此时林彪和康生还没有鼓吹个人崇拜。正因如此，柯庆施成为大跃进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文章当面对反冒进的周恩来说：“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周恩来检讨。柯庆施也成了一时风云人物。大会结束后，大跃进的弄潮儿们，如李井泉、柯庆施成为政治局委员。街坊间甚至传闻：柯庆施将取代周恩来当总理。

新中国建立之后，有两个人的运气最好。一个是当年主政东北的高岗，借助日本人留下的工业基础和苏联人的援助，把东北搞得有声有色，以至于毛泽东让高岗进京和刘少奇、周恩来三足鼎立。另一个就是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了。

大跃进的恶果席卷全国。柯庆施却没有受到影响，因为他的地盘是上海，属于全国需要重点照顾的地区。全国人民闹饥荒，还要咬牙往京沪地区调粮。如果不是调粮太多，四川饥荒也不会那么严重。所以尽管全国都在饥荒死人，上海没有饥荒死人。

可以说坐镇上海的柯庆施就非常走运，庐山会议上张牙舞爪的李井泉等人在大饥荒之后，在七千人大会上已经灰溜溜的；同样张牙舞爪的柯庆施在大饥荒之后依然洋洋得意。因为他的位置好，没有捅娄子。而且在大饥荒期间，上海的工业还有所发展。

七千人大会上，下至县委书记，上至周恩来、刘少奇、甚至毛泽东都在自我检讨的时候，柯庆施就不需要，真是太走运了。正因如此，柯庆施在上海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和北京的彭真不一样，盘踞上海的柯庆施是紧紧跟随毛泽东的。所以等到江青去上海时，好吃好喝好住不说，贵为上海一把手，亲自陪同，要人给人，要资源给资源。

江青和柯庆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初期，那时江青刚刚到延安，还没有成为毛泽东夫人，正千方百计恢复组织关系然后进入中央党校；那时柯庆施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学生，只是在中央党校内任职，算江青的老师；那时候延安整风还没有开始，他们的关系并不深。

从个人恩怨上讲，柯庆施最大的仇人是康生，但是柯庆施生前没有找到报复康生的机会。同时柯庆施对延安整风比较风光的刘少奇和彭真则怨恨颇深，而且得到了报复彭真和刘少奇的机会。所以当江青到上海搬兵，柯庆施心里乐开了花。

好吧彭真，你们北京顶出来的人，我们上海供着。

（九）礼物

一九三七年，江青离开上海时心情很不爽。唐纳的自杀闹得满城风雨，使得她的人气跌到低谷，加上中日战争爆发，明星梦碎了，甚至可以说是灰溜溜地离开，而且一别就是十几年。人虽然离开了，但心还在。和所有爱折腾的女人一样，她一直喜欢大上海的热闹和繁华。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时曾经豪情满怀：我会回来的。如果能预知未来，估计江青也会来这么一句，因为她确实回来了。

离开时，步履匆匆；归来时，风风光光。离开时，整个上海滩，没人愿意给她一个角色圆梦；归来时，所有角色都要仰望于她。那些曾经排挤过她的人，那些曾经鄙视过她的人，那些对她视而不见的人，你们都颤抖吧。

其实解放之后，江青回过上海。但那时她主要是治病，相对低调。六三年代，江青身份不同了，一次次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行踪却极为隐蔽，仿佛身负特殊使命，并且有一个特殊的代号，叫女客人。隐蔽和低调不同。低调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人鸟你，不低调也不行啊。隐蔽就不同了，虽然行踪不外泄，依然可以风光无限，可以高高在上。

江青隐居在上海时，就住在锦江饭店里。锦江饭店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宾馆之一，内设总统套房，曾经下榻过上百个国家元首。二十多年前，在上海滩颇有名气的蓝屏也只能住公寓。现在她可以在锦江饭店常住，步行数百公尺就到淮海路。马路对面就是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大花园，是权贵之人放松、休闲、娱乐、养生的好去处。江青对此很满意。

在锦江饭店的内部，不仅设施周全，还有事业可干。江青的事业是要登上政治舞台。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长袖起舞，途径只有两条，一是抬高自己，二是打击别人。所谓抬高自己，就是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所谓打击别人，就是批判揭发。学到一些政治手腕的江青也遵循着两条路：通过样板戏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自己，这个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接下来就是要打击别人了，就要写批判文章。

以江青的身份，如果捞点政治资本，没有问题，毕竟大家不看僧面看佛面，面子还是要给的。比方说搞样板戏，彭真虽然不爽，也是一让再让。但是搞批判就不同了，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搞批判相当于砸人家的饭碗。不管你是谁，砸人家的饭碗人家就要跟你急。而且以江青的地位和性情，她要砸的不是一个人的饭碗，而是很多人的饭碗，那些人都不是平头老百姓，都是有靠山、有名气、甚至有权势的人；而且他们不是孤立的，彼此盘根错节。一不小心就砸出乱子来。当江青想在北京砸人家饭碗时，就被硬生生给顶了，很没面子。为了能做到精确打击，背后必须有人支持，必须精心策划、保密行动、突然袭击。

背后支持江青同志的，当然就是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同志。当江青需要沪剧团进京，给。当江

青需要批判文章的行家，给。柯庆施给了江青很多礼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礼物是一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张春桥同志。

（十）道统，承传

康生把张春桥带给江青。

张春桥是什么人呢？按照历史定位，他是四人帮的主要成员，政治犯。也就是说干了很多坏事，坑了很多人的，事实上这个评价基本靠谱。

许多人又根据这个评价认为张春桥同志乃十恶不赦之人。

然而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干坏事和坏人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因为时势会转变，好事可能变成坏事，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比方说现在看起来腐朽不堪的八股文，当年看起来绝对是好事。比方说现在被否定的大跃进和文革，当年可是一致肯定的。即使内心不赞同，也举手表决了。

张春桥也是一样，抛开那些事的政治立场不谈，你会发现，其实他并非恶人，尽管他干了很多事看起来很过分。

张春桥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人。如果把前面加上一个修饰，那就是书生，或者理论家。张春桥是一个立场坚定的书生或者理论家。他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甚至在诞生之前，就有一帮经历简单的书生或者说理论家。他们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斯斯文文，透过这层表皮就会发现他们非常地热血、坚定。骨子里都是一根筋，认为真理在手，倔得不能再倔；行事风格都是，左青龙右白虎真理在心间；认准的事一股脑走到黑。远的一点，像搞变法的戊戌六君子啊，明知断头流血还要断头流血。这倒不是对他们否定，而是认为这是他们对自己选择的负责。近的一点，如早期的共产党人，明知革命是断头流血的事情，还要去搞，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真理在手。那时候中国虽然贫穷落后，像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并不缺吃少穿。他们还是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只因为他们认定真理在手。

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立场坚定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如此，瞿秋白如此，张闻天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一个类型的人，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首先是立场坚定的书生。由于生存环境艰难，共产党内左倾事件远远多于右倾事件。比方说历次肃反，比方说历次整风事件，都有一帮立场坚定的书生。比方说清华高材生朱理治同志，去了陕北之后，凭借听说和感觉，就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

抓起来，等候处决。

把历次左倾事件连起来，连成一条线：肃反→整风→大跃进→文革。

在这条线上能发现，这一连串左倾事件中，理论鼓吹者都是书生或者说理论家。苏区肃反时代，主要理论者是国际派，代表人物是王明身边的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清一色的由中国出口苏联再转内销，比方说那位姓夏的好同志。延安整风，理论鼓吹者变成本土派，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等人。等到大跃进的时候，那就多了，其中张春桥的伯乐，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这一次，轮到张春桥出场。张春桥继承了左派的光辉传统，去斗争、去批判、去取代之前的左派、如今的保守派们。

张春桥，左派的承传者。

在这条线里还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历次运动中的左派，过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保守派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比方说早期的国际派后来就成了保守派。新兴的左派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变成右派，比方说刘少奇和彭真，从当年积极进取的左派变得更为理性成熟。他们又要面对新兴的左派，那就是以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为代表的文革派。这个规律也符合兴衰代谢，但是如此从左到右的转变，左派取代右派的方式是斗争，毕竟是不正常的。

（十一）张春桥同志

张春桥，男，一九一七年生于山东巨野，六十四年后被判死缓，八十八年后死于癌症。他曾是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第一书记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达官贵人，同时也曾是反革命集团首领、死刑犯这些世人难以企及的反面人物。可以说张春桥同志是建国之后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

职业：政治家，理论家，或者说思想家也可以。为了全面起见，应该再加两家：文学家和书法家。由此可以看出，张春桥是一个多才的人。当一个有才之人迈入才能之外的领域时，通常就会产生另外一个现象。比方说康生同志。论才能，在那个年代，罕有堪与匹敌者。然而看一个人，除了看他的成功和失败之外，还应该深入到他的性格中间，从性格之中理顺其兴衰纹路，考察人生之得失。正因如此，张春桥和康生是不同的。

性格：精明坚定。

这是一组矛盾的性格。一般而言，精明之人很难坚定，如康生同志，整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人之后，依然在生前高高在上，因为精明过了头，临死之前出卖左派，所以只能是投机倒把之

辈；立场坚定的人，缺乏精明的手腕，比如说国际派那帮知识分子，如瞿秋白，坦然而死，没死之前却疲惫不堪（参照《多余的话》）。张春桥则是个例外，既精明又立场坚定。现在就来看看张春桥的精明，还有他的坚定。

张春桥这个人，如果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能找到很多缺点。

首先，他的出身不好，出生在官宦之家，祖辈是地主，父亲给国民党效命。共产党内，有这种身份的人不多，他们有一个身份，叫做官僚买办集团。一般而言，拥有这种身份的人，在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难以幸免的。比方说陆定一同志，就被抄家好几遍。张春桥因为身份独特，漏掉了。

年轻时代的张春桥干过齷齪事。一九三二年到三四年，张春桥在济南念中学，据说为国民党当局干过事，也就是所谓的特务，而且导致几个激进的年轻人被捕丧命。这事成了张春桥的人生污点之一。但不能就此认定张春桥就是叛徒，这事值得商榷。当年国民党属于正统，到处通缉共产党。当时张春桥也就十六、七岁，也就是为国民党当局提供一些情报而已。指望一个十六七岁出生在官宦世家的年轻人看清未来，认清大是大非的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张春桥当时不是共产党，谈不上叛徒之说，也不能认为是所谓的特务。

当时张春桥的身份是富二代、官二代，是少爷，有吃有穿有玩，认为世道还不错，没必要推翻。在当时的张少爷眼中，所谓革命党、进步人士，都是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坏分子，应该举报。非但如此，张春桥还伙同其他认为世道还不错的人士办了份杂志，写文章拥护当局，因为他们认为革命分子都是搞破坏。

我们现代人能理解这些问题，但是在当年确实属于重大污点。

后来张春桥去了上海滩，靠笔杆子混日子。日子混得不怎么样，却落下一段公案。这段公案其实也没啥。就是一个年轻作家得到文坛领袖的提携出名了，另一个年轻人看着不爽，说风凉话。说风凉话不要紧，问题是匿名的。就好比现在的网络世界，为了便于骂人或者泼脏水，一个人穿好几个马甲。不敢以真面目发言，不论任何时候都要被鄙视的。

这个年轻作家是萧军，文坛领袖是鲁迅，而这个说风凉话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混得不咋样的文人张春桥。张春桥为啥要说风凉话呢，理念不同嘛。因为当时年轻的张春桥的思想还在拥护当局，而鲁迅和萧军都是当局的破坏者，所以张春桥自然很不爽。由于当时当局的口碑不怎么样，鲁迅鼎鼎大名，所以张春桥选择了懦弱的姿态——用马甲骂人。

解放之后，鲁迅的地位非常地高，萧军也被认为是左派作家的代言人。随着政治运动的兴起，鲁迅也有被神化的趋向。那么站在鲁迅对立面的、本就理屈的张春桥当然就是反面角色。又因为张春桥在政治运动中崛起，自然惹得很多人不爽。文革之后，这事也成了张春桥的污点。

什么出身啊、早期有过不当行为啊并不致命，张春桥真正致命的弱点在他老婆身上。

张春桥的夫人叫李淑芳，生于一九一六年，大张春桥一岁。两个人的成长经历非常有意思，李淑芳和张春桥一样，出身于富贵人家；和张春桥不一样的是，出身富贵人家的李小姐思想比较激进，参加革命很早，张少爷早年的思想倾向于国民党当局。因为参加革命事业，危险系数比较大，用过很多笔名，后来最有名的一个叫文静，原名李淑芳反而不怎么为人知晓，就像很少有人知道江青的原名叫李云鹤一样。等到后来张春桥由保守派转变为革命者时，文静反而脱离了组织关系。抗战时代，文静去了根据地，在那里遇见了张春桥。

一九四三年，二十六岁的张春桥在晋察冀遇见了二十七岁的文静。在国难当头、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两个人出身相似、经历相似、年龄相仿、生活品味相当的年轻人相爱了，以一见钟情的方式。这本是一件好事。

然而命运老人接下来戏弄了他们一下：鬼子进村，年轻的知识女青年文静被捕了。

日本人都有双重性格：菊与刀，菊的一面和刀的一面。一面礼貌文明，另一面粗暴野蛮。当时的鬼子恰好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强悍野蛮的雄性群体之一。一个年轻有素养的女人沦为那帮人的俘虏，只有两个选择：被蹂躏；老实合作，有不被蹂躏的可能。

按照爱国主义剧情，文静应该学习赵一曼，宁死不屈。赵一曼固然伟大，并不是每一个女人都能承受那么多磨难。文静选择和鬼子合作，也就是当了叛徒。不仅当了叛徒，出卖了自己的过去，而且还进入了日军的“宣传班”，担任班长，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写材料骂自家的同胞，背叛自己的未来。比起这些情节，叶群和江青那点老底已经非常健康了。

然而历史再度跟文静开了一个玩笑：尽管她出卖了自己的一切，最终却什么也没得到，因为鬼子投降了，她还得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当中国人，还得面对那些不管有意无意毕竟辱骂过、诅咒过、出卖过的同胞。她再一次感到孤单，只能寄希望于曾经的丈夫张春桥。此前他们虽然有过十个月的恋情，却当了两年的敌人。

在文静的问题上，张春桥第一次展现出性格中的另一面——坚定。

此前的张春桥，从给国民党当局当特务到上海滩文人生涯，更多表现为精明，甚至投机取巧。在和文静结合的问题上，张春桥也是相当精明的。要知道当时根据地女性极为匮乏，像文静那种有知识有修养的女人就更匮乏了。张春桥当时的地位不高，能和文静恋爱，套用一句俗话，那叫前世修来的福分。然而在文静叛变之后，形势逆转了。不论任何时候，叛徒总是不受待见的，就算是美女也比臭狗屎强不了多少。如果张春桥不理睬文静，没有人会责怪他薄情寡义。如果他把文静交给组织，还能混一个大义灭亲的美名。然而张春桥重新接纳了文静。为啥这么做？可以解释为贪恋女人等等。更为靠谱的解释应该是，张春桥和文静相恋的那十个月里，文静给张春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为了那种美好的回忆延续下去，张春桥出手搭救文静，冒着前途歇菜的风险。不仅如此，两人还在两年之后结婚了。

如果说张春桥在对待感情上是坚定的，那么接下来在处理这件事上又是精明的。他平白无故地接纳了当了国家叛徒的老婆，却没有坦白情况，促使文静忏悔，赢得国人原谅；而是试图修改简历，蒙混过关。四五年，张春桥帮助文静填简历时，说她的组织问题正在解决中；等到四七年，两人结婚时，把文静的被捕叛变写成被捕出逃；又过两年，全国解放，已经不再提被捕的事了。文静这事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当时很多人都有过被捕的经历，甚至被捕变节的经历。这也是每一次运动，总是彻查某人过去的原因。要评价过往事件的功过是非，必须考虑这些细节。那年代毕竟不像现在这样，都是中国人。因为确实有人曾经是特务、曾经变节过，出卖过国家民族之后又隐藏起来。

尽管如此，文静的事依然成了张春桥的一块心病。特别是他的地位越来越高时，心病越来越重。在那个道德大棒飞舞的年代，张春桥面临着事业的抉择。所以他几次三番要离婚——并不是另结新欢，实在是情势所逼。对于精明的张春桥而言，还有比感情更重要的事么。有，当然有。是什么，后面再讲。在对待老婆这事上，看出了张春桥的精明和坚定，这两种性格一直贯穿他的一生。

（十二）张春桥的转变

张春桥本是富家子弟，立场倾向于国民党当局，最后怎么变成共产党左派的代表人物了？还是老话题了，局势使然——日本人来了。有权有钱的公子哥，原本衣食无忧，要吃糖有糖吃、要喝蜜有蜜喝，时不时对着贫困交加的同胞炫个富啥的，那个时候当然要力挺国民党当局，因为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国人面对困境苦苦挣扎，他张家则很幸福，因此他要力挺当局。可是凶悍的日本人不仅敲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根基，同时也砸碎了许多权贵赖以生存、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

所谓权贵，也就是在现有体制下多占点社会资源，并非高人一等。

所谓权贵心中那点自豪感，也就是对多占一点社会资源的自我陶醉。

能认识到这些的权贵生活比较低调，人品也不错；认识不到这些的，通常就比较跋扈，自以为很了不起。要认识到这些的途径有两种：第一种是生活经验和人生阅历的积累，年轻人通常缺乏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所以各种年轻的二代才比较让人厌烦；另一种方式就是外来因素的强势介入。张春桥少爷遇到的就是后一种。在鬼子的强势介入下，他发现他爷爷的财富，他爹爹的权利，乃至他忠心的国民党当局是如此的脆弱、如此的不堪一击。

和同样出身地主的康生不一样——那时候康生家已经破落了，所以很早就去了干革命，和家大业大的黄敬也不一样——黄敬是理想主义者，张春桥的转变是被逼迫的。尽管被逼迫，张春桥的转变却是彻彻底底的，不留余地的，以至于到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转过来。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直。年轻的张春桥发现，原来人生要靠自己。那就靠自己吧。于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时候，二十岁的张春桥成了中国共产党员——一个他曾经仇视过的组织的一员。接下来去了延安。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日本进攻中国那会，不少年轻人去了延安。张公子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人还有，比方说电影明星江青，比方说知识分子叶群，都是被鬼子赶到延安的。这些人大多出生在一九一零年到二零年之间，二十岁左右，五四浪潮时还不怎么懂事，又没有赶上投身革命的黄金时期，建国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才开始慢慢崭露头角，文革时风生水起，在五十岁左右时成为所谓的少壮派。

以知识分子身份加入共产党的张春桥一直在搞宣传工作。四九年随解放军进入上海，此后一直在上海干新闻工作。那时候比张春桥级别高、资格老的同志太多太多，他想要辉煌腾达并不容易。不容易不代表不可能。张春桥就做到了，原因有两点：个人素质和客观局势。

个人素质：长久在敌后工作，练就沉稳的性格；原本知识分子出身，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架轻路熟，加上他从事宣传工作，有时间并且需要专研理论方面的东西；长期的宣传工作，练就了一套说话写文章的本领。在上海新闻界的张春桥有如此优点：性格沉稳；办事干练；说话写文章滔滔不绝，而且婉婉流转、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总之是人才一个。这样的人才，自然要受领导关注。关注他的领导就是柯庆施同志，但光有柯庆施的赏识还不足以一飞冲天。

客观局势：反反冒进和反右派之后，知识分子开始沉默，极左派异常活跃。上海总老大一篇文章《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之后，作为柯庆施跟班马仔的张春桥也跟进写了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然而张春桥依然没有辉煌腾达，但是已经具备了条件，以柯庆施的心腹的身份等待机会。

等待中，大饥荒来了。等待中，上海避过了大饥荒。等待中，张春桥命中的第二个贵人出现了。

一九六四年，张春桥去了锦江饭店，见到急于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当时的江青虽然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但是在上海确实是宝贝。当时正处于大四清阶段，正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立场和矛盾扩大之时。一切都是不可预知的，而江青无疑是一条捷径，一条潜在的捷径。通过江青，柯庆施既可以继续当毛泽东的好学生，也可以报复刘少奇和彭真。通过江青，张春桥也隐约看到一条走向成功的阶梯。

当江青看见张春桥时心理直犯嘀咕：这人能帮忙吗？不会帮倒忙吧？

其实张春桥和江青在上海曾经见过面，当时是在山东老乡《火炬》主笔崔万秋家中。崔万秋是个很复杂的人，除了主编，还是半吊子作家，主业则是特务。崔家当时的宾客很多，还包括大特务沈醉等人。那时候江青还是不得志的电影明星蓝萍，张春桥还是不怎么得志的文人狄克。两人应该没有来往，因为两人在各自行业都不怎么得志。虽是老乡，却无法彼此帮助。而且各自心比天高，当时却是命比纸薄，看不见辉煌腾达的迹象。对两个雄心勃勃的人来讲，这样的关系比较鸡肋。所以常识中——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温情画面没有出现。因为温情是普通人的专属营养品，野心家需要的是看得见的利益。当时的江青正想尽一切办法从小明星变成大明星，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希望崔万秋写点文章捧一捧自己。张春桥正换马甲骂人积累人气，去崔老乡那里，不过是结交一些人，打发一点时间而已。

十八年过去，江青已经成为第一夫人，张春桥也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去见江青，把张春桥也带着，目的是让张春桥作为两个人之间的沟通桥梁。柯庆施虽然把江青看得很高，毕竟自己是上海地区的一把手，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不能扮演跟屁虫的角色；而且他很忙，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计谋需要算计，有人需要捧、有人需要打压；再则，也是一把年纪了，经不起上楼下楼的反复折腾。

一开始江青对张春桥不是很感冒。此时江青的地位已经非常高了，低头抬头所见都是大人物，任何人见了她都得给三分笑脸。就算把她顶出北京的彭真，见面也得客客气气的，给足面子。不是她江青有多牛，而是江青背后的那个身影过于高大。张春桥只是一个秘书，秘书不要紧，但看上去斯斯文文的，戴着个小眼镜，也不像有战斗力的样子，况且对京剧也不懂。

然而，张春桥很快用事实证明：江青同志，你错了，本人战斗力超强。

张春桥之前没有研究过戏剧，但是他充分发扬了五十年之后大学生应对考试的绝学——临时抱佛脚，搞突击。张春桥找来一大堆京剧方面的书籍，手里拿着馒头也在看，蹲在马桶上也在看，躺在被窝里也在看。短短时间内，张春桥同志凭借其过人的精明和才华，竟然成为一个“似是而非的

京剧专家”。虽然和真正的京剧专家尚有距离，但是江青同志在京剧方面的造诣也不高，两人可谓半斤八两。半路出家的张春桥已经可以帮助江青修改样板戏了，在这种旗鼓相当的交流中张春桥展示了自己真正的专业技能：写批判文章，也就是挥舞政治大棒。江青自然欣喜不已，还是柯老的人管用啊！

江青的策略就是一边搞样板戏抬高自己，另一手就是写批判文章打压对手。搞样板戏之类的游戏，还在江青的专业范围内，勉强能胜任；而且鉴于她的身份，搞出来的东西不管质量如何，总有人高度赞扬、拼命鼓掌。写批判文章就不一样了，那是向别人挥棍子，把别人搞臭，砸人家的饭碗。而且根据江青从政治舞台上搬来的那些斗争经验，还要横扫一大批。

在那一大批人之中，包括学富五车的正牌教授，包括兼职混过文坛的职业官僚，还包括文痞、混混、二百五等等，喷起口水来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把他们打到远远超出江青的能力范围。而且她的身份摆在那里，也不能直接上战场。因为她代表的不仅仅是她江青一个，还有身后那个伟大领袖。无论如何，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绝对不能惹上半点尘埃。

怎么办呢？需要枪手。

于是第一夫人在北京寻找枪手。然而北京是彭真的地盘，江青寻枪寻了老半天一无所获，郁闷不行。不得已，只好再次去上海请求柯老帮忙。柯庆施本来就对刘少奇、彭真恨得牙痒痒，天赐良机自然要抓住，二话不说答应下来。当然他还是不能亲自出马，就交给自己的心腹、有才的张春桥去办。作为伯乐，柯庆施了解手中这匹千里马的实力，他认为张春桥有实力把一切搞定。身为千里马的张春桥也知道自己可以完成任务，但是——要转折一下。

之前张春桥凡是接到柯庆施的差事，都是面如止水，心中暗喜，因为意味着伯乐的信任啊。欣喜之余则是一声不响地把事情给办了，办得合情合理，让柯庆施很放心。然而这一次，张春桥依然是面如止水，心中却是冷飕飕的。多年的官场经验告诉他，这一次非同小可，牵扯面太广，牵扯的人太多，很多人都是树大根深，弄不好是要遭殃掉脑袋的。虽然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同时也是陷阱。怎么办呢，如何能够既抓住机会又避开陷阱呢？这是个问题。

纠结郁闷之时，张春桥精明的脑袋里再次灵光闪现，何不如此这般呢？

在张春桥的头脑里进行了如下的算计和谋划：写这篇文章会得罪很多人，很可能没有好果子吃；如果不写，立马就没有好果子吃。所以文章一定要写，因为写文章而随之辉煌腾达的概率很高。如何利益最大化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文章写出来，但又不是出自自己的手笔。要办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找一个能写文章的。张春桥的手下恰好有一个人能胜任，此人有一个绰号，号称“棍子”，

即战斗力超强，动辄横扫一大片的那种。

此人姓姚，名文元，号称姚棍子。

在这个过程中，江青相当于业主发项目，柯庆施相当于承包商拿下项目，又把项目转发给张春桥，而张的角色相当于施工单位，他找来农民工姚文元负责干活。将来出了事，从上往下推，说这是临时工干的，已经被开除了。如果干成了，张春桥可以说姚文元是我的人，功劳是我的。在这件事上，张春桥可以说把精明发挥到极致。

（十三）政客姚文元

姚文元，生于 1931 年 12 月 11 号，死于 2005 年 12 月 23 号。

职业：政客、文人。

如果从文革左派中挑出一个政治家，那个人必定是张春桥。如果以张春桥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那么姚文元只能算政客。即使是政客，也不纯正，还有一部分属于文人。大家都称姚文元为棍子，却很少有人承认姚文元首先是个文人。

姚文元的妻子叫金英，死于一九九六年，葬在上海。当时姚文元刚刚出狱，葬礼非常低调。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低调下葬的人就是姚文元的妻子。墓碑上只有子女留下名字。墓碑背面刻有一首词——《蝶恋花》：

遥送忠魂回大地

真理真情

把我心涛寄

碑影悠悠日月里

此生永系长相忆

碧草沉沉水寂寂

漫漫辛酸

谁解其中意

不改初衷常历历

年年化作同心祭

叠词用得很棒，意境也不错，一位老人晚年丧妻、晚景凄凉、郁郁不得志的心情跃然纸上，颇有瞿秋白的《多余的话》里的那种寂寥。单从文学角度看，这绝对是一首好词，在所有“蝶恋花”词牌下的词中都堪称优秀。若干年之后，姚文元死，死后和妻子合葬。墓地前依然只有一个墓碑，墓碑上依然只有金英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大名鼎鼎的姚文元也葬在其中，这是效仿武则天立无字碑么？

常常想，如果姚文元不去写那些批判檄文，静下心来好好创作，一辈子应该收获颇丰吧？

自古才子如红颜，自古红颜多命薄。就姚文元来讲，命运待他并不薄，只是可惜了那一身才华。身为才子的王洪文是薄命的，身为政客的王洪文一点都不薄命，而是搏命。

如果说张春桥的历史老底不干净，后来能够平步青云是因为自身的精明和运气，那么姚文元更有趣了，因为他的条件比张春桥更差。在后来的四人帮中，按照当时的条件，政治成分最好的是王洪文，其次江青，姚文元排最后一名。

姚文元的政治成分差，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姚蓬子。

姚蓬子，浙江人，生于一八九一年，卒于一九六九年。姚蓬子生于书香门第，又是个作家，并和鲁迅有交往。鲁迅还写诗赠予姚蓬子，表示对他很看好。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也是作家的黄金时代。以姚蓬子的身世和身份，自然衣食无忧。然而那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相当热血，爱国骂政府的本事那是一流，而且还敢于实践，即加入激进的共产党，比方说郭沫若等人，姚蓬子也是其中一个。一九二七年，三十六岁的姚蓬子玩了一把激进，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入党的，如果坚持下来，前途都是不可限量。

然而事情出现了转折，国共分裂，国民党当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姚蓬子东躲西藏，坚持了六年，终于还是在天津被逮住了。如果此时姚蓬子能坚持几年，坚持到抗战到来，国共第二次合作出狱，那么姚文元的历史也将被改写。然而四十多岁的姚蓬子终于没有通过考验，入狱第二年，即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成为白色恐怖时代共产党脱党大军中的一员，也就是所谓的叛徒。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恶劣的案例。要知道文革时，砸碎的文官

系统，理由都是叛徒啊什么的。

解放之后的姚蓬子赋闲在家，常常遭受遗传了他热血和激情基因的儿子鄙视的眼神。但如果没有这个时不时冷眼以对的儿子，他老人家的日子将会相当难过。——若干年之后，同样进了监狱的姚文元，表现并不比他老爹更优秀。比方说姚蓬子原本在银行里存了一笔钱。文革开始之后，停课闹革命，姚蓬子的老婆到银行取款时，营业员风闻姚蓬子是叛徒，即打电话举报。按照文革的规矩，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冻结。姚蓬子的叛徒经历当然也在牛鬼蛇神之列，存款被冻结了。当时姚蓬子正生病，一家人没了开销。事情闹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家办公室”。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里下达了解冻姚蓬子存款的“指示”，姚蓬子总算不用挨饿。有这样一个叛徒经历老爹，姚文元心中有一个大大的疙瘩。

姚文元比老爹更热血。一九四八年全国解放前夕，年仅十七岁的姚文元加入中国共产党。年轻热血的姚文元没有赶上好时候，全国已经解放了。年轻的姚文元没有经历过战场上的考验，不懂得隐忍，全凭一腔热血，手里提着棍子横扫四方，仿佛要弥补他老爹的遗憾。在他的棍子下，什么丁玲、老舍、巴金都是浮云，一杆子全部打倒。这样一通乱棍，在江湖上打出了名头，赢得“姚棍子”的美称。

姚文元的棍子有多猛烈，他在上海写文章，不仅赢得张春桥的关注，甚至得到远在北京中南海的毛泽东的表扬——要知道那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家还在搞建设。现在要横扫一大批，在张春桥看来，姚文元再合适不过了。

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对他忽悠了一遍，大意也就是：老弟啊，现在有一票大买卖，虽然有点风险，但成功的概率非常大；成功之后咱们就成为人上人，就看老弟你了。姚文元也不是傻瓜，迅速核算了一下成本，觉得干了之后，好处多多。至于风险，自古以来就是富贵险中求嘛。如果不干的话，老爹那点破事被揭批，很可能前途玩完，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好吧，干！

——当年老爹没有一条路（跟着共产党）走到黑，留下终生遗憾。现在机会再次降临，一定要抓住，一定要在打倒右派中好好表现，争取在二次革命中立功。

于是，一篇重量级文章出炉了，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号，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篇文章也许是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一篇历史批判篇章，因为它是一条强有力的棍子。历史喜欢记载棍子，它不仅拉开文革的大幕，在江、张、姚传奇的一生中，也是标志性事件。

一九六五年，江青五十一岁，正是走向政治顶峰的前夜；张春桥四十八岁，姚文元三十四岁，都是龙门之前的鲤鱼，即将跳跃。在此之前，三个人只有那么一丁点联系，此后便站在同一辆战车上。也就是说那篇文章是一个契机，一个促成江、张、姚走到一起的契机。从此，中国政坛上新的革命派正式形成。

把以江青和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称为新革命派，或许有人觉得难以理解。需要把思绪的触角延伸一下。延伸一下就会发现，凡是灾难来临之时，左派就会登上历史舞台，革命也将随之而来。

清朝末年，华夏文明面临生死考验，国家积弱不堪，各路野兽跑过来捞点好处。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应运而生。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路线，然而他的路子很窄，因为他没有重新整合中国，甚至没有完全整合革命党人，军阀叛变从未间断。

蒋介石用务实的手段整合了孙中山留下的烂摊子。通过一系列拉拉扯扯，打打谈谈，搞出来一个形式上完整的国家。只可惜那个国家内部矛盾重重，阶级矛盾尖锐，公务员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悬殊。革命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是一个从革命到保守的过程。保守无所谓，解决民生问题搞不定，那就必然出现新的革命派。共产党成了革命派的代表。加上国外势力的强势介入，蒋介石终于付出惨痛代价。

在共产党内部也是一样。早期的共产党人均依附于共产国际，口号理论喊得震天响，却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直到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崛起，问题才算解决。建立新中国，中国重新崛起。新中国建立之后，大家努力搞建设，原本不应该再出现新的革命派了。然而灾难又来了。灾难就是大饥荒。

大饥荒催生出新的革命派，他们的革命对象则是之前的革命派，现在的当权派。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然而新的革命派和之前的革命派的命运注定不一样。因为当年孙中山面临的是腐朽不堪的清帝国，毛泽东面对的国民党当局已经腐败到骨头里。另外他们都有新的思想。新革命派不一样，没有新思想不说，干工作的能力跟他们要打倒的对手差很远。江青不过是依附在毛泽东那颗大树上的蚍蜉。至于张春桥，让他当总理能干出什么名堂？所以说，新革命派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没有前途。没有前途的革命派，能给历史留下的，只有破坏。

不仅在中国，在整个历史上都一样，极左派总会伴随灾难而诞生。所谓极左派，说白了就是更为激进一点。如果不是现实世界有问题，这派人不会有太大的市场。因为人嘛，如果日子还能过，宁愿吃过饭去打打牌、爬爬山、遛狗、逛街、约会等等，也不愿意去大喊大叫、喊打喊杀，那样很伤精神的。

现在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极左派借助毛泽东对现实的不满而登上历史的舞台，并试图成为舞台上的主演，序幕就是《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几个人包着这样一篇檄文走上政治舞台。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根粗大的棍子，又粗又大。

（十四）棍子

俗话说，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森林众多，棍子众多。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情形也差不多，也是森林覆盖，棍子众多。这些精神上的棍子的质量和持有者的脑袋挂钩，杀伤力和持有者的脑细胞活跃程度、性格坚韧度成正比，分为很多层次。要想在精神上拥有一根通杀四方的棍子，很不容易。有多么不容易呢，看一看就知道。

精神棍子，是从精神上攻击别人的。从质量上讲，最低档次的棍子就是泼妇骂街，家里丢了一只鸡或者说家庭生活不和谐，到处乱骂，用高音喇叭一般的声音配上污浊的词汇，活脱脱一个精神上的茅坑，臭味足以散发数百米。这种档次的精神攻击，虽然对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然而破坏力不大。一段时间之后便烟消云散，涛声依旧。

档次搞一点的，叫文痞。什么叫文痞呢，这些人是写文字的，确实在精神上 and 泼妇心有灵犀，写不出高水平的东西，只能把那些恶毒的言辞转化为肮脏的文字，高高兴兴地到处乱贴，用以彰显自身的高明，借此寻找存在感。心中只有白开水的，直接叫骂；心中有几滴墨水的，写一点露骨的讽刺。这种人虽然可恨，也有可爱的一面，那就是当他们的矛头偶尔正确地对准某位贪官或者奸商的时候，那是相当的可爱——只是这种时间很少。

文痞也是分档次的。如果心中的墨水多一点，那就是一个高级文痞。文痞之所以是文痞，原因在于虽然有知识但缺乏独立的人格，有见识却缺乏品味。所以说文痞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谩骂，另一个就是拍马屁。所谓高级文痞就是马屁精。所谓马屁精，就是那种并不表达自己观点，唯领导的意念是从。既可以通过轻描淡写的方式把领导描述为幽谷里的百合，也可以浓墨重彩，把领导写成怒放的玫瑰。在需要展示平和形象时，领导犹如从诺亚方舟里飞出来的和平鸽；需要力量时，领导就是高飞的雄鹰，而不管领导的本质是不是一只绵羊。一旦领导倒台，如果需要他们时又可以把曾经的领导变成过街老鼠，或者说一只可恶的蟑螂。

换句话说，高级文痞总是把目光锁定在权位上。能看穿这一点的领导，要么就干点实实在在的事留个好名声，实在能力有限，在位时会选择低调一点。而很多领导不一定能看出这一点，以为自己真的玉树临风、英勇无敌，以为骄横一点腐败一点也无损自己的形象，等到明白时已经晚了。所以说马屁也是一种棍子，打断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联系，打出了群众的领导的不满，打同了领导走

向灭亡的通道。

比文痞更高端的棍子则是另外一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张春桥和姚文元就属于这一种。从一种意识形态出发，全面扫荡其它形式的东西。由于长期宣传的关系，后人往往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是那种墙头草，这完全是误解。那样也太小看使用他们的毛泽东了。毛泽东看人，很少走眼。从两人的简历看，张春桥是日本人进攻中国那会加入共产党的；姚文元则是在全国解放时入党的。张春桥通过战争的考验，而姚文元可以算新中国第一代的热血年轻人，一贯写批判文章的。两人之所以称为棍子，只因为社会大潮的转向。

（十五）海瑞罢官

要弄清楚《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就要先弄清楚《海瑞罢官》是咋回事。事情还得从海瑞说起。海瑞是一个奇人，奇在哪里呢，就奇在遵循所谓的道德和法律操守上。这些要从海瑞生活的时代来看：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发达，GDP 什么的全球第一；对外战事不断，辽东塞外的蒙古人不消停，对日战争更是从浙江、福建一带延伸到朝鲜半岛，这些都是所谓的高光事件。与之对应的则是明帝国腐败遍地，无官不贪；奸商云集，贫富差距悬殊，而且官商勾结，掌控社会财富，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拜朱元璋所赐，明朝公务员的正规薪水待遇极低，但是领着极低薪水的各个官员却是家有豪宅，出门有轿子，还能娶好几个小老婆，闭着眼都知道明朝贪腐是一大奇观。就像现在某些官员，工资连给他的水电费、日常生活费都不够，却开豪车住豪宅，把子女送到欧美留学，不用调查也知道那些钱是哪来的。在那个谁都贪、谁都奸的时代，海瑞同志偏偏要遵纪守法——不贪不腐、不拉关系，不走后门，不拍上司马屁，就是只凭借两百年前朱元璋规定的那些死工资过日子。面对物价飞涨，海瑞只能吃青菜、豆腐啥的，只有逢年过节或者老母亲过生日才吃点肉，过着清教徒一样的生活，活脱脱的廉臣楷模啊。

海瑞一辈子干过最有名的事就是骂皇帝，说精明多疑想成神的嘉庆不务正业、性生活不和谐等等。惹得嘉庆出离的愤怒，愤怒到要让海瑞活着——生不如死的活着。好在海瑞命够硬，嘉庆死了，他还活着。这不是夸奖海瑞有多么完美，据后来的小道消息称，海瑞对待老婆和女儿并不如对待老妈那么好。当时没啥，和现代的主流观点就格格不入了。但是站在一心搞建设的执政者的角度上来看，海瑞就是好，因为他敢说话、敢办事、敢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完全符合当年毛泽东对下属的要求。

当时刚刚反右派不久，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锦江饭

店召开。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毛泽东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女教授回答：“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话中有话。毛泽东很奇怪，再问“你不问政治？”女教授回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言外之音更明显了。毛泽东又问“柯庆施怎么样？”女教授回答：“更不敢讲。”简直是变相告状了。毛泽东没办法，就问：“我怎么样？”女教授回答：“你英明伟大。”这一系列对答让毛泽东心里直打鼓，因为不仅仅是一个女教授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的问题。

在任何时候，知识界集体沉默都是不正常的现象。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有时候声音如乌鸦一般难听，但仍然要给糖吃，让他们继续叫，因为在乌鸦一样的叫声中已然有金玉良缘。执政者需要避开乌鸦的扰乱，辨别其中的金玉良缘。

毛泽东想要结束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毛泽东号召大家学习海瑞同志，学习海瑞敢说话、敢办事、敢得罪人、不怕杀头坐牢的精神。当时大饥荒刚刚有一点苗头，毛泽东嗅到一点危险，大跃进不是那么完美。他以为下面的同志懈怠了，要他们端正态度，敢说话办事，搞好大跃进。领袖发话自然非同小可，接下来的文化宣传一定要跟上。

胡乔木就找到明史专家吴晗，说为了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毛主席，吴老你就跟进一下吧。吴晗一想也是好事，鼓励一下大家说话嘛，应该的。吴晗拿出自己的历史文学水平，接连写了两篇文章《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大意就是海瑞同志如何如何值得学习等等、咱们应该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学习海瑞等等。这还没完，对于一个顶级的历史学家而言，对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写两篇小文章只是牛刀杀鸡，显然是不过瘾的，特别是这个历史学家又有文学创作才华的时候。况且吴晗本来就是一个激进派，该出头时就会出头；况且吴晗当时的职位是北京副市长，于公于私都要出力的。五十岁的吴晗在自身的热情的作用下，把文学和历史知识融合在一起，写下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出戏或许是新中国诞生以来最为出名的戏剧。之所以出名，并非因为其本身的艺术价值，而是它涉及到政治，并由此引发的争议。为啥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呢？因为它诞生的时间不对。从时间上推算，它诞生于一九六零年。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六零年是新中国的灾难年，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痛苦的年头。那个痛苦的年头怎么会跟一部历史剧扯到一起去呢？因为一个人，一个老熟人，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

吴晗，浙江义乌人，一九零九年生，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二十岁考上大学，受到文化界泰斗胡适的赏识。一九三零年，经大学者顾颉刚引荐，去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随后在胡适的亲自推荐下去清华大学念书，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数十篇文章，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

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略有名气。毕业后直接留在清华大学任教，专讲明史。抗日战争爆发，吴晗先到云南大学任教授，随后去了西南联大。正是这段时间对当局和现状日益不满，写了许多历史杂文，讽刺国民党当局。

北平解放时，吴晗以副军代表的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等职。虽然挂职北京副市长，但主要从事文化工作：他先是主持标点《资治通鉴》；之后又主持挖掘明十三陵中的定陵（目前唯一一个被挖掘的明皇陵）。

可以说在早期的共产党员当中，吴晗是少数的顶级知识分子之一，其文化、学术修养远胜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当然吴晗并不完美，比方说在北京的古城问题上，他就以激进的态度站在梁思成的对立面。梁思成主张多保留一些古建筑，吴晗认为没有必要。当事人回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对梁思成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的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梁思成哭，当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因为那些古建筑的艺术价值远胜所谓的高楼大厦。但是没办法，当年的高楼大厦是稀罕货，当年的中国人过于激进，连吴晗这样的知识分子都如此激进。

一九五七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反右派，知识界沉默；那一年大跃进正在走向高潮。随后大跃进的强度越来越大，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两篇文章之后的第三个月，庐山事件发生了，彭德怀因为说了真话而被批，再次大规模地反右派。吴晗在写作《海瑞罢官》的过程，恰好和大饥荒同时发生。之后又是七千人大会，又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分歧。接下来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就来了。

政治问题怎么和海瑞牵扯到一起呢？因为彭德怀的事和海瑞有几分相似。其实在生活作风上，彭德怀和海瑞确实有相似之处。第一代领导人多半艰苦朴素，彭德怀仍然是艰苦朴素中的典型。统兵作战时，生活待遇和普通士兵一样。一九三九年，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路过陈赓的驻地。陈赓想“贿赂”领导一把，决定给彭德怀弄点好吃的，补补身子骨，这原本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想法。然而身为黄埔三杰之一，足智多谋称著的陈赓却犯难了。因为陈赓知道彭德怀的脾气，反对搞特殊。如果有人对他搞特殊，不论是谁，敢搞特殊的话，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掀桌子骂人。陈赓很犯难，思考许久才想出对策来。

陈赓首先找彭德怀说：“今天的午饭没有准备别的。这地方有一种鳊鱼，也叫桂花鱼，我叫战士下河捞了几条，请你尝尝本地的特产。”战士亲手抓的，没有消耗组织资源，彭德怀不反对：“好吧。”中午吃饭上菜，炊事员先上一盘馒头和一木桶米饭，再上一大盘香喷喷的清蒸鳊鱼。彭德怀

边吃边说这鱼确实不错，做的味道也好。别说是当时条件艰苦的年代，即使今天，这鱼也是美味佳肴啊。

陈赓也很高兴，决定继续实施请客计划，炊事员又端上来一大盘肉丸子。彭德怀开始警惕了，念叨：“你不是说吃鱼，怎么又弄来了肉丸子？”陈赓心里一凉，心想还是领导精明啊。但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说“这丸子是鱼肉做的，不信你尝尝。”彭德怀夹了一个丸子放进嘴里，确实有些鱼味，便不再吭声，大口吃饭。

前两个菜都好说，这第三个菜是只鸡，炊事员不敢往外端，直看陈赓。陈赓一使眼色，鸡也端上来了。彭德怀放下筷子：“这鸡难道也是鱼做的？”事已至此，陈赓豁出去了，往彭总碗里盛了几勺鸡汤：“河边的鸡只吃蚯蚓、小鱼什么的，你补补身体好领着我们打日本鬼子等等。”按道理说，饭都吃了一半了，吃完再批评教育也不迟啊。哪知彭德怀直接开说了，什么现在生活困难啊，一大堆，说完放下碗筷直接出去了。陈赓已经是军内的老资格将军了，而且党龄比彭德怀还高，并且和彭德怀有很熟，又是老战友了，是不是太过分了？非也！陈赓已经很知足了，并且喜滋滋地对部下宣布：“彭总今天对我的批评算是客气的喽！”

由此可见，彭德怀的生活作风真的和海瑞确有几分相似。用现在流行话说，就是不会来事，甘当又臭又硬的石头。而海瑞仅仅是骂皇帝不好好干活，彭德怀在庐山写的那封信，分量远胜海瑞骂皇帝的奏章。而且海瑞仅仅是一个道德君子，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治国；彭德怀可是横刀立马一辈子啊。可以说彭德怀不是海瑞，如果硬说是，那也是海瑞的加强版。大家都能嗅到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如果说大饥荒之前，毛泽东鼓励大家说话是为了搞建设，吴晗写的东西顺应了政治形势。那么在大饥荒之后，他发现党内出了很大问题，即右派太多，在搞修正，国家危险了，吴晗写的东西变成了违逆潮流，他对海瑞的颂扬就变成了对时局的讽刺。连江青都能看出来，于是她在一九六二年要搞批判。

但那时候时机未到，因为一九六二年刚刚开完七千人大会，刚刚集中全党的力量扛下大饥荒的责任。那个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虽然有分歧，但是还没有全面升级。毛泽东还想以教育的方式把全党团结统一在三面红旗之下，再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小四清。那个时候，江青想批判《海瑞罢官》，想批判吴晗，进而批判北京市委，从而赢得政治资本的可能性无限趋近于零。但是三年后，形势不一样了，江青终于等到了机会。

小四清搞了两年，也未见成效。行政系统非但没能再次回到既定政策上来，反而越走越远。六二年六三年，虽然理论上还是三面红旗，实践上已经偏离大跃进的轨道，而且解散了一部分公共食堂，分了一部分地，当然大饥荒也结束了。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决定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国家经济进

行调整，顺势把小四清升级为大四清，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认可（详情请参照刘少奇篇）。毛泽东则认为国家出了修正主义，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次性解决问题，时间是一九六四年。也正是六四年夏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五人小组成立，主管文化领域的政治问题，组长是彭真。以彭真为首的五人小组把江青给顶出了北京。

江青只能去彭真的老对头，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那里。江青为啥老抓住吴晗不放呢？据说，毛泽东曾和吴晗煮酒论史，江青插话卖弄聪明时出了漏洞，吴晗纠正了江青的漏洞，从此江青恨上吴晗，许多人就此认为江青是公报私仇。其实不然，江青的目标不是吴晗，而是吴晗背后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按道理说，这么大的事应该由盘踞在上海的柯庆施亲自操刀。很遗憾，柯庆施死了。柯庆施的死很突然，也闹得轰轰烈烈。他若不死，在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后期四人帮搞不好弄成五人帮，或者一个教父加四人帮。柯庆施虽然死了，柯庆施留给江青的礼物还在，也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担子就落在这两位身上。当然这是一个重担，要拿几百年前的一个死人横扫当今世界，谈何容易啊？

尽管海瑞和彭德怀在生活作风和脾性上都有相似点，毕竟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生活的年代前后相差几百年呢。如何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呢？那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事，考验棍子们功力的时间到了。

一开始，写文章的事在上海只有张春桥和姚文元知道。张春桥久经考验，姚文元一腔热血，但两个人都不太懂明史，也不了解海瑞其人。为了写好文章，两人查资料、找证据，发挥毕生的才华，通过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移花接木、乾坤大挪移等一系列手段之后终于把文章给弄出来了。文章署名姚文元，但远不是姚文元一个人的功劳。除张春桥之外，还有写作小组里的才子们。所谓写作小组，就是一帮知识分子组合在一起，专门制作棍子。很多当今的社会精英当年都在写作小组里混过——据说余秋雨同志也能和文革写作小组扯上关系。他们如同战斗队一样躲在屋子里，干着攻击污蔑敌人的伟大事业。

军人卷入政治是一种悲哀，文人也是一样。现在只要想一想那些所谓的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当年在黑屋子里干的事，心理就堵得慌。很多人被誉为社会的良知，他们像良知的样子吗？无语。当然，无语的事还有很多。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不长，却历时半年多，前后改稿近十次，可见文章问世之艰辛。可惜这样一部艰辛问世的作品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读起来也不能给人以美的感受，只能感受到

一群有文化的流氓那赤裸裸的狰狞、卑污的面孔。常言道，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这篇文章堪称文化流氓的巅峰之作。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寂寞而矗立。

文章是这样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

1965年11月10日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得到正确的解决。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笔名刘勉之，1959年6月16日）、《论海瑞》（1959年9月21日），还发表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纸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毛泽东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能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会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从1959年6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961年，他又经过7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今作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欺负，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苍天”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官吏们如闻晴天霹雳，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歌颂他是“公正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冤狱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冤狱”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作为戏剧冲突最高潮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贪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咒骂“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鼓动农民去“告状”，而且在公堂上颇有民主风度地

征求告状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限令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霸占良民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以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民们“感恩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清官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残酷地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贪官”。剧本反复宣传：“冤狱重重要平反”，海瑞决心“平民愤”，要把“恶官吏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民怨，法无宽恕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囚禁，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反抗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喊冤，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官吏，其他出场的主要官吏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明哲保身”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政治，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革命。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歌颂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企图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编造出来的。

海瑞是1569年夏到1570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掠夺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资

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掠夺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政治势力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 24 万亩，有的说 40 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胥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请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官吏不断地要求查田，要求限制“皇庄”和其他庄田，限制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势力的豪强地主收买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丧失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规定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特权，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这是事情的本质。《海瑞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政治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人心同愤”，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分子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 political 态度。

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攻击海瑞纵容“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

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歪曲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下令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官府的以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有损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被打倒，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宗之成法”。原来“祖宗”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规定：“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规定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专政。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攻击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统治，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暴动，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反动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巩固明

皇朝政权。这是封建统治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皇帝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动摇“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冤狱”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政敌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权斗争。把内阁中不同政治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民愤”，这不是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民主”。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假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编造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于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阶级斗争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官吏，都无法使已经腐朽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仇恨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

1587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1644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60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

“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荒唐到可笑吗？

《海瑞罢官》宣扬了什么？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压迫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不可能超越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歪曲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拿“清官”同“贪官”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清官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惩办一些“贪官”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清官”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清官”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迷惑过不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清官”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麻痹农民的觉悟，把“清官”当作掩盖阶级统治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镇压、对农民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清官”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清官”、“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

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

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4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4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4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15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

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1957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

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完毕〉

文章大概有这样几层意思。

文章指出：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把海瑞写得太好了，和真实历史上的海瑞不一致。真实历史上的海瑞没有民主自由的思想，所以这出戏有造假的嫌疑。

——想想这一层就觉得搞笑。海瑞那时代有阶级、自由、民主的概念么？只是戏剧而已。用这种方法考证，《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与历史也不符，即使是伟大的《史记》和历史也不完全相符。

——这是艺术，不需要从政治角度去考证。但是作为棍子领域中的顶级好手，姚文元偏要去考证。凡事都有目的，姚文元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学和政治扯到一起。

文章指出：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宣扬了什么？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统治权力的官吏，包括清官、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统治阶级又为被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清官”不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清官”海瑞以保护“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专政的别的官吏相对立，“清官”和“贪官”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保护农民和镇压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清官”在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革命的斗争精神，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跪下来向“海青天”告状，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申冤作主，把“清官”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阶级斗争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清官”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清官”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专政而独立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宣扬了被压迫人民不需要革命，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只要向“清官”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王法”，就能把贪官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如此把政治观点套到文学上，就不用解释说明了吧？

不禁纳闷，姚文元及其同仁们历尽千辛万苦，熬死那么多脑细胞之后，脑袋上的头发又脱落不

少之后，终于把一出戏剧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而且这是一项得罪人的工作，得罪的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接下来的目的呢？答案很简单：得罪更多的人。

要得罪更多的人，把文学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不够的，还要把政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于是妙文再一次出现了。

文章指出：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看到这些词汇了吗，退田，即为单干；平冤狱，即为翻案；冤，即为黑暗。这正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的三大风，单干风，黑暗风，冤案风。

看到这里，不禁要佩服姚文元及其战友们的才华，能把一出戏剧引申出如此之多的内涵，而且对领袖的用词把握得极为到位，不容易啊。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强大！

既然牵扯到现实，那就要为了现实而战斗了。

文章指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

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这一段可以视为战斗宣扬。十八般兵器蕴涵之中，杀气腾腾，波涛汹涌。但是听起来却是另外的样子：他们是错的，他们很险恶，他们破坏了大好环境，去要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我们是对的，我们很无辜，很清白却要为他们错误买单；他们挑起了战火，他们要进攻我们，我们要自卫，为了保卫自身利益。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批判功力。没有无聊的谩骂，没有肉麻的吹捧，字里行间充满杀机，杀意阵阵，让人不寒而栗，如同一流杀手散发出来的杀意。文章成功地把前后相差数百年的彭德怀和海瑞联在一起，巧妙地把文化和政治搅合在一过，锋芒所指，覆盖文艺界和政治界所有人物，不愧为文革大戏的开幕词。

——这是中国式逻辑的胜利，文坛棍子的胜利。

如果造棍子的水平到了这个境界，要骂人的话，绝对可以问候祖先十八代而不吐脏字，足够让许多网路愤青惭愧到泪流满面；如果要拍马屁恭维领导，那绝对会于无声处听惊雷，不声不响之际把马屁拍得震天响——他们已经到了人间凶器的境界。现在他们坚定地站在一种意识形态的上面，自以为代表真理和道德，精神力量提升到最高层，战斗力成倍增长。加上身后站着的伟大领袖和伟大领袖的旗手，一时所向无敌，隐隐有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

江青看到文章之后自然非常欣慰。首先数年的心愿——批判海瑞罢官——终于实现了，其次这篇文章太过强悍，足够攻击敌人、抬高自己、收服很多不明内情的人。江青笑了，仿佛看见彭真等人开始变得忧郁痛苦的表情。但是很快，她又发现自己笑得太早了，因为那篇杀伤力十足的文章刊载在上海的《文汇报》上，但《文汇报》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加上上海帮大神柯庆施去了马克思那里报到，张春桥还没有真正上位，文章有货无市，一时间甚为尴尬。就算上海有报纸转载，其它地方（主要是华东六省，原柯庆施的地盘）也有零星转载，但毕竟只是星星之火，难以形成燎原之势。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年的媒体资源有限，都和政治绑在一起。大饥荒之后，政策往右转，地方的行政系统都希望政策降一降温，不要过于激烈，对这种杀气腾腾的文章自然不太感兴趣。因为大跃进那几年，也是这么杀气腾腾干活的，结果捅出天大的篓子。这也是当年行政系统偏向刘少奇的原因。北京和上海这种地方之所以有力量继续折腾，就因为大饥荒没有波及到这些地区。全国

人民勒紧裤腰带挨饿时，京沪一带还能保障基本供粮。说白了，也就是北京、上海一带没有经历过挨饿的滋味。所以他们的行政长官还能吃饱了不饿搞论战。其它地区牛叉的人物，如显赫一时的李井泉、吴之圃、曾希圣等人都销声匿迹了。

这是一轮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之间的较量。出拳的是上海，狠狠地砸向北京，北京使用乌龟神功抵抗。当时《北京日报》的社长叫范瑾。范瑾原来是黄敬的老婆，黄敬英年早逝之后改嫁。此时她处在阵地的最前沿，正考虑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大作。这样重大的事，她是做不了主的，要请示北京的大当家彭真。明知道砸向自己的拳头，还要挺起胸膛去接受，那是傻瓜。彭真不是傻瓜，指示曰，不必转载。

拳头本来是对准北京的，北京竟然关上了大门！几年辛苦，几个月的突击，就这样被彭真挡了，江青很惆怅。联想到因为京剧的事被彭真顶出北京，联想到彭真占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文化组长的位置，江青更惆怅了。但她已经没有办法，因为彭真是政治局常委，京城的一把手。她只是领袖夫人而已，在个人实力上她和彭真不在一个档次。

好在她是领袖夫人，好在这盘棋是领袖下的。她搞不定的事，将由领袖来搞定。她搞不定的人，将由领袖来搞定。那个时代，除了涉及到客观规律，没有领袖搞不定的人、搞不定的事。毛泽东找彭真聊聊天，再批评两句，谈笑之间事情就解决了。

彭真当时是要保吴晗的。为啥要保吴晗呢？因为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一旦被批判，势必牵扯到北京市委。吴晗的事本来只属于文化范畴，如果牵扯到政治，相当于把文化和政治搅合在一起，将会有很多人遭殃。这事在二十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已经发生过一次。那一次彭真是左派，向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国际派发动进攻，之后彭真的地位迅速升高。现在再来一次会怎么样？彭真本人已经是政治局常委，又主管北京，在他之上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新左派全力冲击的话，势必要冲击到今日已经大权在握的彭真。抛开是非不谈，单从个人得失的角度上看，彭真也得全力保吴晗。

然而很多事是分不清的。以官员的身份写戏剧，究竟是搞政治还是搞文艺？既然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凭啥就不能批评？副市长搞文艺就高人一等吗？高官写的东西就不能动吗？没这个道理。如果说一般人提这些问题，彭真完全可以不予理会，这些问题从领袖那里出来就不一样了。然后领袖再点一下北京市委是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彭真就完全撑不住了。

——好吧，转载。

——星星之火，终于燎原。大幕拉开了。

（十六）二月提纲

毫无疑问，炸开了锅。

左派、右派围绕着文章争吵不休，许多重量级人物纷纷登场，各路专家不顾专家的面子，教授学者们也不再装斯文，一时间板砖、棍子满天飞，口水汇集成海洋。

其实争吵早就开始了。看看一九六五年的报纸：一月份，《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引申为彭德怀被贬。——批！二月份，《文艺报》则批判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更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份，《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五月份，批《林家铺子》，如此等等。批《海瑞罢官》不过是高潮而已。其它的批判文章没有引起那么大的风波，只因为批判力度不大，范围不广，双方都可以接受。

姚文元的文章不一样，那是要横扫一切的，特别是所谓的右派。所谓右派，也就是行政系统内部的那些高级官员，包括彭真在内。随着文章的转载，批判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

所谓批判有几层含义：正常情况，摆事实讲道理；还有不正常情况，比方说私人恩怨，那是很多的，比如说张三看领导不爽，李四看同事不爽，需要打击报复一下，为了达到打击报复的目的，有时候捏造点证据，张开血盆大口喷喷人也是有的。又比如说某个所谓的文化人，渴望黄金屋和颜如玉而不得，积怨于心，愤愤不平，时间一长修行圆满，晋升到愤青的行列，现在得到机会去喷人，指望他口下留情是不现实的。

但不让那些人说话同样不现实。因为当时整个社会到处都在搞运动，都是热的，当其时，大四清运动正处于高潮阶段。前面说过，大四清运动是一场刘少奇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属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高级阶段，目的是算大饥荒的账，从上往下算，本质是把大饥荒的责任导向中下层。在这样一个运动中，查这个查那个，本来就乱哄哄的，本来就口水一大片、棍子一大堆。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两年了，还没有消停。毛泽东又摆出了更大的一个阵势，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的调度下，新左派诞生，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即将爆发。可以想象争吵是何等激烈。

两派都自称是革命派，打着毛泽东的旗帜。

左派，人数多，地位低；右派，人数少，地位高。

左派要求乱起来，要夺权，说你们右派老是欺负俺们老百姓，不行，你们要下岗；右派，极力抓紧手中的权力，说你们瞎折腾啥，要注意社会和谐稳定。

这样闹下去也不是办法，毕竟光脚不怕穿鞋的。左派那些人本来就地位低下，能和右派高干们

站在同一个擂台上比赛本来就是一种胜利。右派不一样，已经是高干了，闹出个三差两错，那真的是晚节不保，伤不起啊。

原本就是一场不对等的较量，左派那些人和右派相差甚远嘛。但是左派有一个决定性的筹码——领袖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左派。在毛泽东身后，还有一大群人，他们是国家的保护者——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避开来自左派的冲击，右派必须发挥智慧。他们知道左派冲击一旦爆发，将是多么猛烈，那绝对是狂风暴雨似的，要毁灭一切的。因为他们本来也是狂热的左派，在赢得权力之后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从历史上看，权力是革命派最好的镇静剂。掌握权力后就要干活，所有要干活的人，都要面对现实，即活该怎么干。所以左派一旦掌权，通常会往右转。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估计不用多久也会变得现实起来。

双方争吵了几个月，依然没有消停的迹象，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曾经的左派，当时的右派人物之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主管文化的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同志坐不住了，于六六年二月三号召集大家开会，讨论一下该怎么办。参加会议的除了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之外，还有胡绳、王力等当时比较活跃的人才。又是一番争吵之后达成共识——弄一个纲领性文件出来，史称《二月提纲》。

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纲领，把斗争艺术和稀泥技术融合起来，实现了无缝对接。

提纲第一部份，也是开宗明义的部分，就是承认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口水仗往前是正义的；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充分肯定。

——彭真当时心中是否愿意如此肯定眼前的口水仗已经不得而知。但事实摆在眼前，不肯定的话后果很严重。首先，在毛泽东那里就过不了。因为毛泽东是支持左派的，谁敢公然反对，毛泽东就会大手一挥，让他灰飞烟灭。第二点，左派数量众多，即使没有毛泽东的支持，也必须争取，否则将把自己孤立起来，那也是死路一条。最后一点，承认双方都有道理，相当于告诉那些兴风作浪的人，你们不要闹了，咱不追究责任。至于会不会秋后算账，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总而言之，和了很大一盆稀泥，让大家不要再折腾了。如果精神无处发泄，继续折腾也可以，请注意折腾的方式——这就是提纲的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讲，咱们是民主国家，是让人讲话的、让人辩论的，是民主的。但民主是要摆事实、讲道理的，要坚持实事求是，要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乱扣帽子，

不要仗势欺人，不要搞武力斗争。

——说得直白点就是，追求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同时，咱们要懂文明、讲礼貌。

说穿了，还是和稀泥，也就是让大家消消气。如果火气太大，也不要一次性发作，要细水长流，慢慢说。怎么慢下来呢，就是第三部份。

第三部份说，搞辩论时要注意自身队伍。咱们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名义上依靠左派，同时号召左派搞团结、做研究。左派本来就很团结，团结起来搞破坏，打到大部分知识分子。让他们团结大部分，相当于要求他们压缩斗争目标，少斗一点；而且号召他们搞学术。这就搞笑了，如果都回家搞学术了，那还叫左派吗？而且人家本来就社会地位低，有搞学术的条件吗？让人家消气回家却不直说，转了这么多弯弯。

那么什么样的队伍是又红又专的队伍呢？这是第三部份的内容。

这部分也没啥新观点，还是老一套。就是说，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

——空中楼阁，难以实现，无法就是劝大家讲文明、不搞暴力。

说了老半天，浪费了那么多口水之后，当前的争论怎么办？大家谁也不服谁，怎么办？办法就是提纲的第五部分。

在这部分中，要求参战的各位选手先冷静冷静，然后好好想一想，写一点高水平的文章拿出来继续论战，不要现在这般争吵谩骂了。

最后，也就是第六部分，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通篇都是在和稀泥。

提纲看起来可谓有理有据有节，看起来对左派也不错，看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点左倾，应该说很照顾左派那些思想家、理论家、愤青了，没看出斗争在哪里啊？斗争在哪里呢？

妙就妙在这里：如果和稀泥成功，斗争也就胜利了。因为左派主要来自下层，如果文明了，温顺了，回家做学问去了，那么下层还是下层，上层还是上层。也就是行政大权还在右派的手中，各自的地位也就保住了。保住了地位，斗争也就胜利了。

不能不佩服政治艺术的深邃无边啊。

（十七）江青的纪要

如果提纲通过了，左派回家了，文革也就没有了。胆敢不回家的，一律按照军阀流氓处理，并美其名曰为“学阀”，成为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问题是能通过吗？能否通过，是要党内最高领导人点头的。四天之后，也就是二月七号，五人小组把提纲提交给中央政治局，刘少奇主持讨论修改一下，通过。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当时在武汉。第二天，也就是二月八号，彭真、康生、陆定一带着提纲特地去武汉请示。毛泽东当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是说不要批判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以后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又过四天，二月十二号，政治局把提纲批发给全党，作为批判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下发。

《二月提纲》如同一漂冷水泼向炽热的批判运动。特别是上海的张春桥同志，在狂热的美梦里淋了一场大雨，从外凉到里。因为文件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发的，上海市委也必须向下传达，对刚刚发动起来的批判运动极为不利，然而他也没有办法。当时张春桥的级别还是太低了，没啥能量。如果这场雨一直下，那么迟早有一天，张春桥和姚文元要沦为——学阀——是要被批判的。然而张春桥同志，你不需要惆怅，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早在提纲问世之前，伟大领袖毛泽东已经表态支持，说姚文元的文章写得好。与此同时，毛泽东的代言人江青正积极活动，江青正和张春桥策划新一轮的进攻。由于《二月提纲》降温，江青只好暂别张春桥，寻找新的强有力的帮手。在毛泽东没有直接出面的情况下，还有谁是强有力的帮手呢？还有一个，那就是政坛新星，军界掌门人，赫赫有名的林彪同志。当时在朱德淡去，彭德怀臭掉的情况下，林彪已经成为军界的代表。

按照江青的话说，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搞得跟演戏一样，只能说江青入戏太深啊。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一号，江青从上海到苏州见林彪，提出由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以便对文艺界进行更有力的进攻。作为毛泽东的左右手，两人自然要好好合作。林彪一口答应，派叶群去通知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让他带人支持江青。二月二号，刘志坚带几个人去了上海。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并宣布了游戏规则：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解释了原因，还是老一套，大意说：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等等，座谈会也是按照这个调子来。

从二月二号到二十号，江青带着大家看电影、聊天、喝茶、看戏。刘志坚等人的日子看似轻松，实际上压力山大。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这段时间内把江青的言行给整理出来，形式还不能采用儒家记录孔子的言行那样，要形成一个结构合理、逻辑清晰、足以对抗《二月提纲》、战斗力超强的战斗檄文。

——这样的文章不好写啊。文章功底啥的还是次要的，问题是讨伐的对象可是不得了的一国家主席啊、政治局常委啊、各地封疆大吏啊啥的，都不好惹，弄不好就把自己给卷进去了，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这十几天的时间里，刘志坚等人看了十几部电影（在当时算奢侈了），听了江青十几次谈话。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他们根据会谈精神，整理出一篇大约三千多字的《纪要》。江青一看，立刻打电话给已经回到北京的刘志坚表达不满，说纪要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要刘志坚派人去上海帮助她修改，并说此事已经告诉了毛泽东，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也参加修改。刘志坚在同总政正主任肖华商量后，派陈亚丁返回上海参加修改，并交代：江青要怎么改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纪要主要啥问题呢，主要是没有突出江青的功绩，即样板戏。还是陈伯达聪明，直接点明说，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沙家浜》、《红灯记》，这才真正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要把这些写进去。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江青当然非常高兴，曰，陈伯达的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

附：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一）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到二月二十日，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邀请部队的一些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

来上海之前，林彪同志对参加座谈会的部队同志曾作了如下的指示：“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杨成武等同志对这次座谈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指示我们一定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办，并对江青同志这样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表示感谢。

在座谈开始和交谈中，江青同志再三表示：对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不深，只是学懂哪一点，就坚决去做。最近四年，比较集中地看了一些作品，想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不一定全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应当平等地进行交谈。这件事，去年就应该做，因为身体不行，没有做到。最近，身体好一些，根据林彪同志的指示，请同志们来共同商量。

江青同志建议先看作品，再阅读一些有关的文件和材料，然后交谈。江青同志给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并先后同部队的同志个别交谈八次，集体座谈四次，陪同我们看电影十三次，看戏三次。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也随时进行了交谈。另外，还要我们看了二十一部影片。在此期间，江青同志又看了电影《南海长城》的样片，接见了《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一部分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给了他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在接触中感觉到：江青同志对毛主席思想领会较深，又对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长时间的、相当充分的调查研究，亲自种试验田，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次带病工作，谦虚、热情、诚恳地同我们一起交谈，一起看影片、看戏，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和帮助。

（二）

在这二十天中，我们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和有关材料，听取了江青同志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看了三十余部好的、坏的、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点、错误的影片，又看了《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两出比较成功的革命现代京剧，从而加深了我们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会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

一、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事实上，在我国革命的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文化战线上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我们党的历史上，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也都包括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王明路线是一种曾经在我们党内泛滥过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毛主席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王明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紧接着，又在理论上彻底地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就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后，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著作，这是我国和各国革命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最新的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的新发展。毛主席的这五篇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

毛主席的前三篇著作发表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后两篇也已经发表将近十年了。但是，文艺

界在建国后的十五年来，却基本上没有执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题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搞掉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二、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从事京剧改革的文艺工作者，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向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进攻，锋芒所向，使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从思想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革命，并且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泥塑《收租院》等，已经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批准，在国内外观众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它有力地证明：京剧这个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可以攻破的，可以革命的；芭蕾舞、交响乐、雕塑这种外来的古典艺术形式，也是可以加以改造，来为我们所用的，对其它艺术的革命就更应该有信心了。有人说革命现代京剧丢掉了京剧的传统，丢掉了京剧的基本功。事实恰恰相反，革命现代京剧正是对京剧传统的批判地继承，是真正的推陈出新。京剧的基本功不是丢掉了，而是不够用了，有些不能够表现新生活的，应该也必须丢掉。而为了表现新生活，正急需我们从生活中去提炼，去创造，去逐步发展和丰富京剧的基本功。同时，这些事实也有力地回击了形形色色的保守派，和所谓“票房价值”论、“外汇价值”论、“革命作品不能出口”论，等等。

近三年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另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工农兵在思想、文艺战线上的广泛的群众活动。从工农兵群众中，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善于从实际出发表达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文章；

同时，还不断地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歌颂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战线上的大跃进，歌颂我们的新英雄人物，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工农兵发表在墙报、黑板报上的大量诗歌，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划出了一个完全崭新的时代。

当然，这些都还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保卫和发展这一成果，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还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艰苦的努力。

三、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决不可能例外。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依靠和希望。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敌人一定会从各方面破坏它，也一定会利用文艺的武器，企图对它进行思想腐蚀。而罗瑞卿同志却在党中央指出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方针以后，还说部队文艺方向已经解决了，主要是提高艺术水平的问题，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缺乏具体分析的。事实上，军队的文艺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也比较高；有的方向对，艺术水平低；有的在政治方向和艺术水平方面都有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也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抓壮丁》这样的坏影片。这说明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同时，我们自己培养的真正过得硬的创作人材还比较少；创作思想问题还很多；组织上也还有些不纯。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作出恰当分析和解决。

四、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林彪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明确规定部队文艺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密切结合部队的任务和思想情况，为兴无灭资、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服务”；军队中有一批我们自己培养的、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文艺骨干；也创作了一些好的作品。因此，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解放军一定要起应起的作用，勇敢地、坚定不移地，为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

五、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领导人要亲自抓，搞出好的样板。资产阶级有所谓“创新独白”，我们也要标新立异，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我们有了这样的样板，有了这方面成功的经验，才有说服力，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才能打掉保守派的棍子。

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有自卑感，而应当有自豪感。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才是最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因此，决不能把任何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当成我们无产阶级思想运动、文艺运动的指导方针。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的后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无产阶级的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主义者，有些人民主革命这一关就没过去，有些人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

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很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不好。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甚至美国电影，对我国文艺界的影响是不小的，有些人就当作经典，全盘接受。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拒绝研究是错误的，但一定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一批比较优秀的苏联革命文艺作品，也要有分析，不能盲目崇拜，更不要盲目的模仿。盲目的模仿不能成为艺术。文学艺术只能来源于生活，只有生活才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历史过程，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我们人民解放军开头也是弱小的，终于转弱为强，战胜了美蒋反动派。面对着国内外大好的革命形势和光荣的任务，我们应该以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而感到自豪。要有信心，有勇气，去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因为我们的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我们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去创造无愧于我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这是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但是，要搞出好的样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在战略上一定要蔑视它，而在战术上却一定要重视它。创作一部好的作品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抓创作的同志决不能采取老爷式的态度，决不可掉以轻心，要同创作者同甘共苦，真正下一番苦工夫。要尽可能地掌握第一手材料，不可能时也要掌握第二手材料。要不怕失败、不怕犯错误，要允许失败、允许犯错误，还要允许改正错误。要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经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精益求精，力求达到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掌握各种艺术的规律。不这样，

就不可能搞出好的样板。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及其他重大战役的文艺创作，要趁着领导、指挥这些战役的同志健在，抓紧搞起来。许多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急需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创作。《南海长城》一定要拍好。《万水千山》一定要改好。并通过这些创作，培养锻炼出一支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骨干队伍。

六、在文艺工作中，不论是领导人员，还是创作人员，都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要走群众路线。过去有些人搞出一个作品，就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这是一种很坏的作风。至于抓创作的干部，对待文艺创作，应该经常记住这两点：第一，要善于倾听广大群众的意见；第二，要善于分析这些意见，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就不吸收。完全没有缺点的作品是没有的，只要基调还好，要指出其缺点错误，把它改好。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我们不要怕群众，要坚决地相信群众，群众会给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的。另外，对一些思想糊涂的群众，也可以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摄制一部电影要花费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把坏片子藏起来，白白地浪费掉了，为什么不拿出来放映，从而教育创作人员和人民群众，又可以弥补国家经济上的损失，做到思想、经济双丰收呢？影片《兵临城下》演了好久，也没有人批评，《解放军报》是否可以写篇文章批评一下。

七、要提倡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广大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在文艺批评中，要加强战斗性，反对无原则的庸俗捧场。要改造文风，提倡多写通俗的短文，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工夫；当然也要写一些系统的，有理论深度的较长的文章。反对用名词术语吓人。只有这样，才能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要开辟定期的或不定期的文艺评论专栏，对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要热情支持，也可以善意地指出它的缺点；对坏作品，要进行原则性的批评。对于文艺理论方面一些有代表性的错误论点，和某些人在一些什么《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之类的书中企图伪造历史、抬高自己，以及所散布的许多错误论点，都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对人家说我们简单粗暴要有分析。我们有的批评基本正确，但是分析不够，论据不充分，说服力差，应该改进。有的是认识问题，先说我们简单粗暴，后来就不说了。但对敌人把我们正确的批评骂作是简单粗暴，就一定要坚决顶住。文艺评论要成为经常的工作，成为开展文艺斗争的重要方法，也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没有正确的文艺评论，就不可能繁荣创作。

八、文艺上反对外国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只捉丘赫拉依之类小人物。要捉大的，捉肖洛霍夫，要敢于碰他。他是修正主义文艺的鼻祖。他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

对中国的部分作者和读者影响很大。军队是否可以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有分析的、论据充分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文章。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对国内的作品，也应当这样做。

九、在创作方法上，要采取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不要搞资产阶级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涌现的工农兵英雄人物，他们的优秀品质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千方百计地去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要塑造典型，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不要死一个英雄才写一个英雄，其实，活着的英雄要比死去的英雄多得多。这就需要我们的作者从长期的生活积累中，去集中概括，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来。

写革命战争，要首先明确战争的性质，我们是正义的，敌人是非正义的。作品中一定要表现我们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但是，也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革命战争的残酷性和革命的英雄主义，革命的艰苦性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否则，位置摆错了，就会产生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倾向。此外，在描写人民革命战争的时候，不论是在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的阶段，还是以运动战为主的阶段，都要正确地表现党领导下的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关系，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的关系。

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调查研究，才能选对、选准。编剧要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导演、演员、摄影、美术、作曲等人员也要深入生活，很好地进行调查研究。过去，有些作品，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写了英雄人物，但都是犯纪律的，或者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掉，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实际上是落后人物，丑化工农兵形象；而对敌人的描写，却不是暴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质，甚至加以美化；还有些作品，则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说什么“爱”和“死”是永恒主题。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的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我们的文化水平比较低，我们的经验比较少，我们的许多文艺工作者，是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培养起来的，在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过程中，有些人又经不起敌人的迫害叛变了，或者经不起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烂掉了。在根据地，我们培养过相当数量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缺点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

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因而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我们的文艺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党的文艺。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最显著标志。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同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划清界线，决不能和平共处。现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教育提高的问题。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带着问题学，才能真正学得懂、学得通、学到手。要长期深入生活，和工农兵相结合，提高阶级觉悟，改造思想，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要教育我们的同志，读一辈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书，革一辈子命。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

（三）

通过座谈，我们对上述问题都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意见，也都符合军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了我们的觉悟，加强了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决心和责任感。我们一定要继续学好毛主席的著作，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种好试验田，搞好样板，在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文化革命斗争中起好带头作用。为了使这次座谈的成果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建议军队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并规定了经常读和每年五月集中时间总结检查一次的制度。这一制度一定要认真地坚持下去。

二、四月份召开创作会议。仿照江青同志组织这次座谈会的方法，把这次会议开好。要把这次会议当做一次学习毛主席文艺思想的骨干训练班，一次使部队文艺工作者投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总动员。并在此基础上，对全军的创作队伍，逐步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整顿。

三、成立三大战役创作办公室，组织三大战役创作队伍。争取在两三年内搞出反映三大战役的好的作品。在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前，拍好《南海长城》电影。总政治部文化部的主要领导同志，要把拍好这部片子，当作自己的“试验田”。并通过这次创作活动，来组织、培养自己的骨干队伍和文艺工作的接班人。

四、认真清理部队的电影、戏剧和作品。优秀的大量复制、翻印，在部队反复放映、阅读；内容很好，但有缺点的，重新加工、重拍；不好的没有修改价值的作废。

五、整顿总政治部电影制片局。配好领导班子，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清理、整顿创作队伍。

六、要认真摸一下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教学问题，进行教学改革。这是关系到培养无产阶级文艺事业接班人的大事。

七、在文艺工作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戏剧、电影、文学作品的审查要走群众路线，大家把突出政治的关。

八、组织一个写文艺评论文章的班子。首先写出批评肖洛霍夫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文艺》上开辟专栏，加强文艺评论。

九、军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地方各个协会的活动，以及军队作者的作品交由地方报刊、出版社、制片厂出版和拍摄，都应制定出一套妥善的管理办法，加强管理。

十、总政治部党委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以上整个座谈纪录所说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完》

稿子虽然是众人弄出来的，但题目却是《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又经过一系列折腾之后，成为研究文革的重要材料之一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其中经历了毛泽东的修改和林彪的审阅。一个月后，林彪写信把稿子送给军委各个常委，准确地判定文件“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彪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四月十号，《纪要》转发全党，要求认真讨论研究，贯彻执行。

纪要的口号是破旧立新，这个口号没有问题。任何一个行业都要破旧立新，就是文学本身也是一直破旧立新，比方说伟大的屈原写的那种骚体诗很伟大，现代人再去模仿，送进精神病院的概率都有。问题在于，什么是旧，什么是新；如何破，又如何立。

纪要通篇也没啥新观点，基础是毛泽东二十年前搞的文艺规范《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个都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说不好听点，叫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从政治立场看，这样干没错。甚至从文学立场上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让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也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纪要本身出了问题，它强调只搞无产阶级文学，他强调文学仅仅为政治服务，那就麻烦大了。

无产阶级文学是什么文学呢？概念很广泛，选题却很窄，就是工、农、兵。再细一点，写工人如何可爱、农民如何可爱、士兵如何可爱。确实，工人是可爱的，农民是可爱的，士兵也是可爱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些可爱是在集体中才可爱。比方说军队在行动时，比方说一大队工人搞大项目时，那种积极配合，确实是可爱的。如果把单个的农民拿去相亲，把单个的工人捧上舞台，让单个士兵做节目，一点都不可爱，而且笨手笨脚很煞风景。说白了，工、农、兵还是社会基层人群，如

何让大家欣赏？搞几个样板戏宣传工农兵，完全没有问题，甚至需要多搞点，毕竟他们才是社会的主体嘛。

如果全部艺术集中在工农兵身上，很遗憾，艺术将死亡。艺术的真正魅力在于灵性和自由度。经典作品的诞生需要一系列条件。比方说《将进酒》是李白写的，但李白也不能保证任何时候都能写《将进酒》。再比方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早年的代表作。等到晚年，歌德的精神境界已经归于平静，不可能再写出如此激进的作品了。对于艺术家而言，不怕忍饥挨饿，就怕被关进笼子。对于这一点，身为诗人的毛泽东应该非常明白。毛泽东早年的文章，毛泽东的诗词，毛泽东的字，都是大气自由的，毛泽东本人也非常讨厌条条框框。

这就牵扯第二个问题：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么？不能。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就不再是文学，那叫棍子，那叫马屁膏药。这点毛泽东也明白，那么为啥还要干。很简单，他只是想通过文学作为切入点，过度到政治而已。他不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搞政治大革命。文化只是幌子，革命才是目的。

革命对象当然就是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但不能说是政治革命，政治大革命听起来杀气太重，容易引起纷乱，乃至分裂。文化大革命听起来就温柔多了。把铁血的革命藏在文化的面纱之后，可以麻痹敌人。

所以破旧立新，指的是破坏旧的行政体系，建立新的行政体系。可悲之处在于，旧的行政体系是统统破坏了，但新的行政体系一直没能建立起来。破旧立新变成破而未立，这个革命一搞就是十年，黄金般的十年就这么给耽搁了。

（十八）另一篇战斗檄文

那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和以刘少奇为首的右派都是不正常的。现在回顾起来，因为政策和世界潮流的转变，大家对那个时期的印象基本上是毛泽东错误地相信了江青和林彪两匹饿狼，伤害了一大群善良的绵羊。实际情况远不是这个样子。

可以想一想，在各自的单位里，如果你不是一把手，却想要取代一把手，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如果这样子也可以，那么表示单位太糟了，随便搞点小动作就能让单位垮台、让领导走人，太可笑了。文革时代，那些被伤害的人可是高干中的高干，封疆大吏、军队统帅，都是千锤百炼的人才，他们并不是绵羊。或许他们善良，但并不软弱。他们只是在同一种思想之下做出两种选择，在冰与火的交锋下暂时处于下风。

毛泽东明明知道政治和文学是两个概念，却依然把两个概念扯到一起，为何？因为行政系统已

经脱离他的掌控，此时的刘少奇正在指挥行政系统在全国范围内搞大四清运动。前面已经分析过，四清运动的根子在大饥荒，大四清只不过是把大饥荒的责任导向基层，进而洗清上层系统。说白了就是重整官僚系统：上级是英明的，下级要服从，出了事和领导无关。这样做有好处，就是可以把全国的局势给稳定下来，该干活的干活，该当官的当官。换成其它时候也就算了，有官僚系统也没啥不好，至少大家都有事干。

然而这个搞法当然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从革命时代走过来的，都有革命传统。而且军方对以刘少奇为首的白区同志占据高位本来就不爽，再加上领袖毛泽东也看不惯那一套，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一套是在搞修正，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问题从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那份著名的报告中就存在了。

看看彭真的《二月提纲》，实际上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缺乏理论依据，通篇在劝架、和稀泥。如果仅仅是一份文件，就不需要什么新的理论，但如果这个文件要区分政治和学术这样的重大问题，就必须有理论依据。这正是彭真，或者说刘少奇的遗憾。他虽然为了调整经济做了巨大努力，但身为理论家，一直没能在理论上前进一步，经济建设依然没有突破三面红旗那些圈圈。在轰轰烈烈的批判潮流中，《二月提纲》对群众而言是一盆冷水，但是对左派高层而言却是一桶油。很简单：自己在那里搞运动，凭啥让别人回去休息任你摆布？所以才有林彪支援江青，所以才有江青的《纪要》。然而这只是第一步。

张春桥拿到提纲之后惆怅了一阵子，很快就抖擞精神，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摸底。杨永直找到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为敌对双方，太极拳肯定要打几个回合，最后还是彭真解决了问题。彭真对杨永直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许立群又说：“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空气不正常吧。

当杨永直把彭真的话带回上海之后，张春桥意识到机会来了，因为文章的策划人另有其人。张春桥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谈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盾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在随后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春桥说：“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

张春桥的判断是对的，毛泽东准备动手了。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笔杆子固然厉害，毕竟吐沫星没办法淹死人，杀伤力有限。毛泽东的手是巨人的手，动一动那是相当要命的，一根小手指就能让很

多人的人生出现逆转。

三月中旬，毛泽东开会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三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同康生谈了两次话，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毛泽东还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文化小组长彭真也是个大人物了，毛泽东两次谈话就决定了他的命运。随后彭真挨批。

批判彭真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彭真不但位高权重，而且经历各个时期的运动，久经考验，理论功底深厚，是会场高手。一般选手很难奈他如何，必须是超级选手，必须是心狠手辣腹黑嘴功好。这样的超级高手一般难得一见，当时恰好有一位，他就是咱们的老熟人康生同志。林彪批陆定一遇到了麻烦，还是康生解的围。

其实康生早就想批判彭真，早在《二月提纲》下发时，没有给同是政治局委员的康生看。康生很不爽，决定利用开会的机会批彭真。康生原本想先搞个预备会统一口径，然后再发动进攻，打彭真个措手不及，没想到秘书把彭真也喊去了。这种情况下再提批斗，相当于康生和彭真一对一，胜算不大。但康生已经骑虎难下，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冲了。

康生一本正经地说，本人反对提纲，它发出前没有给我看，我不知道，文件发出之后我见到了，这是彭真批发的。然后又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彭真在场纠正说，文件经过会议讨论，修改后，送康生看了才批发的，怎么没有给他看呢？

双方关于看没看文件纠缠不清，情况跟小孩吵嘴差不多，听起来非常搞笑，想起来非常可疑。双方都是政治局的，为何会为了这般小事纠缠不清？何况康生和彭真也没有深仇大恨，延安整风时，两个人还是同一个战壕里面呢。要说有啥不爽，也就是大饥荒彭真只好跟着刘少奇走，康生一直紧跟毛泽东。康生是那种极端精明的人，一般都是遇到好事自己往前冲，遇到不好的事让别人往前冲，为啥要主动挑出来和彭真对战？原因还是康生太精明了，他已经闻到了当时的气息，彭真要完蛋了。他要抢在毛泽东表态之前表达自己对彭真的厌恶和不满，进而赢得信任。说白了，看没看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态。在政治舞台上，除了极少数政治家可以谈政治理念、求得青史留名，其他人主要就是靠站队讨生活，所以说看似搞笑的闹剧下面隐藏着深深的心机。

等到毛泽东表态之后，康生同志笑了：彭真，你的末日到了，让你尝尝我的手段。不要怪我无情，要怪就怪你眼光不够、智慧不足、站队错误吧。

只要给条件，康生可以整到任何人。康生的手段很简单，也不去和彭真搞辩论、喷口水，而是

采用了奇袭战术，避实击虚；经过一系列推理联想，把彭真和兵变联系起来。二月兵变的事在贺龙的故事里已经说了。就是北京部队被拉出去训练，城防空虚，在外边调了一个团搞防务。彭真当时是北京市长，找了几间营房。康生为这事说彭真搞兵变。有了兵变为基础，就把《二月提纲》说成是一个兵变纲领，为兵变做掩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一来，彭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彭真满腹才华，落得一个有口说不清的境地。而在那种严酷的环境下，也没人能帮助彭真洗清了。包括刘少奇在内，都知道彭真保不住了。所以要再一次佩服康生同志，他用才华告诉我们，什么叫——腹黑。

可怜的彭真就这样成为“反党集团”中的一员。他手头的关于罗瑞卿“反党”案还没有结束，自己就和罗瑞卿一起“反党”，和他差不多同时跌倒的还有宣传部长陆定一。负责彭真案的，恰好是老领导刘少奇。

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再加上中央秘书长杨尚昆，一个反党集团诞生了。这个阵容虽然没有当年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那个阵容豪华，已经足够强大，文武齐具，位够高，权够大，拿出来足够震撼。这几个人倒下之后，刘少奇的臂膀断了大半，随着贺龙逐渐失势，再次和军方失去联系。

在政治舞台上，拿下一个人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消除其影响。如何消除彭真的影响呢，《二月提纲》就是现成的材料，只需要猛批就可以了。还要形成一个批判材料，从政治上彻底将其驳倒。那份材料就是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六号下发的一个文件，史称《五一六通知》。和姚文元那篇文章一样，这是一篇战斗檄文。

在这篇战斗檄文里，首先强调五人小组整出的《二月提纲》是错误的，违背了毛是泽东思想，针对毛泽东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其次强调这个错误的提纲其实就是彭真一个人整出来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提纲，其他人不知道，不知者无过。

接下来用非常犀利、肯定的言辞提纲批判一通，什么采用偷天换日的概念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等等。概况起来就是，彭真同志坏人，混淆阶级是非，是混入无产阶级队伍里的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绝不姑息。

比方说第七条表述：“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

‘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看看吧，彭真有多坏！

——多么犀利的言辞，多么顽强的决心，多么冷酷的态度。注意最后那个词，大党阀，比学阀给力多了。

如果仅仅是彭真一个人也就算了，直接批判、斗争、写检讨，然后再关进大牢好好教育。要命的是，不只是彭真一个，彭真只是众多“党阀”中的一个代表。打倒一个彭真只是开始，还要把其他党阀统统打倒拿下，任务繁重啊！

通知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几十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

——尽管任务如此繁重，革命者依然不畏艰险，把斗争进行到底。

所以结论：“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在如此气势汹汹的政治压力下，没有谁顶得住，彭真也顶不住。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彭真的生活变成了两点一线：监狱和批斗会。

原本大权在握，原本高高在上，原本前呼后拥，突然之间，就变成刀俎鱼肉，变成时刻写检讨的阶下囚，变得冷冷清清。之后能干的就是多写点检讨，减少点批斗会，保住有用之身，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这是高干彭真的生活转变的写照，也是其他很多高干的生活即将转变的写照。有人承受不了这个转变，就自杀了；又有人连自杀的机会都没有。

五一六通知全文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 1966 年 2 月 12 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 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 1965 年 9 月至 10 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这个提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 1959 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 1957 年 3 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第六，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

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第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第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第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

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十九）刘少奇的对策

虽然彭真的人生陷入低谷，但事情没完。虽然彭真是个大人物，但仅凭一个彭真，还不需要如此大的动作。因为彭真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是行政系统内的一员，而整个行政的核心是刘少奇，所以矛头是对着刘少奇去的。

整个文革的过程是，从中央大员到刘少奇，再从刘少奇来打碎整个行政体系，然后重新组合。

从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做了那份著名的报告开始，已经注定了理论和实践之

间的矛盾。那个矛盾导致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理论方面的被动。《二月提纲》实际上是整个行政系统，或者说右派的一个理论反击，很快以失败告终。《五一六通知》的诞生，意味着刘少奇为首的右派在理论论战方面的失败。

随着贺龙和罗瑞卿失势，刘少奇和军方的势力再一次完全断裂。当毛泽东、林彪通过军方控制了全国，刘少奇的结局已经注定，注定惨败。毕竟刘少奇背后有一大批人，从大四清开始，他们跟着刘少奇走，希望刘少奇可以成为一把手，大干一番。然而事实证明，毛泽东还在世的情况下，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幻觉。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刘少奇的路本来走得很顺。经济调整有了成效，加上大四清运动赢得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支持，实力一直在增加。特别是一九六五年，在和毛泽东的矛盾浮出水面的情况下，依然当选国家主席。在很多人看来，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和毛泽东旗鼓相当，隐隐有取而代之之势。从整个党史看，共产党每一次出现重大挫折，都要更换领导人。如大革命失败之后，陈独秀下岗；如井冈山反围剿失败，王明、博古完蛋。大饥荒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刘少奇取代毛泽东似乎是大势所趋。然而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

作为当事人的刘少奇发现，不论他的实力如何增加，和毛泽东之间依然有着难以弥补的差距。不论是魄力、手腕、还是威望，他始终无法追上毛泽东。他已经足够出色，在新中国历史上，已经是屈指可数的政治家，或者说谋略家。然而毛泽东是历史巨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在毛泽东面前，刘少奇的实力和档次都差那么一点点。

七千人大会时，刘少奇已经是二把手，通过经济调整和大四清运动，在获取整个行政系统之后，在实力大大增强之后，刘少奇依然是二把手。

在刘少奇还在全力以赴指挥大四清运动之际，毛泽东开始反击了，从文化界入手开始反击。不经意之间完成了从批判罗瑞卿到批判彭真，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毛泽东的反击是那么干净利索，是那么的不可阻挡。

刘少奇痛苦地发现，不论如何提升实力，自己依然是二把手，只因为一把手是毛泽东。刘少奇的实力越增加，越是能体会到毛泽东的强大，越是发现心中的梦想是迟尺天涯。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他也不是一个人。如果是他自己一个人，跑去跟老战友毛泽东叙叙旧、写个检讨就得了，说不定还能继续工作。在他身后站着的是整个行政系统，他们的身家和前途都系在刘少奇的身上。刘少奇倒掉，行政系统势必造成大范围换血。于公，国家动荡；于私，他的支持者将失去养老保险、住房、配车、厨师等等一系列好处。因此只要有一线生机，他都要全力以赴去干。

在理论论战失败之后，只剩下行动一种途径了。因为没有军方支持，他的行政能力有限。面对汹涌澎湃的批判他已经无能为力。现在他只能寄希望不要大乱。只要不乱，就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办法。大饥荒那么天大的事，不是都解决了么？在中国，只要不出乱子，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乱，不仅是刘少奇，也是所有掌权者最怕的局面。然而他的对手是毛泽东，毛泽东已经看穿了他的弱点。批判运动兴起的时候，一个特殊的群体——红卫兵出现了。

面对年轻激进的红卫兵，刘少奇已经看到其中蕴含的变数。因为他本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感应下加入革命的，一辈子都在搞运动，很清楚这种运动的杀伤力，特别是有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的情况下。所以他打出手中最后一张牌，派遣工作者进学校，希望能把炽热的学生运动给压住，进而得到一丝喘息的空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这已经是他最后的选择了，或许是没用的，只能尽人事、待天命，期待奇迹出现。

（二十）所谓工作组

当年的高校，尤其是北京高校，犹如一个个火药桶，继承了二十世纪善于罢课的光辉传统，外面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放下书本、跑到街头去爱国。碰见文革那种风云激荡的年代，所有火药桶几乎同时被引爆。要想让那些已经引爆、即将引爆的火药桶安静下来，除非四大龙王同时出现在空中降雨。当然四大龙王没有出现，现在刘少奇就要代替龙王们灭火。

刘少奇手中的灭火器就是工作组。

所谓工作组，参照四清运动，就是在各个机关里抽点人开进北大清华等校园，和校方联合，去劝说那些骚动不安的年轻人。说啥呢，大意就是说，那个你们啊，还年轻啊，要好好学习啊，听政府和领导的话啊，不要受人蛊惑啊。如此等等，就像唐三藏同志念经，一条一条的，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却忽视了一点。年轻人本来就血气方刚，在理想和信念的召唤下，在同样来自中央内部的鼓励下，哪里听得进去那些理论家们的罗嗦，该演讲还是演讲，该串联还是串联，该大字报还是大字报，该喊打倒谁照样去喊。

对待学生运动，两种人最合适：狠人和能人。所谓狠人，就是拿着鞭子，小子敢再闹就抽你屁股，例如八九学潮之后，军队开入校园。所谓能人，就是来吧小伙子们，咱们一起闹，咱比你花样更多，你们好好学习，如早期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学生运动。

而某些工作组的人则是另外一个样，真把自己太当回事：级别不高，派头够大；权力不多，脾气够大；严于律人，宽于律己；世界观只有孙子和爷爷两种概念——领导面前当孙子，领导背后当爷爷，拿着鸡毛当令箭。对待高干子弟没辙，对待没背景的学生很会整。后来的造反派领袖，都有过被工作组修理的经历。

某些工作组成员（如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宿舍和办公室之间只有一百米，这一百米的

距离也得开车上班，架子不是一般的大。这种态度其实是表明，老子是中央来的，你们这群小王八蛋能怎么样嘛。这一阵势恰好提供了右派变质的证据，给了左派造反的口实。这种人唬一唬无知的老农民还行，派去浇灭年轻人的火气，浇下去之后才发现是油。这种人应该是半官僚主义和半书生的混合体，处在从书生或大兵到官僚的进化阶段，既没有官僚的圆滑也没有书生或大兵的血性，平时装点门面可以，遇到事很可能添乱，这种人数不少。

不禁要问，刘少奇他老人家为啥要派这种人去呢？因为能人和狠人他都没有，他无人可派了。如果军队支持他，一切好说。他本来是发动学生运动的好手，现在要去熄灭学生运动，能派的人也就是之前搞大四清的那些人，有啥办法呢，手头的资源有限啊。

工作组也得完成自己的任务，不能辜负领导的重托不是。既然这帮热血的愣头青一根筋转不过来，那好吧，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某些工作组会把某些活跃分子给拉到某个单独的小屋子里批评教育一番。这样一来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同时也刺激了激进派的神经。再加上江青、康生等人在背后的煽动，激进派就起来反对这些工作组成员，冲破他们划定的界限。

一方要冲破，一方要维稳，自然而然就出现批斗情况，而且是乱批乱斗。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有权力做决定，就把一些问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如六月十八号发生在北大的“六一八”事件。这次事件说白了就是一群热血青年闹腾了一下，批评教育或者关起来教育都是可以的，偏偏定性为“反革命”，也太高调了。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工作组领导们或许不知，这个反革命定性会在中央高层引起怎样的震动，又会给正准备放手大干的江青、康生等人提供多少炮弹，更为致命的是加快了毛泽东全面清算的决心。

这种“反革命”定性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行政系统做最后的挣扎，在最后时刻行使权力，希望通过这种典型事件扑灭学生运动的决心，也就是拿大帽子压人，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这事背后是两个高手在较量。毛泽东的反击是从文学领域切入到政治领域。刘少奇的防守则从政治领域外扩，把政治延伸到校园。毛泽东抓住这个机会再反击，说工作组干坏事，影响了运动，应该撤掉。

毛泽东说撤掉，那就撤掉。

工作组撤销，相当于拿掉了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上仅有的一点资源。此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基本上丧失了任何活动的能量，只有老老实实在那里，如同待宰的羔羊，等待命运的裁决了，那是他们一生中最为低落的时刻。能让刘少奇和邓小平这类人同时落入低谷，普天之下也只有历史巨人毛泽东有如此的手腕、魄力和威望。

（二十一）第三次决定

当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拿掉刘少奇和邓小平手中最后一点可利用的资源时，他已经下了最后的决心，决心把一切打碎重新来过。

踏上革命道路之后，毛泽东至少做过三次足以影响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决定。

第一次是抗战之后，面对咄咄逼人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抽了很多烟之后，熬过了很多不眠之夜之后，下定决心要带领共产党参与争霸天下。这个决定使得共产党赢得中国的统治权。

第二次则是五零年，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思索很久，抽了很多烟之后，熬了很多不眠之夜之后，拍板决定派志愿军入朝。这个决定在二战之后重新界定了亚洲的格局，也为新中国赢得了安全保障。

这是第三次决定，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重要决定。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号到二十八号；地点是湖南韶山滴水洞。

和之前两个决定不一样，这个决定虽然前后只有十一天，酝酿的时间确实最长。在北京闹得天翻地覆之际，毛泽东去了南方。批判罗瑞卿时，在上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毛泽东在杭州。彭真搞出《二月提纲》时，毛泽东在武汉。《五一六通知》下发，林彪谈政变，刘邓派工作组，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一带。

六月十五号那天，毛泽东觉得局已经布好，应该做决定了。于是他离开杭州，当晚到了南昌。六月十六号到了长沙，回到韶山，十七号住进滴水洞——那是毛泽东祖坟的所在地。

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龙头山，北面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被环抱其间。滴水洞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延伸其间。豁口处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景色宜人。两山陡立处，有一桥，桥下有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阵阵悠扬，韵如琴，那便是滴水洞。

滴水洞四周幽荫阵阵，上百种野花漫山遍野地生长在小溪边，又有上百种药材分布在山野间。特别是春夏两季，花朵漫天，绿荫阵阵，人间天上。

从风水上说，此处当属龙脉，毛泽东的祖先下葬于此，也是一个好归属。当年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四处掘共产党领导人的祖坟。曾三次派人去挖坟，均因当地百姓的保护未能得逞。毛泽东入住滴水洞之后，基本上不出门。

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韶山水库就在不远处。一九五九年六月份，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之后，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曾回过滴水洞，曾兴致勃勃地在韶山水库游泳。这一次，他在滴水洞住了十几天，竟然没有一次去游泳，而且很少外出。在这里，他又回到决定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的那种状态，紧张地工作、静静地思考。对一般人而言，面临大事时常常心慌意乱。对精英而言，重要时刻往往很冷静。对巨人级别的毛泽东来说，遇到重要的事情却是出奇的细心，反复思索，把前前后后的可能性想了很多遍，直到算无遗策之后再做决定。

高明的政治家如同顶级的修行者，心中有一种境界，叫做静。懂得动的人不见得有多么牛，懂得静才真的了不起。

毛泽东在滴水洞想什么？当然是天下大事。所谓的天下大事是很复杂的，把天下大事简化一下，就集中在——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人身上。这两个人，他要用一个（林彪）废一个（刘少奇）。用林彪，如何使用，需要方法；废刘少奇，如何废，需要方法。

林彪的事后面再说，这里先说说刘少奇。

两个人从延安整风以来，一直亲密无间。

中间出现了高岗事件。高岗为了权力而对付刘少奇，毛泽东为了刘少奇判高岗违规——高岗是毛泽东最忠实的粉丝之一。在随后的反教条运动中，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而让粟裕靠边站，因为他要把刘少奇推向前台，要为未来的接班人储备人才。

刘少奇走向前台之际，正是大跃进兴起之时。那时候灾难还没有到来，虽然有一系列预兆，但总体形势看起来还不错。毛泽东选择在那个时候让出国家主席的位置，其实也有交班的考虑。如果没有大饥荒的到来，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也许真的完成交班，之后的一系列运动都不会存在，那将是梦幻般的。刘少奇上台之初，出现了彭德怀事件。毛泽东又为了刘少奇而拿下彭德怀，扫除了一个对刘少奇不感冒的人。然而此后一切都变了，大饥荒凶猛地到来了。

毛泽东检查了总路线，没错；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操作上。毛泽东认为那是实践上的错误。此时在前台负责实践工作的恰好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以及他们领导的那个官吏组织。毫无疑问，那个时候的毛泽东非常恼火。更让他愤怒的是，在七千人大会上，有人把责任往他头上推。虽然他是领袖，应该负最大的责任，但是当时的普遍观点是操作失误。他忍了，没有当场发飙，不是因为他喜欢忍让，而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把责任承担下来才是最佳决定。

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亲手推向前台的刘少奇开始背离他制定的路线，而且把整个行政系统都拉过去了，还想把手伸向军方。从一九六四年《二十三条》的诞生开始，毛泽东决定布局反击。之前，毛泽东还在等刘少奇回头；之后，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政治对手了。毛泽东要打掉的并不是刘少奇，而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批人。于是他把江青放出来折腾，于是他把军权集中在林彪手上，于

是他倒掉了曾经的心腹罗瑞卿、贺龙，于是他把红卫兵重新请出学校，一切布局结束，如今就差最后的决定了。

要下决定不难，但他还要想清楚。因为这个决定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打一场战争，而是事关很多人吃肉还是喝汤问题、住别墅还是蹲牛棚的问题、批斗别人还是被别人批斗的问题，必须再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

想到六月二十八号，终于把一切想清楚了，再一次离开家乡。一九二七年，三十四岁的毛泽东离开家乡搞武装斗争，彼时的他不过是一书生。三十九年后，七十一岁的毛泽东再次从家乡出发，亲手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此时的他已经是神一般的革命领袖。

离开家乡之后，毛泽东去了武汉。在武汉徘徊了半个月，游了长江，放松了一下。仰望万里楚天，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巨浪，他已经成竹在胸。在武汉，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很好地透露了毛泽东当时的心境。

毛主席给江青的信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指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谈政变），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

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指全世界的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